

南 華 大 學

亞太研究所碩士論文

1 9 9 8 年「辜汪會晤」之研究

The study of “Koo-Wang Meeting, 1998”



研 究 生：徐蓓莉

指 導 教 授：張亞中教授

中 華 民 國 9 2 年 6 月 2 3 日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亞 太 研 究 所

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之研究

研究生：徐蔭莉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孫國平

洪志清

徐中

指導教授：徐中

所 長：徐中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摘要

兩岸關係從對抗、隔絕到走向談判桌，已是必然的發展，如此的時代意義，正是從事本文研究之基本目的。兩岸兩會的「事務性協商」經歷第一次辜汪會談之後，雙方都作了若干檢驗與自我調整。兩岸政府從嘗試摸索到面對兩岸政治談判時代的來臨，雙方無論就國際情勢、各自的內部變化和步伐調整上，亦有相當多的因應對策；先前的各項「事務性協商」，兩岸人員也藉此累積相當的經驗與資料，做更完整、客觀地互動評估。隨後，台海雙方商談在間斷五年多之後，不論其意涵為高層參訪、相互放話、甚或談判，雙方都期待藉 1998 年的「辜汪會晤」展現各自對恢復兩岸間對話的善意。

1998 年「辜汪會晤」呈現海峽兩岸不同的政經發展等的議題，本文企盼從媒體報導、專文、專論所顯示的議題焦點，在持續不斷變化的兩岸關係中，能為這次歷史的會見—「辜汪會晤」，整理出一套完整資料或一些合理的綜觀現象，並能藉此提出兩岸關係未來政策之建言。

本文擬就 1998 年「辜汪會晤」相關議題作研究。然，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錯綜複雜，本文範圍擬探討單一事件「辜汪會晤」所發生的事實和衍生的一些重要議題，主題包括：(1) 緒論：研究緣起、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2) 1993 年「辜汪會談」後兩岸情勢的內外環境變化、兩岸交流情形及中共對臺政策說明；(3) 1998 年「辜汪會晤」舉行的背景介紹，包括國際因素、臺灣、中共外交政策因素及「辜汪會晤」前的協商；(4) 「辜汪會晤」過程：臺灣方面雙方的聲明與協調過程、會晤行程安排、會晤期間兩岸立場的陳述、會晤達成的議題等；(5) 「辜汪會晤」評析與結論。

關鍵詞：兩岸、政治、辜汪會晤

ABSTRACT

It is an inevitable tendency for Taiwan and China to develop from hostility to negotiation. Both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RATS) have reviewed and adjusted their strategies of cross-strait consultation based on the first Koo-Wang talks. They have also developed various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chang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negoti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n the future. The “cross-strait consultation” held in the previous years have brought meaningful experiences an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SEF and ARATS , so that they might analyze their interaction objectively and completely. After the institutionalized system for cross-strait consultations was suspended over five years, both sides were willing to resume the dialogue and demonstrated goodwill.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1998 Koo-Wang mee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stead of discussing complicate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facts and issues arising directly from the Koo-Wang mee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Study include (1) introduction (the launching of the meeting, methodology and purpose of the Study, and scope and limitation of the Study); (2)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and the policy of China to Taiwan after 1993 Koo-Wang talks; (3) background of 1998 Koo-Wang mee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 circumstances, diplomatic policies of Taiwan and china, and preparatory meeting of the Koo-Wang meeting); (4) the scenario of Koo-Wang meeting (statements and coordination of both sides, agenda arrangement, political standpoints of Taiwan and China, and consensus of the meeting); and (5) comments and summary of the 1998 Koo-Wang meeting.

The 1998 Koo-Wang meeting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Based on relevant reports of media, studies and monographs discussing the issues of the meeting, the Study provides a complete set of data and comprehensive analyzing results on this historical meeting between Chen-fu Koo and Dao-han Wang, and hope to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ross-strait polici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目 錄

摘 要.....	iii
ABSTRACT.....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4
一、研究途徑.....	4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6
一、研究範圍.....	6
二、研究限制.....	6
第二章 1993 年「辜汪會談」後的兩岸情勢.....	7
第一節 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	9
一、美國對兩岸政治互動決策的影響.....	11
二、區域整合.....	13
第二節 臺灣的政治環境變化.....	16
一、民進黨中國政策的演進及臺獨的合與分.....	18
二、國家認同與族群文化認同.....	21
三、臺灣民主化運動與臺獨的形成.....	23
第三節 兩岸交流情形.....	25
第四節 中共對臺政策.....	26
一、中共對臺政策訂定的重要歷程.....	27
二、從國際情勢看中共對臺政策的轉變.....	30
第三章 1998 年辜汪會晤舉行的政治背景.....	32
第一節 國際政經因素的影響.....	32
一、「亞洲價值」與亞洲金融風暴對亞太國家政治的影響.....	32
二、美日安保條約的擴大適用.....	34
三、美國積極建議兩岸繼續對話、協商.....	37
第二節 中共的外交政策.....	40
第三節 辜汪會晤前的兩岸善意表現.....	42

一、臺灣民意的整合和持續釋放對中共善意	43
二、中共對促成「辜汪會晤」的善意態度	44
第四章 「辜汪會晤」的安排與會見過程	46
第一節「辜汪會晤」前雙方的聲明與協調過程	47
第二節 會晤行程安排	49
一、兩會副秘書長層級第一次預備性磋商	49
二、兩會副秘書長層級第二次預備性磋商	50
三、兩會負責人商定「辜汪會晤」行程磋商	50
四、「辜汪會晤」前的臺灣決策和行程正式確定	53
五、「辜汪會晤」正式行程	55
第三節 兩岸立場的陳述	58
一、與大陸相關人士的對話內容	58
二、臺灣方面的談話綜合整理	61
第四節 會晤達成的議題	62
第五章「辜汪會晤」評析	64
第一節 臺灣內部民意的反應	64
第二節 「辜汪會晤」與「辜汪會談」之比較	66
第三節 「辜汪會晤」後中共對臺策略	68
一、中共對「辜汪會晤」的總結報告	68
二、中共的宣傳策略	69
三、中共仍以「一個中國」原則為未來對臺政治談判基調	69
第四節 「辜汪會晤」後的兩岸外交情勢	70
一、兩岸的外交競爭	70
二、全球化下兩岸加入世界貿組織的機遇和挑戰	71
第六章 結論	73
一、兩岸皆需重新思考「一個中國」原則	74
二、加入 WTO 後的兩岸新興互動方式	75
附錄	77
附錄一 海基會與大陸方面歷次會談一覽表	77
附錄二 辜汪會、辜錢會與辜江會的共識與分歧	83
附錄三 辜董事長於「辜汪會晤」期間相關談話	84
一、辜董事長在中正機場對記者談話	84
二、辜董事長抵達上海談話	84

三、辜董事長會見汪道涵先生談話要點.....	85
四、辜董事長香山碧雲寺孫中山先生衣冠塚弔祭後發表談話.....	86
五、辜董事長參加陳雲林先生邀宴致詞.....	86
六、辜董事長會見錢其琛先生談話.....	87
七、辜董事長會晤江澤民先生後「中外記者會」談話.....	89
附錄四 參考文獻及相關書目.....	90
一、中文.....	90
二、英文部分.....	101
三、網路資源.....	105

第一章 緒論

自 1949 年來，臺海兩岸處於分裂、分治的狀態，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且互不相往來，在型式上甚至是處在交戰狀態。有鑑於傳統倫理與人道精神的考量，臺灣於 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結束兩岸完全隔絕的狀態；1990 年臺灣方面在主動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研商制定了「國家統一綱領」，以確定大陸政策的目標與步驟；隨後在 1991 年 1 月 30 日由立法院通過，於行政院組織架構下增加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成為行政院統籌處理大陸事務的法定機構。基於不與中共進行官方性質接觸的原則下，同年 2 月 19 日，陸委會許可具民間性質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設立，以解決兩岸交流所產生的事務性問題。海基會的成立，象徵臺灣方面的對大陸工作組織架構備齊，從此正式揭開兩岸協商與談判序幕。1993 年 4 月舉行的辜汪會談，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兩岸正式以協商代替對抗的談判方式，解決兩岸交流衍生的問題。雖然兩岸政府因政治因素考量，兩岸都宣稱仍無官方性的接觸，但從兩岸不斷有官方身份彼此參訪、觀察、甚至正式協商等交流活動看來，無論官方或非官方的交流皆已成事實。

1993 年 4 月 27 日第一次的「辜汪會談」，為臺灣與大陸僵局開啓了一扇窗，使兩岸良性互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95 年 4 月 8 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發表「建立兩岸正常關係，塑造統一有利形勢」(俗稱李六條)政策性的談話中說明，兩岸應在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文中說明，自 1949 年以來，臺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要解決統一問題，就不能不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探尋國家統一的可行方式。只有客觀對待這個現實，兩岸才能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儘快獲得較多共識。¹這是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稍早於同年 1 月 30 日，中國人傳統過年除夕夜大家團圓的日子中所發表的「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江澤民提出八項看法主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俗稱「江八點」)的談話。²對於兩岸的中國人而言，似乎對長久以來的動亂，看到了可以解決的契機。這固然是 1993 年的新加坡「辜汪會談」所創造的良好基礎，但因「辜汪會談」一直被兩岸界定為事務性、功能性的談判，而 1993 年後至

¹《建立兩岸正常關係，塑造統一有利形勢》，李登輝總統演講的中英文內容，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rpir/1_5.htm。

²《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重要講話：《江澤民同志八項主張》，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jiang8d/jiang8d0.asp>。

1998 年間，兩岸兩地在各自國內發展和國際空間都有明顯調整。1996 年的臺海危機，兩岸幾形成作戰狀態，受到全世界空前的矚目；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大陸對於「臺灣問題」存有乘勝追擊之姿，希望能繼澳門回歸後很快地解決臺灣問題，也避免其他國家如美國等，不斷以「臺灣問題」要脅中國；加以中國大陸因為經濟快速成長，大有躋身世界領袖級強國之列，中國希望創造兩岸政治和談狀況，向美國甚或國際示好，這樣的歷史情懷和國際現實因素使得 1998 年的兩岸重啓談判之門，具有多樣性的意義，值得研究和探討。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兩岸自 1995 年、1996 年的臺海危機以來，一躍成為全世界的關注的焦點，亦被世界列入高度可能發生戰事的地區，臺灣在飽受戰爭恐懼與壓力下，在姿態上，一直努力希望恢復兩岸協商與談判；而中共方面經過 1996 年的經驗，了解要解決兩岸問題，就必須得到國際的認同，甚至從國際社會反制臺灣，特別是美國，即經美制臺，才是真正解決兩岸問題的重要入手。中國經過近二年的外交努力和內部工作調整，1998 年 2 月北京終於同意重新恢復協商，所以 1998 年是重啓兩岸談判的關鍵年。筆者同時試著以 1998 年為分界線看兩岸關的發展，可以整理出兩岸一些政治、社、經現象的異同。

在經過事務性協商、談判的淬煉後，兩岸擺脫了談判初期的青澀，雙方不僅要在先前所謂的事務性協商中提供實際交流的各項規則外，正式開始所謂的「政治對話」；一些兩岸突發的社會事件與國際情勢變化，也使得兩岸必須面對一些共同的議題。海峽兩岸經過一段冷凍期，終於恢復會談，象徵兩岸民間交流最高層級交流的「辜汪會晤」也正式的籌備與開展，第二次的兩岸民間機構的領導人的會面，所代表的意義和效益及對未來兩岸關係的影響為何，值得關注。兩岸間交流所衍生的種種事件對於臺灣民眾而言，都是臺灣民眾省思在兩岸關係中所應抱持的自我認同與態度，民眾對兩岸事務的反應，應是執政者重要參考依據。

臺灣民眾因為政治因素對大陸的各項實際狀況是陌生的。兩岸從 1987 年的開放、交流開始，臺灣民眾對於在兩岸發生的個別案件發生後，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上的變化，亦是觀察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指標。臺灣媒體向來在兩岸事務中具「催化作用」，³臺灣民眾對「統獨」議題常是經由媒體對有關兩岸事務的事件報導，產生相當地差異而形成對兩岸兩會協商、會談者的變數，形成對處理兩岸事務單位的壓力，⁴觀察臺灣媒體如何建構「辜汪會晤」事件及可能設定的相關議題與觀察政府與媒體間對「辜汪會晤」的認知態度差異，亦是觀察兩岸發展中重要

³ 林森鴻，兩岸報紙互動關係之研究。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⁴ 馬西屏，新聞媒體在岸會談中之角色研究－以臺灣媒體對首次臺北會談的影響為例。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的一環。

第二次的辜汪會談（即稱的「辜汪會晤」）原本早該在 1995 年即可展開，但該年 6 月 16 日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通知臺灣海基會，推遲原已安排妥當的第二次辜汪會談；6 月 30 日大陸海協會以電話告知臺灣海基會中斷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大陸方面所持的理由是臺灣的李登輝總統應美國學校康乃爾大學邀請赴美訪問，並發表「臺灣民主化經驗」的演講，對兩岸協商製造了不良氣氛。

從 1995 年 6 月以來，兩岸經過了一段冷凍期，在 1997 年 10 月大陸領導人江澤民訪問美國，臺灣方面不斷地在媒體公開表示願意恢復兩會協商，美國第五十七任總統柯林頓的預定於 1998 年訪問中國大陸，甚囂塵上的大陸與臺灣協商的「第二軌道」新聞不斷之後，海協會在 1998 年 2 月 24 日向海基會發出信函，同意恢復兩岸兩會接觸與交流。海基會於 4 月 22 日派該會副秘書長詹志宏到大陸進行洽商有關兩岸交流相關事宜；同年 8 月間連續發生攸關臺灣同胞在大陸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議題的「台商間諜案」⁵及「林滴娟事件」⁶之後，大陸方面為降低臺灣對大陸的敵意及對兩岸兩會民間性最高領導人會面表示重視和尊重，9 月 22 日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赴北京，進一步洽商辜振甫先生訪問大陸的行程安排，舉行臺北方面十分在意的「許唐會」，執行臺灣官方一再表示「兩會會談從那裡中斷，就應從那裡恢復」的指示。

兩岸中斷已久的協商，從這時看起來似乎確實應重新啟動，雖然這次的協商議題並非臺灣方面期待的事務性、功能性協商，而臺灣方面為解決大陸不斷釋放的「兩岸政治協商」的氣氛，臺灣方面如何考量、要如何因應，政府決策高層是否足以凝聚內部共識、對外是否能得到國際認同而升臺灣國際形象及地位？在「辜汪會晤」的政治意含是兩岸交流以來的最高層次，對兩岸關係而言，是好是壞，未來發展會或許因此可能有重大轉折等，都引起筆者極大的興趣，希望借由一些相關報導、評析、論文、專書的研究整理，期能對「辜汪會晤」有更多的概念和認知。

⁵ 寇健明、陳紹瑜、韓岳廷和周昌明四名台商間諜案。在大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八月十二日就寇健明等四位台商涉嫌的「間諜案」做出一審宣判。寇健明被判四年，其餘三人免刑。該審判由中共媒體直接電視報導，引起爭議外，台商在大陸的人身安全保障，也再度引起臺灣各界關注。《海峽兩岸關係紀要－民國八十七年八月》，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cschrono/8708.htm#002>。

⁶ 高雄市議員林滴娟女士在中國大陸被綁架撕票。在大陸遭綁架遇害的高雄市議員林滴娟父母等家屬，八月一日趕抵遼寧省海城市處理善後。由於中共拒絕我海基會派員赴大陸協助家屬處理善後，在臺灣引發激烈反彈。《海峽兩岸關係紀要－民國八十七年八月》，陸委會網站。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兩岸關係從對抗、隔絕到走向談判桌，已是必然的發展，如此的時代意義，正是從事本文研究的基本目的。兩岸兩會的事務性協商在經過第一次辜汪會談的經驗後，兩岸雙方都作了若干檢驗與自我調整。兩岸政府從嘗試摸索到面對兩岸政治談判時代的來臨，雙方無論就國際情勢、各自的內部變化和步伐調整上，亦都有了相當多的因應對策；先前的各項「事務性協商」亦給了兩岸人員累積相當的經驗與資料，做更完整、客觀地互動評估。在間斷了五年多的臺海雙方商談後，不論是高層參訪也好、相互放話也好、甚或談判也好，雙方都期待藉 1998 年的「辜汪會晤」展現各自對恢復兩岸間對話的善意。在此次「辜汪會晤」期間，也同時呈現海峽兩岸不同的政經發展等的議題，企希從媒體報導、專文、專論中所顯示的議題焦點，在持續不斷變化的兩岸關係中，能為「辜汪會晤」這歷史的會見，整理出一套完整資料或一些合理的綜觀現象，並能做為往後的兩岸關係政策上作些建言。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文研究主要採個案研究法與歷史研究途徑為主。個案研究偏重於探討特定的事件或問題，尤其強調對於事件之真象，問題形成的原因等方面作深刻而周詳的探討。以 1998 年「辜汪會晤」前後的大陸和臺灣就內外環境變化和政策立場等，逐一作分析研究。並以辜汪會談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進行文獻資料蒐集與分析，據以研判未來兩岸可能的發展方向，最後提出個人之研究心得與建議。

一、研究途徑

歷史是不斷隨時間循環而變化的過程。欲想瞭解事件的變化過程，首先需建立事實，然後找出事實與事實間的因果或解釋事實為何發生的原因；對事件有一全面瞭解後，才能對未來發展趨向作出預測。歷史研究法即是利用相關資訊描述及分析歷史，解釋各部分之間的前因後果關係；藉由對歷史的描述，發掘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事實，由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連重建過去的工件。⁷在本文中，雖然重點是在 1998 年的「辜汪會晤」事件，但藉由第一次辜汪會談後的兩岸互動狀況，可以瞭解形成此次「辜汪會晤」的原因。

在資料的採用上，擬以有關兩岸兩會協商發展的文獻資料、中華民國政府或其他政府相關單位公報及正式新聞稿；在媒體上所發表之報導、專欄、特寫、社

⁷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民 73 年 9 月），頁 25。

論等；兩岸、香港等地出版的相關圖書、論文、期刊等，作為研析依據，儘可能蒐集各方意見，以求資料來源多元化，展現各種角度的不同觀點。

文獻分析最大的優點是容許研究者在不能親自接觸研究對象限制下，對某課題作研究；獲得文獻資料後，進一步作「文件內容分析」，整理分析各事件，賦予相關意義，以建立整體脈絡並析論其影響。

二、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法基本上是對某一事件作單一或比較性的分析。關於個案研究法，一般可分為六種類型，第一、描述性個案研究（**A theoretical case studies**）：為傳統的單一個案研究和分析，著重在描述事件及資料蒐集；第二、解釋性個案研究（**Interpretative case studies**）：利用已建立之理論性問題，作為解釋個案的基礎；第三、建立假設之個案研究（**Hypothesis – generating case studies**）：企圖藉由提出假設，架構出一個可在多數個案中被驗證的通則，有助於理論的建立；第四、驗證理論之個案研究（**Theory – confirming case studies**）：運用已建立之理論架構來分析個案，驗證其命題使理論更牢固；第五、反證理論之個案研究（**Theory – infirming case studies**）：同樣將已建立之理論架構來分析個案，並反證其命題，作為改良理論的參考；第六、異軌個案研究（**Deviant case studies**）：針對與已建立的通則理論相異之特例個案進行研究，以瞭解尚未被納入理論中的變數，藉修改命題的方式，增加理論的適用度。⁸此種解析工作主要就是從不同事件中，找尋共同性，以便對觀察未來可能發生的相關事件，尋求可依循的途徑。

因此個案研究法基本限制是：不能從單一個案使用科學假設來測試，僅能用以比較多重個案間的共同特徵。本文將以第一次辜汪會談後的一些個案分析，並以1998年「辜汪會晤」作檢視，以觀察兩岸和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

⁸ Arend Lijphart, "Coope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December 1971) :pp.691-69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擬就 1998 年的兩岸兩會恢復接觸的「辜汪會晤」相關議題作研究。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錯綜複雜，本文範圍擬限制在對單一事件「辜汪會晤」所發生的事實和衍生的一些重要議題作研討，這些主題大致包括緒論（研究緣起、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1993 年「辜汪會談」後兩岸情勢的內外環境變化、兩岸交流情形及中共對臺政策說明；1998 年「辜汪會晤」舉行的背景介紹；（包括：國際因素、臺灣、中共外交政策因素及「辜汪會晤」前的協商）；「辜汪會晤」情形（臺灣方面雙方的聲明與協調過程、會晤行程安排、會晤期間兩岸立場的陳述、會晤達成的議題等）；「辜汪會晤」之評析與結論。

二、研究限制

由於此次「辜汪會晤」，雙方僅定位在參訪性質，對兩岸而言是創造一種「氣氛」，而非實質性協商，難有太多決策性結果；鬆散的參訪活動所衍生的議題，可能會因為國際情勢的變化及後續的事件，形成「天馬行空」或「空前絕後」。

大陸方面因對採訪工作有一定的限制，個人赴大陸親身觀察整個辜汪會晤行程，有技術上的困難；臺灣官方或因行政問題，或因敏感，一些資料亦沒有公開，故本文擬就公開在媒體所呈現的過程、結果，臺灣官方的聲明等作探討。選擇樣本分析方面的限制，亦有事實上的困難，本文將盡可能稍作一些相關人員的訪談稍補資料上的遺憾。

第二章 1993 年「辜汪會談」後的 兩岸情勢

1987 年 11 月臺灣開放大陸探親政策以來，兩岸正式邁入民間交流時代。因應兩岸民間交流各種攸關民眾福祉權益之糾葛隨之而來。臺北在 1988 年 8 月 18 日於行政院下任務編組成立「大陸工作會報」，協調各機關處理大陸相關事務；北京方面也於同年十月在國務院下設「臺灣事務辦公室」，辦理對臺事務。⁹隨後臺北方面再於 1991 年 1 月 30 日行政院組織架構下，正式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成為行政院統籌處理大陸事務的法定機構。兩岸為務實處理人民來往的旅遊、文書驗證等事，在 1991 年先後於 2 月 8 日成立海基會與 12 月 16 日海協會，並於 1991 年 11 月至 1995 年 5 月共進行兩會各種層級「不定期」與「制度化」協商達十八次（詳見附錄一）。¹⁰

1993 年 4 月 27 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舉行，為期兩天半的第一次的「辜汪會談」為具體成績。兩岸兩會負責人辜振甫董事長及汪道涵會長第一次在新加坡進行歷史性的首度會談，建立臺灣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制度化協商管道。會談的領導人代表各自立場，發表精闢的演講，宣示明確的主張，且都各有機鋒，商談過程中有堅持也有妥協，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經過多方折衝，雙方的負責人簽署四項協議（第一、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第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第三、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及第四、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從此建立雙方制度化的溝通與協商管道。¹¹雙方面雖不能滿意，但這畢竟是台海雙方的第一次具談判性質的協商，總算是踏出了第一步。為兩岸僵局開啓了一扇窗，使兩岸良性互動奠定了好的基礎。

1995 年兩岸雙方最高領導階層皆以推動兩岸領導人互訪作為開展兩岸交流的開始。1995 年 1 月 30 日在中國傳統的農曆春節前夕，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了一篇名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並提出八點有關「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若干重要問題」的看法與主張，其中第八點江澤民表示：

⁹ 陸委會網站，《兩岸大事記》，<http://www.mac.gov.tw/>。

¹⁰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海基會與大陸方面歷次會談一覽表，<http://www.sef.org.tw/www/html/discuss1.htm>。

¹¹ 《中國時報》，民國 82 年 4 月 27 日，版 1。

我們歡迎臺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臺灣方面的邀請，前往臺灣。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先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就是互相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國人的事我們自己辦，不需借助任何國際場合。海峽咫尺，殷殷相望，總要有來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來」。

在臺灣方面，1995年4月8日，在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裡，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發表「建立兩岸正常關係，塑造統一有利形勢」政策性的談話，也提出兩岸關係的六點主張，其中第四點主張內容回應江澤民有關兩岸領導人互訪的內容如下：

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本人曾多次表示兩岸領導人在國際場合自然見面，可以緩和兩岸的政治對立，營造和諧的交往氣氛。目前，兩岸共同參與若干重要的國際經濟及體育組織，雙方領導人若能藉出席會議之便自然見面，必然有助於化解兩岸的敵意，培養彼此約互信，為未來的共商合作奠定基礎。我們相信，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的情形愈多，愈有利於雙方關係發展及和平統一進程，並且可以向世人展現兩岸中國人不受政治分歧影響，仍能攜手共為國際社會奉獻的氣度，創造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新時代。¹²

這兩點由兩邊領導人提出的看法或主張，儘管內容，用辭有所不同，但是認為雙方領導人應該會晤，而且這項會晤極可能會使兩岸關係發展的更加平穩且具正面意義。這項難得的共識，雖然一直被臺北方面解為北京的一貫統戰技倆，只是向國際製造兩岸和談對話的假象而已。但對兩岸關係而言，也未嘗不是一項可以考慮的規劃。

在雙方高層首次有積極正面對話之際，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份於1995年6月7日－12日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六天。這次訪問雖是我國推展務實外交的一大突破，但中共方面為防臺灣的外交出訪出現「骨牌效應」，對臺政策轉趨強硬。在1995年6月16日中共片面宣佈暫緩原預定7月20日於北京舉行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兩岸關係墜入了寒冬時期。另一方面，美、中關係亦因中共若干抗議行動(如召回中共駐美大使李道豫)而陷入泥淖。1996年3月8日至3月14日，中共在臺灣兩端海域進行導彈發射訓練，意圖影響當時的臺灣總統選舉，中共在臺海地區舉行的軍事導彈演習舉動，形成所謂的「1996年臺海危機」，緊繃的情勢幾乎是將兩岸推向戰爭邊緣。

1996年的臺海危機對美、中、臺關係均具有不同之意涵。就美、臺雙方而言，

¹²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rpir/1_5.htm。

臺海區域穩定與否與兩國利益密切相關。1995年8月，時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Natale H. Bellocchi)表示，臺海若發生戰事，美方會信守臺灣關係法，採取相關的措施。¹³同年11月，美方同意售我魚叉反艦飛彈四十一枚。1996年臺海危機高峰之際，美方鑑於預防性防禦之考量，派遣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臺海地區巡役，美參、眾兩院亦通過友臺的決議案，強烈反對中共軍事威脅，透露出美方對臺政策似已從「政治與戰略模糊政策」轉為「政治謹慎模糊(堅守一個中國原則)、戰略逐漸透明支持」的趨勢。¹⁴因此，臺海兩岸談判是否能有所進展，已成影響亞太安全因素之一。中共不斷擴充軍備顯露出其在兩岸關係上不放棄以軍事為手段的僵化思維，此舉已引起亞太各國的重視和注意。而直接面對中共強大軍事威脅的臺灣，加入美國的戰區飛彈防衛計劃(Theater Missile Defense，以下簡稱TMD)系統與否，亦可成談判籌碼之一；再者，美國已是目前國際體系中的單極霸權，而中共是正崛起的區域霸權，就美、中關係而言，雖然兩國建立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只是目標而非現況，未來兩國因彼此國家利益的考量下，衝突摩擦似難避免。然而這也說明了美國為何信守「一個中國」政策，概因此政策能使兩國的國家利益互相結合，避免衝撞。

第一節 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

1990年代國際面臨最重大的震動，就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東西軍事對峙也因華約集團的解散而結束。1991年底蘇聯的解體，更正式宣告了兩極對峙的終結，這項重大的國際變局對全球許多地區都具有深刻的影響。¹⁵就兩岸關係有關的全球情勢而言，至少凸顯出五大特色：第一、國際體系由兩極化向多元化過渡；第二、區域性衝突不減反增；第三、領土完整原則優於民族自決原則；第四、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角色增加；第五、國際經濟區域化增強。¹⁶

蘇聯的解體對中共的區域安全政策產生了有利的影響，即蘇聯對中共的軍事威脅已完全消除。自蘇聯前總理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失勢後，蘇聯就開始裁減遠東地區的兵力，包括遣散二萬名部隊，縮減三分之一的太平洋艦隊，撤退蒙古與阿富汗軍隊，銷毀烏拉山東部的中程導彈等。葉爾辛(Boris Yeltsin)取代戈巴契夫上台後，又決定將所有的戰術核子武器轉移至俄羅斯境內，並裁減了戰略

¹³ 《中國時報》，民國84年8月21日，版2。

¹⁴ 《中央日報》，民國84年8月18日，版10。

¹⁵ 張雅君，〈九〇年代中共的亞太戰略〉，《中國大陸研究》，35卷11期(民國81年11月)，頁17。

¹⁶ 李俊榮，〈中共對台策略演變的影響因素〉，《共黨問題研究》，第26卷9期(民國89年9月)，頁87。

核武，以及銷毀所有陸上發射短程核子武器，這使得中共不需要再以巨大國防力量防禦蘇聯的閃電攻擊，¹⁷而得以和平外交方式與其他國家交往。亞太地區國家在政治體制上，大致可分為三類國家：第一類是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日本等國；第二類是共產集團國家，如中國大陸、北韓及越南等三國；第三類是各種威權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混合政治體制，包括東協（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泰國）、南韓及中華民國等國。¹⁸中共擺脫蘇聯威脅後開始與周邊國家開展「睦鄰友好」外交，如1990年與印尼及新加坡建交，1991年與汶萊建交，同年11月與越南「關係正常化」，1992年8月與韓國建交。更在南亞加強與巴基斯坦及印度的關係，對俄羅斯及其他原獨立國協成員給予承認及建交，¹⁹這些外交舉措可顯示出中共利用亞太環境新的情勢，迅速拓展友好外交，填補蘇聯所留下的戰略空間，以營造對其有利的安全環境。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美國獲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合作的機會，促成美國得以領兵進入波斯灣，為科威特解圍。波斯灣危機也促成布希總統提出「新世界秩序」的觀念，以強調侵略行動不見容於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社會，因此布希曾言：「一個免於被恐懼威脅而更勇於追求和平與安全時代的可能誕生。」²⁰由於美國重視集體安全架構，在後冷戰時代，國際議題逐漸邁向多元化，除軍事安全、經貿問題外，環保、能源、人口等均成為議題，而這些問題也都需要中共的配合。換言之，國際體系多元化所形成的「交錯壓力」（cross pressure），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化。中共與美國在經貿、人權等問題上對立，但在人口、環保等問題又處於合作關係，這些複雜的因素，使得美、中雙方關係不斷朝向正面發展。²¹

199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出版「掌握時機」一書，在對中國政策方面，他指出：「中國人口佔全球的五分之一，不僅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也有成為經濟大國的潛力。其為太平洋三角之一，在國際間份量不容輕忽，其勢力也不容世界孤立。就在二十年前，我們打開了中國大門；在往後二十年間，我們必須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將其融入到國際社會之中。」²²即使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尼克森仍然反對用全面經濟制裁方式對付中共，亦不主張取消最惠國待遇。他主張以鼓勵代替懲罰，以接觸代替孤立，他並且警告：「現在將中國孤立起來，將會是

¹⁷ David Shambaugh, "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Survival* (London), 34(Summer 1992): pp.88-106.

¹⁸ 包宗和，「戰後國際政治體系之變遷」，美國月刊，第5卷，第9期（民國80年1月），頁8。

¹⁹ 《中國時報》，民國80年12月28日，版1。

²⁰ Christopher Coker "Brita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90s,"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1992), p.409.

²¹ 包宗和，〈影響柯林頓對華政策的正負因素〉，《美國月刊》，8卷1期（1993年1月），頁27。

²² 尼克森（Richard Nixon），《新世界》，丁連財譯（臺北：時報文化，1992年），頁156。

一場歷史大悲劇。」²³另一方面，也因國際社會進入後冷戰時期後，國際經濟的重要性日漸增加，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由過去軍事合作或對抗轉變為經貿合作或競爭的態勢，評估國家權力大小的衡量指標也加重了經貿這項因素的比重。而美國經濟長期以來的雙赤字問題以及國內經濟的不振，亦發突顯其急於「開源節流的心態」。而中華民國的經濟實力與龐大資金，適可構成與美合作的「關聯」及彼此間的相互依存。²⁴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大環境，強調談判代替對抗，合作代替衝突，經濟取代軍事地位的重要性，加上國際間重視區域穩定，促進區域和平，追求區域的最大利益。此時適合兩岸展開談判，兩岸的領導人也可感受得到此時此刻也是一個大和解的好時機，雙方似乎有著某種共識，可由非官方的代表先接觸看看，用試探性的談判，為爾後兩岸交往作一次破冰之旅，並藉此取得評估經驗，再決定未來政策走向。實際上，各國逐漸形成以區域為主體的國際政治，隨著歐盟、東協等區域性的國際組織發展日益成熟，對臺灣而言，加入國際性組織以凸顯臺灣的地位並保障臺灣安全，是一項長期目標。而美國已儼然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臺灣、中共與美國間關係，事實上是實質影響兩岸關係的最大國際因素。

一、美國對兩岸政治互動決策的影響

兩岸關係深受美國影響。1995年李登輝的康乃爾大學之行、1996年臺灣第一次總統直選、1997年的「香港回歸」、1998年7月柯江會談、1998年10月「辜汪會晤」、1999年澳門回歸、2002年江澤民訪美等，這些影響兩岸的重大事件，無異地美國一直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2001年4月中、美軍機擦撞，促使美國在對臺軍售、與對臺政策上，作出較有利於臺灣的決策，美國同意售予臺灣的武器清單，無論在性能與數量上，皆較往年增加，其中包括敏感的紀德級驅逐艦及P-3反潛直昇機，及其他可以提升戰機與飛彈導引系統引力之裝備。²⁵顯示臺灣在美、中衝突事件上獲得了武器採購的利益。尤其，布希總統突破美國長期不出售潛艦的限制，布希認為潛艦兼具攻擊性與防禦性，是接近「臺灣關係法」的精神。《紐約時報》社論是原先反對出售潛艦給臺灣，美國有些人認為此項出售案跨越「紅線」區，德國、荷蘭是否配合美國的承諾亦有待克服，但布希的這項決策確實是一項困難的抉擇。²⁶這也使得江澤民在1998年訪問美國時，說出「對付臺灣最好的途

²³ 尼克森 (Richard Nixon)，《新世界》，丁連財譯，頁 162-169。

²⁴ 包宗和，〈影響柯林頓對華政策的正負因素〉，《美國月刊》，8卷1期（1993年1月），頁30。

²⁵ 《中國時報》，民國90年4月25日，版1。

²⁶ Weapons for Taiwan,”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2001; “The Right Touch on Taiwan Arm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5, 2001; “Policy Adjustments on Taiwan,”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1.

徑是經過華府而不是經由打飛彈」²⁷，這句話充分凸顯的是，臺海兩岸關係中「美國因素」的重要性。

1997年10月及1998年6月「柯江會談」時，美國柯林頓總統皆曾敦促大陸，表示臺海兩岸應重啓對話。柯林頓總統曾於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中提及，「美國希望兩岸能重新展開建設性對話並擴大兩岸交流，最終兩岸問題仍須中國人自行和平地解決」、「美國愈鼓勵兩岸對話，愈有利於美、中關係」、「兩岸重啓對話為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最佳途徑」等語。²⁸在沒有特殊或偶發事件破壞目前的兩岸關係或是美、中關係的前提之下，美國將會一面維持穩定的兩岸局面，一面試圖探索中共在臺灣議題上容忍的底線，以作為箝制中國大陸的政策依據。就北京而言，美國因素當然是重要顧慮，只是過去他們一直是以負面影響來看，視「美國為阻撓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要角；江澤民換了角度，從正面去看待美國，而與美國交好來達到「制約臺灣」的效果。

在冷戰時期，臺灣與日本、南韓及菲律賓構成了嚴密的防禦島鏈，有效扼阻了共黨勢力對外擴張，也保障了民主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冷戰結束後，各國均致力於經濟發展，並開始著重經貿航運的安全，尤其臺灣在維護臺海安全的貢獻上，深獲美、日重視、肯定，亞太各國也逐漸重視臺灣的戰略地位。

就地緣戰略言，臺灣位於花彩列島的中央位置，也是連結東北亞與東南亞的臍帶，而台海地理位置不僅居於樞紐地位，平時即利於掌握區域內的交通往來，戰時由臺灣起飛的航空器更可將控制範圍向臺灣的北、東、南方各延伸800至1,000公里左右，在西太平洋構成此一南北長2,000公里、東西寬約900公里的防線。因此任何區域內的國家若能掌握或影響臺灣，便能有效控制或影響區域內的海空交通，則對該國國家利益將有莫大的助益。²⁹

美國防部資訊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學家布魯斯·布萊爾博士指出，中國到底是前蘇聯式的冷戰敵人，還是邪惡軸心，美國現在還沒有明確的歸類，所以才會使用國家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和「先發制人」戰略，加上「相互威脅戰略」一起來對付中國。³⁰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可以解讀為對中國所發出的一種含蓄的警告：中國到底是選擇加速轉型，參與民主潮流主導的國際新秩序的建設，還是繼續僵化地墨守成規做「反潮流的英雄」，這是北京必須作出的抉擇。

臺北當然對於「美國因素」感受更深。從美國與中共建交到美、中之間對臺

²⁷ 冉亮，〈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時報》，民國87年10月18日，版3。

²⁸ Joint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Clinton and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October 29, 1997;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Clinton and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June 27, 1998.

<http://www.pub.whitehouse.gov/uri-res/I2R?urn:pdi://oma.eop.gov.us/1997/11/6/1.txt.1>

²⁹ 《自由時報》，〈臺灣問題美日不能不管的國際問題〉，1999年8月1日，版6。

³⁰ 《聯合報》，〈臺灣海峽的安全情勢〉，1999年2月27日，版13。

殺傷力甚強的「三公報」（1972年上海公報、1978年關係正常化協議、1982年美國對台軍售聯合宣言）就是表明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美國並不鼓勵臺灣獨立，美國期望中國大陸採行和平策略解決兩岸問題。」³¹其中「一個中國」和「三不政策」的政治意涵，其實只是三個聯合公報的延伸，屬於再次重點強調不承認、不支持中華民國，立場完全偏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再到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口頭重申的美國對臺「三不支持」（不支持臺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也不認為臺灣應加入任何必須以國家名義才能加入的組織）政策，³²都讓臺灣備感焦急；所幸斷交之際還有美國國會的拔刀相助通過《臺灣關係法》，對臺提供軍售，也使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得以延續發展下去。臺灣在民主化以後所得到美國各界無保留的好感與支持下，「美國因素」當然也扮演了相當正面的角色。而兩岸之所以同意在1998年10月的接觸與會談，也何嘗不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多少做給美國看。

美國方面一直希望促成兩岸會談，例如：《華盛頓郵報》自北京發回的報導大力推崇汪道涵放出的試探氣球（讓臺灣保留自己的軍隊，甚至國旗國號等），事實上這是中共高層早就提過的東西，偏偏還有美國學者視之為「近五十年來北京對臺北所提的最好的交易」，大有促臺北不要錯過機會的意味；例二是《紐約時報》社論就辜汪會談雖持正面評價，對臺灣也頗具善意，但顯然對臺北觀點還是不夠了解而支持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例三則是中共駐美大使館的積極作風，打破往例由國防武官出席美方學術會議，說明中共解放軍重視「和平與穩定」、「防衛而非攻擊」之性質，明顯有意淡化美方對「中國威脅」的顧慮。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何漢理（Harry Harding）則認為其實臺海兩岸一直都在試圖拉攏並影響美國，而美國也總是在這拉鋸戰之間左右搖擺，「新三不」政策宣示就是個例子。這可能是美國政策上的考量，也更可能只是考量如何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³³

二、區域整合

西方世界對於亞太地區的評價，可以從兩個世紀前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說的：「地中海是過去，大西洋代表現在，太平洋是未來之洋」³⁴這句話在本世紀末之今天，已經逐漸實現。現今世界上的經濟勢力逐漸形成三極化的結構，

³¹ Jan C.Berris, Michel Oksenberg, "The American View of Chin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repar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1999),p. 64.

³² 《中國時報》民國87年7月1日，版3。

³³ 《中國時報》，民國87年7月3日，版3。

³⁴ 轉引自外交部長胡志強於1999年6月在北加州世界事務協會專題演講。

即太平洋西側之亞太地區、歐洲與太平洋東側以北美為中心之美洲大陸等三大地區。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逐漸成為趨勢，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逐步從大西洋移至太平洋，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日益引人注目，美洲與亞洲的經濟聯繫亦正在不斷加強。以亞太地區而言，總人口數超過二十億、國民生產的總額超過十一兆美元，將近全球生產總值的一半。³⁵目前美國與東亞各國的貿易量已經超過其同西歐各國的貿易量。伴隨著世界經濟集團化、區域化步伐的加快，地區性的經濟整合日益成為國際經濟運行的新形式。這種區域性經濟體系賦予國際分工以新的發展形式，它除了追求比較經濟利益外，更為側重對區內經濟資源按照協議加以合理配置，而對區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平等競爭進行限制。

在亞洲區域的區域國際組織中，「亞太經合會議」（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為 APEC）是亞太重要國際組織之一，也是目前臺灣唯一能參與的國際組織，且是現今臺灣參與國際社會層級最高的組織。美國在與臺灣斷交之後制訂了《臺灣關係法》，在《臺灣關係法》中的第四條第四款「本法之任何條款，概不得被解釋為在成立或是驅逐臺灣在任何國際金融機構或任何其他組織會籍之依據」。此是美國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的態度，但美國卻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美國前亞太事務國務卿溫斯頓·羅德（Winston Lord）說明「美國不支持臺灣進入聯合國」³⁶，但美國設法在臺灣目前無法加入的國際組織中，例如聯合國，使臺灣的意見獲得充分的表達，而且美國也協助臺灣加入非以主權國家為會員的國際組織，³⁷例如臺灣加入 APEC。在 1991 年時，臺灣同意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的名稱入會，當時的中國大陸雖然也還未加入 APEC，當然持反對的意見。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表示：「如果中國政府反對臺灣加入，那就全部放棄，兩岸都不要加入」。³⁸由於中國的妥協，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於 1991 年同時加入 APEC，入會時以「會員經濟體」（member economies）代替具有爭議性的會員「國」字眼。

另一個重要的區域或際組織則為東南亞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東南亞國協的十個會員國分別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新加坡、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寮國。因冷戰過後，蘇聯瓦解，俄羅斯在亞太的勢力不如以前具有威脅性，中國大陸的軍事及經濟力量的壯大，使得亞太國家對中國大陸的經貿市場所吸引，但另一方面卻也對中共軍事威脅懷有戒心。至於臺灣與「東南亞國協」之間的關係，最具體的行動是在 1993 年臺灣提出「南

³⁵ 林郁方，「柯林頓政府的亞太戰略」，美國月刊，第 9 卷，第 1 期（1994 年 1 月），頁 46。

³⁶ 吳玲君，「從美國「三不」分析臺北對華府的外交策略」，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1999 年），頁 3。

³⁷ 吳玲君，「從美國「三不」分析臺北對華府的外交策略」，頁 8。

³⁸ 《聯合報》，民國 83 年 9 月 10 日，版 2。

向政策」³⁹，藉此和東協國家建立良好的經貿關係，並希望更進一步的在政治事務上有所接觸和互動，將臺灣整合到東南亞的政經體系之中，擴展臺灣的亞太生存空間。簡言之，「南向政策」的目的不僅是為改善臺灣與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也是要拓展實質外交關係，積極部署及參與「東南亞國協」、「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 CSCAP）、「東協自由貿易區」、「東亞經濟共策會」（East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EAEC）等其他亞太區域組織準備。⁴⁰但東協國家一方面歡迎臺灣前往東南亞當地投資，但另一方面因 1949 年 10 月中國大陸即對外宣布，凡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均應與臺灣斷絕關係，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並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中國大陸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但對於建交國與臺灣發展經貿、文化關係，中國大陸所持的立場是：「臺灣作為中國的一部份，它在國際上無權代表中國，不能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和發展具有官方性質的關係，但考慮到臺灣經濟發展的需要和臺灣同胞的實質利益，對臺灣同外國的民間經濟、文化往來，中國政府不持異議」。⁴¹在承認中國大陸「一個中國」原則之下，東協國家採取「政經分離」政策，不與臺灣互設官方性質的機構、發展有官方性質的外交關係、簽訂任何有官方性質的協定與文件、派遣具有官方性質的官員訪問臺灣，故和臺灣的互動只限於經貿層面。

亞太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有所改變，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逐漸成長、加上中國大陸具有廣大的市場腹地、龐大市場經濟的發展潛力，已超過臺灣的戰略價值範圍。有鑑於此，APEC 的會員體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也逐漸地改變。

屬於軍事安全的區域組織為「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區域論壇」是專門討論安全議題、並促進各政府間互動的一個組織，由東南亞國協的成員國為主要參與者，在開會期間也會邀請其他國家參與。1995 年 7、8 月和 1996 年 3 月，中共於臺海地區實施導彈試射，使該區域緊張態勢急遽升高，也使得美、日兩國取得充份之理由來提升其戰略合作以共同對抗中共的坐大，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遂應運而生，對中共之「軟圍堵」戰略焉然形成。⁴²

然而大陸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所長李非認為，從亞太經濟格局看，兩岸處於東亞與東南亞兩大經濟板塊之間，具有「經濟樞紐」的戰略地位。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東協國家正加快經濟合作步伐結成具有特殊地緣經濟利益的東

³⁹ 民國 83 年 1 月初由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及在 2 月中旬由李登輝總統分別訪問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及泰國後，行政院於民國 83 年 3 月 19 日核定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臺灣稱為「南向政策」。依照行政院計畫，「南向政策」以三年（民國 83 年至 85 年）為實施期間。這項計畫整合了經濟部、外交部、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經建會、僑委會等共 12 個單位，由經濟部會同相關單位組成「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專案小組」，負責實際推動臺灣與東南亞各國的實質關係。

⁴⁰ 《聯合報》，民國 83 年 1 月 3 日，版 2。

⁴¹ 南亞國協網站。<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ramm33.htm>。

⁴² 席來旺，〈美國對日安全戰略的重大調整〉，《現代國際關係》，1996 年，第 6 期，頁 7-9。

南亞板塊，並逐步與毗鄰的東亞板塊和南亞板塊整合。兩岸有必要積聚區內強大的聚合力，以便在亞太南北經濟結構中營造更大的經濟利益。一方面，通過加強與新興的東南亞聯盟國家的經濟聯繫，使經濟發展空間得以向南擴展；另一方面，背靠縱深廣闊的亞洲大陸市場，使經濟發展腹地得以向北、向西延伸。以大陸經濟板塊看，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行政區劃為主體的經濟管理模式已經被打破，以經濟關係為紐帶的區域經濟協作日益得到加強。⁴³在這二個經濟區的結合上，以臺灣海峽為紐帶的兩岸區域經濟協作區也正在形成。兩岸之間在經濟腹地上互有交叉重疊，進一步深化兩岸已具雛型的產業互補分工體系，加快區域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將促使海峽兩岸經濟區發展成為牽引大陸經濟增長，並與華南、華東二個經濟區鼎足而立的第三個動力中心。李非認為使臺灣在資本、製造、管理方面的優勢與大陸在資源、勞力、市場腹地方面的優勢相互結合，形成互補、互利、互惠以及相互依存的關係，兩岸經濟聯繫才能展示出它的發展遠景。

或許兩岸經濟力各自發展及相配合，能夠讓雙方無論從國際上、政治上、經濟上都能得好處，是未來兩岸關係的朝良性互動發展的最重關鍵所在，兩岸民眾追求經濟福祉的意志力，才真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動力。⁴⁴

第二節 臺灣的政治環境變化

臺灣開放交流以來，大陸方面對臺的不友善態度，從政府到民間，一直是臺灣對大陸的既定印象；大陸的各項條件落後臺灣甚遠，再加以大陸政治的不民主，除了文化和民族情感外，臺灣普遍對大陸沒有好感。1994年3月31日大陸千島湖事件，一個臺灣旅遊團，有十幾位臺胞在大陸千島湖，遭大陸同胞強盜、殺害，激發了臺灣同胞對大陸的不滿情緒；⁴⁵1996年3月8日至3月14日，中共在臺灣兩端海域進行導彈發射訓練，意圖影響臺灣總統大選（亦為臺灣真正實現民主化的里程碑），更加深臺灣同胞對大陸的極度不滿。⁴⁶而臺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問題，則因民主化、本土化的推展及對大陸的不滿，越發地突顯出來。但長期以來，臺灣的大陸政策仍以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的大陸政策為主，未來的統一中國仍是整個大陸政策的主調。故本文不另作國民黨的大陸政策研析，而直接從在臺新興政黨的大陸政策演進來說明臺灣民眾對大陸政策，甚或對統獨意識意見的表達。

事實上長期以來臺灣大陸政策最大的隱憂，並非來自中共的杯葛與打擊，而

⁴³ 李非，〈從濟板塊看兩岸經貿關係〉，《投資中國》，第26期，（1996年4月），頁8。

⁴⁴ 李孟洲，〈經濟規律終將戰勝一切〉，《投資中國》第95期，（2002年1月），頁9。

⁴⁵ 《中央日報》，民國83年4月10日，版1。

⁴⁶ 陸委會網站，〈兩岸大事記〉，<http://www.mac.gov.tw/>。

是來自臺灣內部朝、野間共識基礎的薄弱與紛爭的不斷。⁴⁷朝、野各黨共識無法凝聚原因，雖與各自堅持不同的意識型態有關，亦與朝、野雙方一直無法建立起制度化共同參與共商兩岸事務有莫大的關係。在兩岸關係日益迫切的情況下，大陸政策不僅與臺灣的外交、國防、經貿、內政等息息相關，其更攸關到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兩千三百萬人的安危福祉。

臺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可以由原一黨（國民黨）獨大的黨外勢力崛起為一觀察指標，亦即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的發展史。第一波反對運動期（七〇年代末期，即「美麗島事件前後」），其主要訴求是以民主化為重點；而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以後的第二波，因外在環境的改變，弱化了國民黨「動員戡亂時期中國法統」意識型態的合法性，較完整的「臺灣民族主義」於焉產生，以對抗「中國民族主義」，主要的訴求也由較溫和的民主化轉為較激進的「本土化」訴求。

1986 年民進黨的成立，代表了臺灣政黨政治正式進入政黨競爭的民主階段。政黨之間的競爭，多半是反映著選民對於社會已存在問題的意見，或是對於不同利益的追求。簡而言之，政黨的分化，即是在反應社會的分歧。⁴⁸而臺灣政黨政治的重要特色主要是以對於臺灣前途的不同見解來區分。換言之，對於臺灣前途的最終解決為何，是目前臺灣社會的重要分歧。由國民黨與傳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泛藍陣營，代表了中國與臺灣應該屬於同一政治疆域，並認為臺灣最終應該與中國統一，臺灣與中國的分離是暫時性的，這樣的論述可以稱為「統一論述」。而民進黨與泛綠陣營則傾向認為，臺灣與中國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政治疆域，臺灣與中國的關連不一定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樣的論述可以稱為「臺獨論述」。

在臺灣「統一論述」、「臺獨論述」這兩種論述的競爭場域，是廣泛存在於各種政治場域中，包括選舉動員、國會議事、外交政策，當然更包括與臺灣前途直接相關的大陸政策。臺灣經過民主化改革之後，選舉已經成為臺灣社會中最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傳播活動。各政黨莫不在選舉期間努力宣傳其政策主張，希望擴充其社會支持程度，進而獲得多數席次或勝選，以期將該黨論述的種種政策，制訂成為政府實行的重要政策。對於臺灣政黨政治及政治主張而言，一般仍以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為關注焦點。2000 年總統大選後，首見臺灣政權經由和平轉移到反對黨，陳水扁以近四成的支持率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故民主進步黨的大陸政策，亦受到高度的重視，而不再只是兩岸交流中的雜音。

⁴⁷ 張五岳，〈評「辜汪會談」政治性準備工作〉，國家政策雙週刊，第 56 期，1993 年 3 月，頁 14-15。

⁴⁸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臺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第 74 期，1993 年，頁 33-61。

一、民進黨中國政策的演進及臺獨的合與分

1987年10月，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民主進步黨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該政策最特出之處在於，民進黨已經明白表示反對國民黨施行有年之「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同時對於國民黨當局將兩岸交流僅限制於外省人返鄉探親的限制態度，希望將其層面擴大，該政策表示「兩岸人民之返鄉、探親、尋親、通郵、通話、掃墓均不應加以限制，且可直接申請，不必經由第三國」。⁴⁹在當時的保守政治氣氛下，民進黨的黨綱中明白主張「臺灣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決定」，⁵⁰儘管並未提及「主權」、「獨立」、「建國」或「公投」等字眼，但是已經是對國民黨大陸政策長期以來所設定的預設統一立場，提出挑戰。在此階段，民進黨僅僅提出「自決」而未明顯言及臺灣獨立，則明顯為黨內派系妥協的結果。

民進黨在建黨後投入的第一次選舉，是1986年年底的第一屆增額立委、國代選舉，民進黨推薦四十四人參選，當選二十三人，得票率立委為二成五左右，國代為二成二。⁵¹該次選舉結果代表了黨外人士已經正式在中央級議會取得政黨的正式地位，也是正式宣告國民黨一黨壟斷政治權力時代的結束。民進黨成員在各項議會質詢中，不斷凸顯不同與國民黨的政策差異，尤其是凸顯與國民黨大陸政策之差異，如反對國民黨之「三不政策」。

1987年11月，民進黨第二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之自由』聲明」。⁵²該聲明中言明臺灣獨立之主張相對於德國模式、新加坡模式、一國兩制或大中華邦聯等不同主張，皆應尊重其提出討論之言論自由。但是，由長期的趨勢來看，這篇聲明事實上代表民進黨的臺獨論述，已逐漸由住民自決朝向臺灣獨立發展的指標。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黨綱修正案，⁵³在黨綱的基本綱領中，增列「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的主張，民進黨認為「臺灣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決定」，乃是「依據『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國際規約』所揭示的原則，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且能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追求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臺灣的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聯合，都沒有決定臺灣政治歸屬的權利」。⁵⁴當時時任民進黨立委的陳水扁提出附

⁴⁹ 「民主進步黨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臺北：民進黨中國事務部，2001），頁1。

⁵⁰ 民進黨全球資訊網。<http://www.dpp.org.tw>

⁵¹ 民進黨全球資訊網。<http://www.dpp.org.tw>

⁵² 「民主進步黨第二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決議文－『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之自由』聲明」，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頁2-3。

⁵³ 〈「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基本綱領全文〉，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

⁵⁴ 謝敏捷、邱正仁，〈唯一選項或民主選擇：臺北、北京、華府關於兩岸關係前景的爭議〉，《中國大陸研究》，44卷9期，2001年9月，頁32。

加「應交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文字，使得堅持民主程序的民進黨各反對意見的更加整合，對於「公投臺獨黨綱」加以支持。

民進黨的「公投臺獨黨綱」，顯然對於國家認同的問題上，民進黨急迫地想要把臺灣獨立這問題，從隱藏性的議題變成政黨公開訴求的重點。因此，1991 年的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也就成為檢驗民進黨「公投臺獨黨綱」的試金石。同時配合提出「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代表「制憲建國」的路線，以區別於國民黨的「修憲」。⁵⁵

1993 年 4 月，兩岸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使得 1993 年成為國民黨主政時期兩岸關係最為和緩的時間點。但是，其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重返聯合國」運動，以及 1994 年 7 月陸委會發表的「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⁵⁶，都可見到李登輝逐漸強調臺灣的「政治實體地位」。代表執政黨的李登輝總統大量吸納民進黨大陸政策為己所用，李登輝因此也得以對於民進黨發揮高度的政治影響，幾乎成了半個民進黨人，形成「李登輝情結」。⁵⁷1996 年的總統選舉，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首次國家領袖層級選舉，在中共的文攻武嚇之下，臺灣前途與國家認同成為該次選舉的焦點。此次的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率則是創黨以來最低，引發黨內對於臺獨論述的修正辯論，同時黨內激進勢力也另組建國黨，顯然民進黨自「公投臺獨黨綱」通過以來，所持續堅持的臺獨論述，仍無法取得臺灣大部分住民認同。民進黨原來強烈明確的「臺灣獨立建國」訴求，面臨黨內要求修正，民眾要求轉型的壓力。⁵⁸

民進黨在 1998 年舉行的中國政策辯論會，是讓民進黨內部在已對臺灣主權達成共識後，繼續對國家利益與國家戰略分歧意見的辯論。訂定以「強本西進」政策，希望取代執政黨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為基本綱領，同時讓民進黨其他政策內容也更加務實與具體。⁵⁹

1999 年 5 月 9 日，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該決議文中聲明「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臺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⁶⁰

民進黨在陳水扁當選第十屆中華民國總統之後，正式取得執政地位後，提出

⁵⁵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臺北：天下，1998 年 4 月，初版），頁 69-70。

⁵⁶ 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mlpolicy/mlp2_3.htm。

⁵⁷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8-9。

⁵⁸ 《中國時報》，「新三不單頂，臺獨路線怎麼走」，民國 87 年 7 月 8 日，版 15。

⁵⁹ 「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共識」，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臺北：民進黨中國事務部，2001），頁 58-62。

⁶⁰ 「臺灣前途決議文」，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臺北：民進黨中國事務部，2001），頁 88-91。

「四不一沒有」⁶¹與「政治統合論」⁶²等主張。這些和陳水扁競選時所提出的「新中間路線」，皆可以視作在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主權獨立與民主程序間的平衡策略。2001年10月20日，民進黨第九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開創臺灣經濟新局決議文」，這是民進黨執政後首例決議文，經全代會修正後位階等同黨綱，藉此淡化現有意識形態掛帥的臺獨黨綱。因此，「開創臺灣經濟新局決議文」之通過代表了，民進黨在經濟與政治上向新中間路線的靠攏，也進一步深化政策務實化與民進黨與時俱進的特色。⁶³民進黨臺獨主張亦隨國內、國際政治的變遷而轉變。

從1983年住民自決論，提出「臺灣前途應由臺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四年後，發表聲明「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1988年提出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國民黨出賣臺灣人民之利益、中共統一臺灣、國民黨不實施民主」，主張應該獨立。1990年提出「事實主權論」。1991年提出臺獨黨綱，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是否建立臺灣共和國。1995年提出革新保臺論，表示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臺灣獨立。1996年的臺獨新世代綱領，主張臺獨運動不再是反對運動，而是國家整體目標。1998年美國柯林頓總統在上海口述的「新三不」，使臺獨運動空間遭到擠壓，臺獨路線更加務實化；⁶⁴1999年5月民進黨全代會，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主張「臺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決定」，並首度接受中華民國的國號，臺獨主張已蛻變為「保持現狀就是事實獨立」。⁶⁵

然而民進黨所帶領的臺灣本土化意識隨著民主化的深化而強化，其層面並非限於政治的全面本土化及民主化，更擴及文化、認同的本土化(如宣告獨立、更改國號國旗...等等)。再加上民進黨在九〇年代前後的數次選戰策略皆以本土化為主軸，因而激發了國家認同的議題。臺灣目前正由「民主過渡」至「民主鞏固」，成功與否繫於國家認同問題之解決。有鑑於臺灣民主轉化進程，是與政權本土化、國家建立(nation building)齊頭並進，族群間權力重分配與國家認同的問題，自然便與民主化密不可分，也因此減少了民主策略的選項。而且國家認同的衝突讓國家整體目標難以確立，政治體系中「忠誠的反對」亦難有生存的空間，連帶使公共

⁶¹「本人深切瞭解，身為民選的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自當恪遵憲法，維護國家的主權、尊嚴與安全，確保全體國民的福祉。因此，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2000年5月20日，<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licy.htm>。

⁶²陳水扁總統提出的政治統合論，<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licy.htm>，2000年12月31日。陸委會網站。

⁶³「開創臺灣經濟新局決議文」，民進黨網站，<http://www.dpp.org.tw/>。

⁶⁴裘兆琳，〈柯林頓政府新「對台政策」的制定〉，《國家政策雙週刊》，民國1995年3月，第108期，頁11-13。

⁶⁵張黎宏，〈兩岸政治分歧與未來兩岸政治關係〉，《臺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4期，頁59-66。

政策理性的討論成爲不可能。不但如此，國家認同的分歧也阻礙了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可能因中共武力的威嚇使我國民主機制的鞏固，受到某種程度的傷害。故如何整合國家認同問題，是國內朝野必須嚴肅面對的重要課題。

二、國家認同與族群文化認同

認同是長期的感情歸屬，將自身定位爲某一特定群體(或國家)的一份子，彼此有著共同的利益與情感，而且己群與他群之間清楚有所分別；認同亦可指所屬群體(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法理地位，以及如何界定其國民存在的時空意義。⁶⁶國家認同是指一群人主觀上認爲共屬於相同的一群人，而且具有獨立自主的政治主權。亦即人民主觀上自覺共歸於國家組織結構的一種肯定，彼此間有相互依存的互補性。具有國家認同的人，常以某一特定的群體做爲思考的單位。基本上，國家認同的特質有三：第一是共同體成員會表達其政治意志；第二是以論述的方式表達認同；第三是國家認同是構成正當性不可或缺的基礎，必須能形塑公民行爲的動機。臺灣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之所以高度複雜原因有二：第一是民族主義的主張(nationalist claim)與國家定位的主張(statehood claim)須明確劃分。⁶⁷因爲臺獨與臺灣人認同雖相關但並非相同，如有些人主張臺獨是因爲兩岸制度差距過大；第二是在國家認同與國家定位上，各自存有中間地帶。如國家定位上希望維持現狀，而在國家認同上自認既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⁶⁸

在臺灣，國家認同問題，同時涉及族群認同、省籍問題。族群代表與其他社會群體組織原則不同，此一原則是以「共同的來源」做爲確定成員範圍的核心元素。⁶⁹但是此共同的來源並非是完全真實的，常常是爲了達到「未來」的政治目標而重組「過去」，故族群的重要性須由「現在」而非「過去」的狀況去找答案。族群是臺灣政治發展重要的變項之一，族群認同的形成是來自世代遺傳及相伴隨的文化傳承，至於臺灣族群認同主要是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才形成，透過其所掌控的政治權力來單向推動其優勢的語言、文化。⁷⁰國內族群間因世代交替的差異、缺乏明顯的地理區隔、廣泛的通婚現象，使得族群界限模糊化，故臺灣

⁶⁶ 陳毓鈞，〈中共的「中國統一」政策與民族主義〉，《中國大陸研究教學參考文摘》，1985年3月，第17期，頁19-25。

⁶⁷ 陳雲根，〈中國近代史的兩個缺陷-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民主中國》，1995年，第25期，頁59-61。

⁶⁸ 郭正亮，〈政黨定位與統獨內涵的變遷〉，輯於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編〈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5月，頁1-9。

⁶⁹ 陳光中，〈臺灣結與中國結的再試析〉，載於趙少康、謝長廷等著《臺灣與中國前途》，臺北：聯經，1987年10月，頁189-195。

⁷⁰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國家政策雙週刊》，1992年4月，第32期，頁1-3。

是多元族群區隔的社會，而非族群分裂的社會。⁷¹分析族群認同不得不談及省籍問題，即本省人與外省人之區分。整體而言，本省人與外省人最大的差異在於共同記憶。對省籍的分野，是歷史與社會的建構所使然，源於不同群體的人基於互動、社會想像創造而成。其並認為省籍的分類是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前提下而成立，但在臺獨禁忌於 1991 年遭突破後，臺灣已無「省籍問題」，只有「國家認同」問題。⁷²臺灣的省籍融合並非是自然的過程，目前雖在文化層面上已相當融合，但是社會結構仍有區隔。在認同與語言上，此兩個族群仍具有顯著的區別。

國家認同的趨勢，在臺灣近年來已出現了變化。根據陸委會委託國內各民意調查機構，對臺灣民眾國家認同變遷所做的民調資料顯示，從 1992 年 9 月的民調資料(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佔四成四，自認是臺灣人的民眾佔一成六七，自認既是中國人與臺灣人的佔三成六五)至 1999 年 8 月的民調資料(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佔一成三一，自認是臺灣人的佔四成四八，自認既是中國人與臺灣人的佔三成九九)，其中演變可看出臺灣人認同的百分比一路上升，而中國人認同的百分比逐年降低，尤其在臺灣將兩岸定位為「特殊國與國關係」後，臺灣人認同高達四成四八，是例年來的最高點，而自認是中國人的僅佔一成三一。臺灣意識迅速高漲，成為主流民意。另有關於國家未來走向的問題，歷年來主張廣義維現狀(包括「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的民眾已佔大多數。⁷³

由於臺灣認同與維持現狀已成為臺灣社會主流價值，致使國內各政黨不得不與時俱進，致力於轉型工程。國民黨為了爭取臺灣意識選民的認同，已將中國本位的「中華民國法統」，修正為以臺灣本位的「中華民國在臺灣」；而鑑於民意主流趨向維持現狀，民進黨也不得不重新修正臺獨論述，強調維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臺灣民意對國家定位的走向，目前是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狀況，即目前維持現狀為宜，統獨非迫切問題，將來再予以決定。維持現狀的主流民意將國家認同定位在模糊地帶，就凝聚國民意識方可保家衛國的角度而言，對臺灣整體安全並非有利；其間所涉及的族群問題(如 1999 年臺北市長選舉，即被視為族群投票)，對臺灣民主鞏固進程，將是一大考驗。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又位居大陸的邊陲地帶，自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並對其產生深厚的歷史情感與認同，但是文化、血緣上的認同並不能等同於法律政治上的認同。⁷⁴中華民國在臺灣事實上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對國家的效忠與臺灣土地的認同，是不能有任何灰色地帶的。

⁷¹ 鄭又平，〈臺灣的族群認同與政黨政治的互動關係〉，《理論與政策》，1985 年春季號，頁 53-64。

⁷² 張茂桂，〈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國家政策雙週刊》，1992 年 4 月，第 32 期，頁 8-9。

⁷³ 〈民國八十八年民眾對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的看法綜合分析〉，1999 年 1 月 31 日，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licy.htm>。

⁷⁴ 《中國時報》，〈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別〉，民國 88 年 1 月 2 日，版 15。

誠然，國家認同的轉變，是一個長期社會政治運動過程，不可操之過急，對於國家認同及統獨問題，在未經過群體協商以凝聚共識之前，實不宜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之。解決內部對立，避免衝突的昇高，必須透過集體協商的方式以凝聚共識，並利用政治經濟及文化制度的安排，漸進地形塑國家的認同。對於極為敏感、充滿不確定性的統獨問題，更須拋棄激情、煽動的情感訴求，轉為理性客觀的統獨政策辯論。⁷⁵

政治現實侷限了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激進路線。前者認為臺灣事實上已是主權獨立、民主自由的國家；後者亦體認到兩岸政經制度相距甚遠，急統將破壞現有成就，其所認同的是中華民族及文化，而非中共政權。在此政治現實驅使下，維持現狀成為眾所接受的事實，現狀的維持亦提供了形塑國家認同所需的時間。臺灣社會目前須跳脫族群民族主義，積極建構公民民族主義，以尊重人權及公民權、強調公民意識與公民倫理、培養對政治社群的政治忠誠為要務，樹立起以同一國家及社會共同體成員資格為首要的行事法則，在自主自治的基礎上，建立民主法治的社會。⁷⁶唯有建立起互相尊重與包容的公民社會，避免民粹偏鋒路線，國家認同的整合建構工程，才能克竟全功。

三、臺灣民主化運動與臺獨的形成

臺灣的民主化及與大陸在時間、地理上的隔閡，使得臺灣人民對「統一」這個概念已非是一個必須，而是一種選項，從歷次的民調中顯示八成以上民眾主張兩岸間應維持現狀便可知。雖然臺灣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頗深，但是文化上的認同並不代表政治意識上的認同。

臺灣的民主運動和臺灣獨立運動雖各有不同的發展範疇，但也有相當大的交集存在。鑑於臺獨運動的刺激，使臺灣建構民主機制之動力，不虞匱乏；例如在兩岸談判上，中共認為臺獨是影響兩岸談判的重要因素。中共認為，臺獨與其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若臺灣獨立出去，將損害國家生存、安全利益，嚴重削弱國家尊嚴；為了對臺灣的打壓，對於臺灣各項政治的發展、務實外交推展，都貶抑為臺獨及獨臺路線。但事實獨立則為臺灣政經發展的必然結果。中華民國經過 1992 年立委全面改選、1994 年省市長大選、1996 年首任民選總統大選、1997 年縣市長選舉、1998 年北高市長選舉後，已成為政治民主的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益趨鞏固，與中共在政治層面上的差距，更加擴大。縱使臺灣的邦交國始終維持在廿九個上

⁷⁵ 張茂桂，〈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載於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北：月旦，1995 年 5 月，頁 92-116。

⁷⁶ 張曉剛，〈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國際政治》，1996 年 10 月，第 10 期，頁 19-24。

下，但是與世界各國的實質關係密切，事實上中華民國在臺灣已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⁷⁷相反地，因民主機制的正當化與本土化，使臺獨論述與中華民國臺灣化(即中華民國在臺灣)相結合，如民進黨已接受中華民國的國號，並認為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故此，兩岸的政治架構，務必在承認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立國家之前提下，才有商討的空間，且須獲得臺灣人民的同意。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並非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之上，其合法性基礎相當脆弱，中共方面雖一再表示對臺統一有急迫感，然而促統的論調，只會使臺灣內部大陸政策的更趨於同，而以維持現狀為上策。

據大陸學者蘇格指出，中共之所以從反獨轉為促統，乃是憂慮臺灣政情的發展:其一是以公投為主的「顯性臺獨」；其二是民進黨主張的臺灣已經事實上獨立的「隱性臺獨」；其三是久拖不決的「潛性臺獨」。然此觀點與中共學者劉國琛於 1995 年所提出的看法不同，劉國琛認為顯性臺獨是民進黨對「臺灣共和國」的崇拜，而隱性臺獨則是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崇拜。⁷⁸其因可能在於蘇格已明瞭臺灣政治發展的現況，而未來臺灣人民是否以公投決定臺灣未來，成為中共方面最關切事，故將其列為顯性臺獨。而影響兩岸關係的臺獨運動，在此階段亦出現轉折。民進黨時任主席施明德於 1995 年 9 月 15 日在美國公開表示「民進黨如果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臺灣獨立」；1996 年 5 月該黨新世代成員公布了「臺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認為經過三月臺海危機之後(總統大選落幕，我國民主政治更加鞏固，民進黨僅獲得百分之二十一的選票)，臺獨運動必須直接面對中國與國際社會，邁向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新階段。綱領中強調臺獨是一務實主張，且為國家整體的目標，不再限於反對運動；臺獨運動建立在社會大和解之上，是團結超黨派的公共財，同時區分新舊臺獨之分：舊臺獨為過去、悲情、民族而主張臺獨，新臺獨則為未來、希望、民主而主張臺獨。此務實的政治主張自與臺獨基本教義派理念相扞格。⁷⁹

1996 年 10 月，建國黨的成立，代表民進黨非主流力量對黨中央臺獨立場務實化的反動，建國黨激進的主張位居於政黨意識型態光譜極端處，與中間廣大的民意趨向脫節，建國黨既已發展為一政黨，就必須接受臺灣民意的考驗，而以大部分的臺灣民眾都希望維持現狀下，該黨所能獲取的選票是否足以鞏固政黨機制的繼續運作，有待時間考驗。

⁷⁷ 郭榮光，〈中共利用民族主義大搞統戰〉，《共黨問題研究》，1997 年 8 月，第 23 卷，第 8 期，頁 121-123。

⁷⁸ 劉國琛，〈試論百年來臺灣認同的轉化問題〉，《臺灣研究集刊》，1995 年，第 3/4 期，頁 95-102。

⁷⁹ 張鳳山，〈論臺獨勢力的住民自決〉，《臺灣研究》，1999 年 2 月，第 2 期，頁 14-21。

第三節 兩岸交流情形

整體而言，近年來，兩岸交流的情況可以用「活絡」兩字來形容。這活絡的交流動力，主要來自民間社會的積極需求，經由探親活動擴大延伸，成為多元化的各類交流活動，影響至大至深。幾年來的兩岸交流，主要在人員往來、文教活動及經貿交流這三方面，這三方面的交流活動，是「共創雙贏的局面」，對雙方社會，提供的好處遠多過壞處，優點遠勝過缺點。自 1987 年 11 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雙方各階層的往來日益頻繁，交流的形式、管道和層次也不斷地擴增及提升。截至 2000 年 11 月底止，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累計達一千七百萬人次，2001 年超過二百四十萬人次；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累計亦已逾五十五萬人次；兩岸通婚的配偶達八萬對。兩岸經貿交流更是快速發展，截至 2000 年底，兩岸間接貿易累計金額已達二千二百億美元，2000 年兩岸貿易總額為三一二億美元，佔臺灣對外貿易總額約百分之十一，其中對大陸出口佔臺灣總出口的比重約百分之十七，若涵蓋對香港出口更高達百分之二十三。台商赴大陸投資方面，據經濟部統計，截至 2000 年底，累計件數達二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件，金額為一百七十一億美元，佔全國對外投資金額比重約百分之三十九（另依中央銀行估計，約有五、六百億美元）。若據大陸方面統計，截至 2000 年底，臺商在大陸協議投資項目為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七項，協議投資金額超過五百零八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二百七十八億美元。⁸⁰兩岸各層面交流頻率之密集，是幾百年來首見。每年二、三百萬人次的人民相互往來、二百多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額、上千萬封的信函往來、電話量更是達到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驚人成長率。

此一情況絕不是任何一方片面的貢獻使然，而是兩岸的政府各自做出一定程度的努力，更是兩岸熱心人士的從中參與；但是，另一方面來看，任何一方政府的作為，卻足以對交流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⁸¹

海基會副秘書長同時併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企劃處長詹志宏表示，以中華民國政府的觀點來看，兩岸交流的量是在持續增加之中，但是品質卻不是同等比例的成長。交流品質的提升並不如人意，而量的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效益已呈下降。舉例而言，來台的大陸人民人數並未成長太多，有緣親身體驗臺灣的社會制度與生活的大陸人民佔大陸人民的比例極少；臺灣到大陸的民眾雖多，但是走馬看花、營取私利者恐怕是佔絕大多數，有心致力增進雙方了解的人士，在大陸可能經常要面臨曲高和寡的窘迫，或是無法盡言的難處。處處設防是交流現狀中核心的部

⁸⁰ 蔡英文演講稿，《開創兩岸和諧新局面》，《陸委會》，<http://www.mac.gov.tw/mlpolicy/ts900422.htm>。

⁸¹ 詹志宏，〈兩岸交流的現況與前瞻〉，<http://www.dsis.org.tw/peaceforum/symposium/2001-02/CSR0102002.htm>。

分，其根源在於雙方的不信任；互信闕如，原因則在北京政府自以為是台澎金馬地區的當然統治者，這種皇帝的庶子心態，造就其在兩岸政治互動上的虛榮感與自殘感。所以儘管兩岸民間交流如此熱絡，但中共卻是利用其僵化的「一個中國」原則打壓臺灣，阻礙雙方建設性的交流，根據陸委會在 1994 年 5 月至 1999 年 6 月間所做的統計，共有二十二件案例，主要呈現在下列各領域。第一，參加臺灣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第二，杯葛臺灣主辦的國際性活動；第三，共同參加的國際性活動要求臺灣改名；第四，在大陸舉辦的國際性活動排除臺灣參加或對臺灣諸多限制；第五，要求臺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做為接受邀請的條件；第六，來臺參訪人員，在有臺灣官員出席的場合拒絕出席或集體退席；第七，在臺活動時，要求移動場地內原有旗、像佈置或拒不出席；第八，邀臺灣參加大陸所舉辦的省級活動；第九，擅改臺灣的國立大學名稱中「國立」兩字或撤換。⁸²

兩岸交流長期以來一直處在不對等狀況，一如政治上的兩岸狀態，詹志宏提出詢問：「而兩岸民間呢？尤其是臺灣民眾是否真由兩岸交流得到好處？或為名？為利？為熱愛兩岸同胞？為追求諾貝爾和平獎？不一而足。如果這些都是真的，那麼十多年的交流，是否實現了兩個政府期望的目標？是否有人的目標已經得以實現？還是尚在努力的過程中？」詹志宏對於兩岸交流提出五項建言：第一、循序漸進應是符合兩岸整體情勢下不得已的選擇；第二、拋棄「兩岸到底有無意識形態」之爭是避免庸人自擾的重要途徑；第三、政治議題的解決不是任何一方的壓迫而可得，但有必要營造可以解決問題的環境與條件；第四、交流品質的提升有賴兩岸政府、臺灣在野政黨與各界的共同努力；第五、共同建立交流規範是增進交流品質的保證。⁸³

第四節 中共對臺政策

兩岸自 1949 年後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1949 年～1978 年軍事對立與衝突時期、1979 年～1986 年相互對峙互不往來時期、1987 年～1999 年兩岸民間交流與協商時期、到 1999 年～迄今僵局對立時期。⁸⁴

中國大陸自周恩來在中共「人大」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即宣布和平解放臺灣、中共八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我國領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9 年「告臺灣同胞書」等都是以「和平解放臺灣」為基調。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對臺政策改弦易轍，以民族大義做為主要基調，「一個兩制」為號召，改變以往敵對或互不往來的狀況。也是從「告臺灣同胞書」開始，初步

⁸² 中公用「一個中國」原則打壓臺灣—阻礙交流實例》，《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mlpolicy/ts900422.htm>

⁸³ 詹志宏，<http://www.dsis.org.tw/peaceforum/symposium/2001-02/CSR0102002.htm>。

⁸⁴ 蔡正文、林嘉誠，《臺海兩岸政治關係》，臺北：業強，1994 年，頁 14-24。

形成「一國兩制」的看法。1981年葉劍英九點保證提出「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保證；1982年「一國兩制」之構想提升至法律層面中共「人大」通過憲法第三十一條；1984年首次使用「一國兩制」字樣，是鄧小平會見美國訪賓布里斯基等人；1984、1985年趙紫陽第六屆「人大」政治工作報告時，「一國兩制」首次用於官方文件。⁸⁵從此「和平解放臺灣」和「一國兩制」即為中共對處理「臺灣問題」上的具體準則。

中共於1972年與美國簽訂「上海公報」後，即為因應臺海新情勢，成立了「對臺辦公室」；並於1980年在對臺提出「和平統一祖國」主張後，又成立「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後改為「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惟兩岸互不來往，故仍無助於交流體系的建立。1988年9月，中共決定設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來負責管理、指導、協調其「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涉「臺」事務，並督促檢查「國務院」有關單位和地方有關部門執行對「臺」工作情況。1991年中共為便於統合事權，以減除「中臺辦」與「國臺辦」黨政分工不明確的現象，乃將「兩辦」人員合併，以「一套人馬，兩塊招牌」方式，就不同對象，靈活運用不同的招牌，對外運作。同年十二月，中共為因應我海基會的設立，再成立海協會，以「民間組織」身分，協助「有關方面」處理兩岸民眾交流事務，成為與我海基會相對應的單位。⁸⁶

而自兩岸交流來，中共對臺政策方法更為靈活，更採取軟硬兩手雙管齊下策略：一方面壓縮臺灣國際空間，一再聲言不放棄武力犯台；另則採取「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策略，積極拉攏台商，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制定台商投資的法規，吸引台商投資，使人不得不懷疑中共在招商的背後，具有強烈政治動機。尤其在冷戰過後各國莫不以拼經濟為國家首要目標，臺灣的經濟實力雖不能與大陸等量齊觀，但中共以經貿實力打壓臺灣務實外交的策略，卻是使臺灣在國際正式外交的空間上急遽壓縮。

一、中共對臺政策訂定的重要歷程

1979年1月1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發表之《告臺灣同胞書》，表明「希望臺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對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同日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中，再次強調完成國家統一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1981年9月30日中共人大常委葉劍英提出《進一步闡明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與對策》，內容為：第一，共產黨和中國

⁸⁵ 張諱雯，〈「一個兩制」與「香港模式」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1995年4月，第21卷第4期，頁51。

⁸⁶ 《兩岸十年交流顧與前瞻》，〈跨越歷史的鴻溝〉，陸委會網站。

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第二，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發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效協議；第三，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第四，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第五，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第六，臺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第七，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第八，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第九，熱誠歡迎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團體通過各種渠道，爭取各種方式提供建議，共商國是，即俗稱的《葉九條》⁸⁷，呼籲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

中共始終以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為談判的訴求對象，但自臺灣解嚴以來，中共逐漸體認臺灣已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各種社會自主團體和力量都對政府的決策過程有影響，因此對臺灣社會內部進行多元的統戰已屬必要。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在 1990 年 3 月 12 日，中共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特別提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我們寄望於臺灣當局，更寄望於臺灣人民。我們願意同臺灣各個黨派、團體和各界有識之士加強聯繫交換意見，共商國家統一大事。」⁸⁸而「臺灣能否回歸祖國。對我們這方來說，無外乎三點：一靠我們的實力。二靠政策。三靠工作。由於臺灣當局不同意與我黨會談，官方接觸比較困難，所以祇有通過民間接觸去做臺灣當局的工作，既做高層掌權者的工作，又做中層、基層的工作、也做臺灣黨派、團體的工作、向臺灣各階層人士宣傳我國的政策，讓臺灣人民真正了解大陸的情況。靠胞情、親情呼喚對方、靠愛國主義激勵對方，靠我黨方針政策影響對方，靠共產黨人為祖國統一大業而鞠躬盡瘁的精神感化對方，爭取他們也能為統一祖國出力。」因此，「在統一祖國問題上，統一戰線將有越來越突出的作用」。⁸⁹

1990 年 6 月 11 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全國統戰會議」，就臺灣問題發表談話：「寄望臺灣當局在適當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地點，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進行商談，在考慮到國共兩黨目前的地位、作用等現實狀況，國共兩黨應儘快進行『對等談判』，其他黨派團體也可共同參與談判。並重申『一國兩制』的正當性和可行性，宣稱在一個國家內實行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我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相互尊重，共同繁榮。」⁹⁰

⁸⁷ 陸委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報刊縮影資料查詢系統」1981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大陸版)一版，中共對台政策資料選輯，頁 412-414。

⁸⁸ 《光明日報》，1980 年 3 月 22 日，版 2。

⁸⁹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統一戰線研究所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統一戰線》（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 年 3 月），頁 174-175。

⁹⁰ 《人民日報》，1990 年 6 月 12 日，版 1。

1990年12月6日中共在北京召開「全國對台工作會議」，在會中確立了以下幾個原則和方針：第一，實現國家統一，寄望於臺灣當局，更寄望於臺灣人民。國共兩黨應儘早接觸談判。談判中可以吸收兩岸其他政黨、團體及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第二，談判可以在高層進行，也可以先從較低的層次開始。可以先談如何促進兩岸雙向交流、實現直接「三通」；第三，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兩岸之間的聯繫，儘快實現雙方向的、直接的「三通」。應當進一步擴大人員交往和各種交流，特別是加強經貿往來。⁹¹由這一系列的會議宣示來看，中共在這個階段對臺灣促談的迫切性非常大，國際上局勢和緩，無安全環境的壓力，正是解決臺灣問題的好時機，因此透過各種機會釋放出要與臺灣當局進行和平談判的訊息。接著江澤民於1991年12月11日在北京「紀念西安事變五十五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再度提及中共和國民黨派出代表進行接觸，以便創造條件，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雙向交流，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在商談中，可以邀請兩岸其它政黨參加。⁹²

1992年5月，中共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訪問美國僑社時指出，兩岸都迫切需要經濟發展，現階段兩岸關係應將經濟工作放在首位，不應把政治敏感問題作為兩岸關係，特別是兩岸經濟合作的前提，兩岸應致力於確保以和平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來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⁹³唐樹備的這段談話正式地向臺灣進行招商，就是企圖「以商圍政」，多製造有關經濟性的議題，而事實上以政治統一為目的地。實際上從1992年中共即密切注意臺灣在第二屆立委選舉後的政局演變，中共認為民進黨政治勢力的提升以及國民黨派系的紛爭，將使中共對臺工作的困難與複雜性日益增加。中共高層眼見臺灣政局已然地多元化，有必要修正過去多年來只以國民黨作為談判對手的既定政策，⁹⁴所以李鵬在3月15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過去有關兩岸談判一貫宣稱「國共兩黨談判」的說法，改為雙方儘早接觸，而中共也將過去的談判對象由「國民黨當局」改為「臺灣當局」，此舉顯示中共為因應臺灣政局的多變性，對談判對手採取「不以國民黨為唯一對手」的彈性認定。這樣的宣示也顯示，中共也已逐漸改變以「國共內戰延續狀態」的架構來規範對臺工作，並針對臺灣政局的變化作相應的調整。

95

⁹¹ 《人民日報》，1990年12月13日，版1。

⁹² 《人民日報》，1991年12月12日，版1。

⁹³ 《中國時報》，民國82年1月6日，版10。

⁹⁴ 《明報》，1993年1月12日，版9。

⁹⁵ 宋國誠，〈一九九三年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的評估〉，《中國大陸研究》，37卷2期（1994年2月），頁48。

二、從國際情勢看中共對臺政策的轉變

冷戰時代的終結，對亞洲地緣政治的影響並不很大，但是戰略版圖仍有改變。對中共而言，其所遭受的衝擊有下列幾點：第一，美蘇之間的和解，使中共戰略價值頓失，中國牌不如冷戰時期般具有意義；第二，共產國家的相繼瓦解，使中共國際地位邊緣化；第三，國家利益取代意識型態，成為對外決策過程的主要因素；第四，兩極意識型態抗衡成為明日黃花，人權躍然成為道德議題，使人權記錄不佳的中共倍感威脅。⁹⁶

1989 年中共以維持政局穩定、繼續改革開放為由，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前的民主運動，以便加速發展經濟，完成四個現代化，這一違反人權的行徑，立即受到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陷於孤立處境。繼之而來的是蘇聯的解體，更加劇了中共政權的困境。由於體系與價值系統的差異，西方認定其為新的威脅來源，使中共成為下一個和平演變的對象，在國際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共外交政策走向不得不做一調整。為應付天安門事件後所產生的不確定狀態，中共採取了四個策略：其一，提醒他國—特別是美國，中共在國際事務上仍具有重要性；其二，強調其對亞洲區域衝突解決的貢獻；其三，對西方適時的讓步；其四，對亞洲採取睦鄰政策。1989 年 9 月中共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的因應世局方針，其後又提出「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此即所謂的「二十八字方針」⁹⁷。此一以「韜光養晦」為核心策略的外交方針，對中共在不斷變動的國際情勢下，為中國找到站穩腳步的基點。⁹⁸

鄧小平於 1980 年代掌權後，看到日本戰後重建之成功，以及臺灣、新加坡、韓國與香港等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之成就，終於覺醒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發展教條之不可行。因此，鄧小平以其務實彈性的理念，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白貓黑貓，只要會抓老鼠就是好貓」，並主張「改革開放」，逐漸引進「市場經濟」，鼓吹致富為先，終於鼓動了大陸農村的初步改革與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⁹⁹中共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使其漸漸脫離孤立困境，重返世界舞台。在這國際環境變遷的中，中共的地位似乎提昇了起來，畢竟中共是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大陸仍握有否決權，就美國言，中共雖然已失去以往對抗蘇的戰略價值，惟在美國全球的戰略佈局，中共仍為穩定世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對美國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之際，需要它的支持，中共正好可扮演一個平

⁹⁶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臺北：月旦，1999 年 5 月，初版。

⁹⁷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20-363。

⁹⁸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臺北：生智，2000 年），頁 111-112。

⁹⁹ 李萬來，《綜述：馬列毛玩不轉的中國共產黨政權》，1999 年 10 月 14 日，未來中國網站。

http://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cc_y50/c99101402.htm

衡者的角色。¹⁰⁰

在這些階段中，顯露出中共外交政策的一貫性，即：反對任何建立地區霸權的行動(如前蘇聯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擴張)、維持對第三世界的支持、極度敏感於對其國家主權及政權生存的挑戰(如臺灣問題)、對外政策的制定仍具有高度的集權性。自六四天安門後，因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受困心態增強，迫使其外交政策以鞏固國家利益為其主要路線，強烈突顯了現實主義的色彩，但是為了突破孤立的困境，積極涉入國際事務後，亦使其在經濟、安全、政治、文化各層面與國際社會產生了高度的相互依存關係。

然而中共自 1982 年以來，即一再強調為了維持國內穩定發展，對外關係必須推展「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以及和平共存」五原則，可是中共在與美國交往及建立所謂「戰略夥伴關係」時，並未放棄其「反霸」反美政策，而其在發展與臺灣之交流關係時，不但一再否定「五原則」之「和平共存」，更遵循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之原則，堅持不放棄武力，也因為中共對臺的黷武政策，再加與美國的磨擦日增，也才會招致所謂「中國威脅論」之恐慌。

101

¹⁰⁰ 衛嘉定，〈柯林頓對華政策的回顧與展望〉，《美國月刊》，8 卷 2 期（1993 年 2 月），頁 8。

¹⁰¹ 謝慶奎等著，《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臺北：五南，1999 年 2 月，初版。

第三章 1998 年辜汪會晤舉行的政治背景

1996 年的臺海危機，是美國和臺海兩岸三角關係的重要里程碑，這次角力首次讓三邊意識到武力衝突的真實性及戰爭的可能性，美國認為其在臺海地區的利益是建築在和平與穩定之上，臺灣問題應由兩岸政府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而大陸方面經過三年的評估，終於同意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雖則第二次「辜汪會談」因無實質會談內容而被定位為參訪性質，給予之正式名稱為「辜汪會晤」。但 1998 年 10 月 14 日至 19 日舉行的「辜汪會晤」具有重新架構兩岸對話、協商、溝通與交流管道的作用。

第一節 國際政經因素的影響

一、「亞洲價值」與亞洲金融風暴對亞太國家政治的影響

自工業革命後，西方一直代表是優越和進步繁榮的象徵，東方尤其是亞洲國家在經歷戰亂後力求振作，希望能迎頭趕上西方國家。美國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指出，在 1980 年代全盛時期，日本的經濟、出口、貿易順差及外匯存底暴漲，日本人誇耀其所掌握的經濟權力，「日本第一」、「亞洲必勝」，也曾是普遍為人接受的概念。¹⁰²亞洲文化優勢的展現加以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泰國等國經濟快速的成長，被世界譽為「亞洲價值」(Asian Value)。¹⁰³提倡「亞洲價值」的東方國家領導人，對西方的民主政治與個人主義，常有貶損與排斥的舉動；東亞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不乏大家長統治型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多少都帶有威權主義的色彩與特質，其中如中國大陸的毛澤東與鄧小平，臺灣的蔣中正、蔣經國父子，北韓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新加坡的李光耀，馬來西亞的馬哈迪，國家經濟都在穩定的政權中持續成長。

在經濟方面，則有所謂的「雁行理論」，日本領先，而後東亞四小龍，再來東

¹⁰²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 5 月。

¹⁰³ 亞洲週刊，1999 年 1 月 4 日~1 月 10 日，頁 5。

協四小虎，其中不乏經濟成長率為二位數者，因而有「下世紀為亞洲人的世紀」之說法。使從李光耀以降，新加坡領導人大肆鼓吹亞洲在和西方的關係上佔優勢，並將締造亞洲文化成功的優點，像秩序、紀律、家庭關係、工作努力、群策群力、生活簡樸等美德，和造成西方式微的種種缺點，像放縱、懶散、個人主義、國民犯罪、教育水平逐年降低、不尊重權威及「思想僵化」作對比。為了和東方競爭，據稱美國已有「必須質疑其有關社會和政治佈局的根本假設，並在這過程中向東亞各國學習一二。」之省思。

對東方人而言，東亞各國的成功尤其拜東亞文化重視團體而非個人之賜。李光耀說：「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東亞國家比較帶有群體全體主義色彩的價值觀與做法，在急起直追的過程中，已經證明是一大資產。東亞各國文化所標榜的價值觀，包括團體第一，個人利益其次；以及支持加速發展所需的全面團體計劃。」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附和認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工作倫理，包括紀律嚴明、忠誠勤勞，已經成為這兩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這種工作倫理濫觴於團體與國家比個人重要的理念上。」¹⁰⁴

1995、1996 兩年，大陸的出口順差成長率高，在中共中央宏觀調控的政策指導下，物價膨脹率嚴格地控制在個位數。出口暢旺、物價膨脹控制得宜，人民幣相對其他國家，屬於強勢貨幣，不但不應貶值，還有升值的可能。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加以大陸的廣大消費市場的極待開發，世界各國莫不對中國大陸磨拳擦掌；事實上東南亞諸國如香港、新加坡、南韓、臺灣（號稱亞洲四小龍）、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甚至菲律賓等，從 1986~1995 年的十年當中，各國經濟成長率每年都持續成長，甚或成長率有超過百分之十以上，¹⁰⁵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表現實在過於亮麗，經濟成長率之高，全球屬一屬二，同時因有東協組織使東南亞各國緊密合作，計劃中的「東協自由貿區」在國際上儼然形成一個龐大經濟體，而中國大陸挾以廣大的內陸市場和日漸積極的靈活外交手腕，幾成為此一價值中心的新興霸主。國際上對亞洲的興起，投注了更關切的眼光。

然而，1997 年 7 月泰國泰銖大幅貶值，開啓亞洲金融風暴序幕，南韓、泰、馬均遭逢前所未有的浩劫。過去十餘年間深受全球矚目的亞洲經濟奇蹟，受到狂風暴雨般的侵襲。1997 年 7 月 2 日泰國中央銀行放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改採浮動匯率，使得高估的泰銖匯價重貶。隨後外資流出，利率上升和股價下跌，致使經營不良的企業紛紛倒閉，而銀行也被迫關門。並使經濟結構相似的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亦遭其殃。隨後貶值的風暴也波及臺灣、新加坡和香港三個地區，由於這三個地區的經濟體質較為健全，故受害程度相對較輕。但到

¹⁰⁴ 林若雱，《亞洲價值的再檢視：金融風暴的政治經濟分析》，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activity/19991005/mt9910_05.htm。

¹⁰⁵ 周濟，《金融風暴對亞洲及臺灣經濟的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臺北，經濟部，第三卷第二期，1998 年 2 月），頁 2-5。

11 月中，南韓也遭受衝擊，且不支而倒，致使金融風暴蔓延到東北亞地區。¹⁰⁶此波金融風暴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很大，各國貨幣競相貶值，泰銖、馬來幣、菲披索、印尼盾紛紛創下歷史新低，平均貶值幅度約六成，新加坡幣、台幣及韓元也無法倖免，韓元更是劇貶，貶值幅度高居各國之冠；與韓國毗鄰的日本，亦為鉅額呆帳所困，1995 年年底日本北海道拓殖銀行以及山一證券公司的倒閉，其壞帳金額都達上兆日圓規模，故日本金融界亦岌岌可危。

1997 年 7 月以後，東南亞僅剩下大陸人民幣相對穩定，幾乎所有國家都受到波及，全球不少政經學者所稱「亞洲價值」已趨於崩潰、瓦解地步，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安全均受到威脅，也使得世界其他國家的投資亦紛紛撤手，一時之間，東南亞各國的金融風暴，也正強烈衝撞各國國家的政治狀態，紛紛造成各國內政上的不安。香港在 1997 年 7 月回歸之際，亦正受到金融風暴衝擊，中國大陸雖一再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但此一波金融衝擊，大陸不但要撐住大陸本身的經濟壓力，更須金援香港，避免香港經濟惡化過於快速，給予國際有中國大陸經濟能力不夠、經營香港不利的不良印象。

1997 年東南亞所發生的金融風暴，對全球經濟造成震盪，不但使亞洲若干國家經濟成長受損，卓越之經濟表現頓形失色，其震幅亦波及至其他領域。在風暴的肆虐下，對亞太地區若干國家所造成之影響已擴及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等層面，對區域整體安全已造成影響，間接地亦衝擊到美國於該區之戰略利益。

二、美日安保條約的擴大適用

在美國與亞洲國家中之雙邊聯盟中，美日聯盟可說是區域安全與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之軸承，對於區域安全是一不可或缺的穩定因素。美國 1995 年所公佈之「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ic Report，一般稱為奈伊報告)指出：鑑於亞洲無一國家能取代美國以維繫亞洲安全，來自中共與北韓的潛在威脅與不確定性並未消除，美國重申亞洲雙邊聯盟之重要性，繼續遂行其前進部署的戰略。¹⁰⁷1996 年 4 月 17 日，柯林頓總統赴日本進行國事訪問之際，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 (Hashimotoryu Taro) 共同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U.S.-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其中明列美國再度保證對亞太區域的安全承諾：美國一向在亞太地區前進部署約十萬兵力，其中半數駐防在日本，四成在韓國，並持續與區域內主要國家，進行雙邊與多邊演習，目標即在建立一個穩定、繁榮且實施民主改革與市場經濟的區域，並維持其在東亞環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能

¹⁰⁶ 蔡宏明，《金融風暴後南向政策之探討》，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臺北，經濟部，第三卷第二期，1998 年 2 月)，頁 43-50。

¹⁰⁷ 〈奈伊：美應明白宣示對台政策〉，《中國時報》，1998 年 3 月 9 日，版 2。

力。¹⁰⁸新的防衛指針詳細規定了在「平常情況下之合作」、「對武力攻擊日本之反制行動」及「日本周邊事態會對日本和平與安全產生重大影響時之合作」等情況下之配合事項。有關周邊事態之定義，該新指針明確指出，日本周邊事態的概念，並非是指地理上(geographical)，而是狀況之性質(situational)而定，並不涉及特定地區之狀況(situation in specific areas)；當周邊事態可能發生時，美日兩國政府各自主動進行之活動包括：救援活動、難民處理、搜索與救援、非戰鬥撤離行動及考量國際和平與安全，確保經濟制裁之有效性；日本對美軍之支持包括：設施之使用、後方地區之支援及美日雙方之操作合作之事項(如日本自衛隊為保障生命財產之安全及確保航行安全，將執行情報蒐集、監視及掃雷工作)。¹⁰⁹

基本上，美日安保條約是以集體自衛為戰略設計基礎，只是涵蓋更多的預防性與危機處理的意涵。由於美國政府一向是傾向傳統的「現實主義」，對安全問題的關注程度大於經濟¹¹⁰，強調美國當前最大構成對美國威脅的可能來源。戰略目標首在於確保友邦及盟國的安全，其次則是力求勸阻可能與美國為敵的國家化敵為友，再來則是嚇阻敵國威脅並抗衡敵方威逼，最後若嚇阻無效，則力求擊敗敵國¹¹¹。美國承諾繼續維持十萬名兵力之前進部署，並感激日本政府提供美軍駐守之財政上的支持。¹¹²經過雙方的研擬，1997年9月23日美、日安全諮詢委員會正式提出美、日安保條約檢討之完整報告「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¹¹³美、日安保條約的擴大適用，主要是遏止亞太地區潛在威脅的發生，落實美國預防性防衛構想，維護該區的和平與繁榮，以鞏固美國的區域利益；新防衛指針無論是地理上的遠東地區或模糊的周邊事態概念，臺灣均很明顯的被包括在內，此項考量並非是美、日兩國單純的道義行為，而是臺灣在地緣政治的考量。¹¹⁴蘇聯在冷戰後雖然對於北太平洋的威脅已經減緩或解除，美、日安保條約仍透過重新定義，以應付亞太安全環境新的變化與發展。美、日安保體系的存在對於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可能超過冷戰時期。因為過去美、日安保其實是美國全球圍堵政策的一環，而現在的美日安保是美國維持區域平衡的重要機制，日本由單純美國軍隊前進部署的基地提供者，到協助美國軍事行動的後勤支助者。安保條約新防衛指針的確立，不但意味著美、日關係更加強固，更代表美國在亞太地區持續執行其同心軸

¹⁰⁸ 國防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0年），頁16。

¹⁰⁹ 楊志恆，《東北亞之安全情勢分析》，<http://www.dsis.org.tw/pubs/magz/1st/per3.htm>。

¹¹⁰ John Gershman,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us.org/commentary/0012asia-body.html>

¹¹¹ 〈倫斯斐確認美國防戰略四原則〉，《中國時報》，民國90年6月16日，版13。

¹¹² 美國國務院，《美日安全共同宣言：二十一世紀聯盟》(U.S.-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http://www.state.gov/www/regions/eap/japan/jointsec.html>(Jan 22,1999)。

¹¹³ 日本防衛廳，《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檢討之完成》(Completion of the Review of 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http://www.jda.go.jp/policy/f-ork/sisin4-htm>(April 28,1999)。

¹¹⁴ 邱坤玄，〈美日防衛合作與兩岸關係〉，《政策月刊》，32期（1998年3月），頁10-12。

戰略一以雙邊聯盟為核心，多邊對話機制為外圍。

美、日安保體系的強化，對中共如芒刺在背。中共認為美、日安保新防衛指針的確立，不符合時代潮流，並給亞太地區不確定因素與消極影響，並且堅決反對以「周邊事態」之模糊定義，間接地將臺灣納入。對於美、日軍事同盟由「防守型」變為「進攻型」，中共所憂慮的不只是臺灣，也包括了南海地區。美、中之戰略夥伴關係與美日安保條約雖勢必產生相互制衡、衝撞之現象，但此為美國雙重圍堵(double containment)之如意算盤，即一方面遏止日本軍國主義之復甦，另一方面防止中共之坐大。就現況而言，美軍若自亞太地區撤軍，雙重圍堵之權力平衡將遭破壞，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全亦會受到嚴重之影響，故美軍前進部署仍有其必要性，以維區域之穩定與平衡。如此地緣政治的考量已使臺灣問題成為美日不能漠視的國際問題，美國之所以保持高度的模糊性，乃是因為複雜問題若處理不當，將可能與中共形成正面衝突，演變成「美、中的對決」，而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¹¹⁵

美、日雙方均瞭解冷戰後東亞安全的主要威脅和戰爭引爆點，不是日本本土，而是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任何次區域軍事衝突都將牽動東亞整體安全與穩定，因此在新安保體系中，日本提供美軍需要的後勤和基地協助，使美軍能有更大的彈性空間，和支援面對可能的軍事衝突。¹¹⁶新修正的美、日安保條約（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希望能夠確保亞太和平與安全的環境，而使得區域內國家均受惠於這項安保條約，大多數東亞國家也視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為維護亞太安全的主要支柱。¹¹⁷

美、日安保新防衛指針無疑地對臺海地區具有穩定之作用，中共武力犯臺的意圖勢必受到某種程度牽制，臺灣安全係數亦可能相對提高，但是否代表亞太情勢對臺灣永遠有利，仍有待時間的考驗。1996年臺海危機，是因戰略、聲望及價值等因素考量，美國必然適度表明立場而派兵介入，但是美國也因介入臺海緊張局勢同時了解，中共對於主權問題的態度強硬，其後美國擴大與中共交往並且演變成「新三不」政策的明確化，對臺灣之衝擊不可謂不大。¹¹⁸近來美國與中共因亞太區域安全所生之齟齬，以及雙方的矛盾歧見又牽涉敏感的「臺灣問題」，實際上已對華府執行自1979年《臺灣關係法》構成新的挑戰。美國在二十多年前制定並實施《臺灣關係法》，其目的固然為規範對臺灣的非官方交往及繼續維持雙方之間的實質關係；但是，該法的核心則為對臺灣提供面對中共軍事脅的安全承諾。正因如此，其所引發對臺軍售的種種問題，不但考驗中共與美國新的友好關係，

¹¹⁵ 宋學文，〈「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的模糊策略之理論面初探與其對中國安全之衝擊〉，〈北京大學編：中共十五大後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2月，頁1-16。

¹¹⁶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9期（1998年6月），頁275。

¹¹⁷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9期，頁275-304。

¹¹⁸ 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卷35期12（1996年12月），頁1-18。

也影響了兩岸談判結構中權力的消長，臺灣與中共談判之籌碼無形中因而減損。¹¹⁹

三、美國積極建議兩岸繼續對話、協商

1996年3月臺海危機，中共以幾近「準戰爭型態」的軍事演習，試射飛彈封鎖基隆及高雄兩港的這種既危險又充滿挑釁意味舉措，迫使美國不得不派遣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至臺海地區以化解危機。學者吳榮鎮製作一份訪談，訪問美國研究中國學者及民間智庫學者白魯恂(Lucian W. Pye)等二十三人，這些學者談到對兩岸關係及談判的基本看法時，幾乎所有受訪之美國學者均認為，中共絕不可能同意臺灣以對等政治實體與它進行談判。另大部分受訪者都贊成，兩岸宜先進行事務性或功能性議題的談判，再進行政治性的談判。而對於談判結果的效力問題，咸認為即使兩岸談判有結果，也很難有任何拘束力與保證。¹²⁰由這些美國學者意見可看出美國看待兩岸關係是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較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美國1995年的民意調查結果，雖有百分之六十的美國人認為臺灣是美國的親密的盟友或朋友，但是，大部分的美國人反對美國派兵協助臺灣，¹²¹這也看出，美國民眾不希望其子弟因為臺海戰爭犧牲性命。美國當然明瞭中共重要性，畢竟在區域安全與國際事務上仍須與中共合作。為了彌補「裂痕」之再發生，雙方都認為有必要重開會談以澄清各自立場。同年五月，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斯多夫(Warren Christopher)便指出：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在形塑亞洲的未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國與中共擁有共同的利益，如解決北韓核武計劃、禁止核試、反毒等。同年十月，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也明白表示，欲促進亞太安全，除鞏固盟邦、擴大民主社群之外，深化與中共的交往亦是要素之一。楊中美在《中共外交教父—錢其琛》一書中指出，1996年11月柯林頓蟬連總統之後，曾邀請美國六十一位「中國通」於阿登納召開三天會議，以規劃新的中國政策，其結論認為在建構自由的國際貿易體系、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維持亞洲區域穩定、人權與政治多元化及環保問題，皆須中共的合作，雖然美中兩國之間仍存有若干差異與誤解，但美國仍應視中國為一夥伴，對其強大與繁榮樂觀其成。柯林頓總統第二任期的中國政策就此定了基調。¹²²美國政策的轉向促成了1997年的第一次柯江高峰會及1998年的第二次柯江高峰會。

美國是以愛好和平民主自居的國家，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均抱持高度關切態

¹¹⁹ 宋學文，〈從「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與「三不政策」探討如何終止兩岸敵對狀態〉，宋學文受陸委會委託之研究計劃之結案報告，〈專案研究〉，陸委會網站。

¹²⁰ 吳榮鎮，〈美國學界對兩岸談判的看法〉，《共黨問題研究》，27卷5期(2001年5月)，頁10-18。

¹²¹ Dennis Van Vranken Kickey, *Taiwan's Secu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ynne: Reinner Publisher inc., 1997), p184.

¹²² 楊中美，《錢其琛：中共外交教父》，(臺北：時報，1999年6月)。

度，畢竟它是關係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要如何解決兩岸紛爭，美國希望朝和平方式解決，不涉及到戰爭。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形成三個重點：第一，中共已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全球嚇阻戰略的首要目標，且不論基於國際結構因素或是過去與中共的交往經驗，未來中共與美國都極不容易維持「夥伴關係」，而較可能是競爭對手(但美國並未公開將中共列為「敵人」)；第二，由於中共未來可能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在亞太政策重心將著重在經營與盟邦(如日本、韓國)的關係上；第三，對臺政策改變，調整原本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策略，(即強調「不獨、不武」(no independence, no use of force)，同時不明示當中共對臺動武時，美國將如何作為)，轉為「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但戰術模糊。¹²³與中共交往，但不能忽略臺灣的安全與福祉，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不再刻意強調「三不」。¹²⁴

美國在 1995 年後，為了兩岸重開的談判，打破兩岸的對峙已久的僵局，提出不少建言，其中以 1998 年的非官方的「第二軌道」(Track II)最為具體，也引發了臺灣陸委會也放出有意透過「第二軌道」對話的消息，主管兩岸事務的官員形容，這是以多種管道達到「滴水穿石」的目的¹²⁵，但事實上臺灣政壇為此一構想吵鬧不休，各方意見分歧。

1998 年初，美國前政府的退職官員，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助理國防部長奈伊(Joseph Nye)，及重量級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Harry Harding)，李侃如(Kenneth Libenthal)紛紛來台，透過會議及臺灣媒體公開表達一些重要觀點。¹²⁶1998 年 6、7 月中美高峰會，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大陸後，裴利在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檀香山舉行會議之後，又再提出更具體的開闢三方第二軌道的意見。¹²⁷因此，有關美國積極介入、協助、鼓勵兩岸進行對話，建構「第二軌道」的原因，除了希望兩岸恢復談判，緩解緊張，避免意外捲入兩岸衝突的考量之外，美國或許認為，透過華府的積極參與，可以祛除、改善臺北拒談、怕談的立場，也或者是美方對臺北的拒談已有不滿，於是希望積極的引導臺灣與中共舉行會談。

雖然美國行政部門已經表明「第二軌道」並非官方政策，¹²⁸但是，此一建言符合美國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態度與立場，則是不爭的事實。至於美國參與的方法，只要中共不反對，甚或同意的話，最好的方式當然莫過於透過三邊的第二軌

¹²³ 《中國時報》，1998 年 2 月 24 日，版 9。

¹²⁴ 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44 卷 8 期（2001 年 8 月），頁 9。

¹²⁵ 康依倫，〈第二管道可以滴水穿石嗎？〉，（台北：新新聞週報 591 期，1998 年 6 月），頁 37。

¹²⁶ Kenneth Libenthal, "Cross-Strait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ntitled, "The PRC After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held in Taipei, February 20, 1998. 轉引自蔡瑋，〈由九八年柯江會談看兩岸關係之發展〉，《中國大陸研究》，42 卷 1 期（1999 年 1 月），頁 10。

¹²⁷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7 月 4 日，版 4。

¹²⁸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7 月 24 日，版 2。

道進行接觸。藉此，美國一方面可以避開由於與臺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官方不宜與臺灣有太多接觸的尷尬；再一方面可以享有較大的政策迴旋空間；第三方面還可以預知、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因此，此一作為應該是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考量。

臺灣政府部門也努力請學者作專案研究，研究報告指稱，「第二軌道」(Track II) 實施目的，是發展並促進區域間各國信賴基礎，並建構完整互信機制，實際上並非針對兩岸關係而設計；維護區域穩定，增進區域互信，才是「第二軌道」的真正外交意涵，亦可以說是「預防性外交理論」的體現。基本作法上是應由獨立或半官方支持或贊助的研究機構，邀集個別學者專家與區域安全研究專家，以及前任或現任國防或外交部長參與定義為「非官方」性質的組織或會議，因此，其定位介於官方代表「第一軌道」(Track-I) 與純學術代表「第三軌道」(Track III)間。

研究報告認為，因兩岸性質特殊，亦處於國際秩序亟待重整之亞太地區，「第二軌道」與區域間各國外交、國防發展緊密進行的結果，勢必將直接或間接牽動兩岸關係的角力，其長遠效益不可不審慎因應。同時，由於中共蓄意打壓我國國際空間的企圖從未改變，美國在其國家利益的考量下，全面性地與中國進行交往政策，加以美國政府有意運用「第二軌道」對兩岸對話施壓，已使海峽兩岸談判籌碼失衡。不過，這項研究報告認為，「第二軌道」運用在兩岸關係，實際上已行之有年，舉辦方式多半係由美國重要智庫機構邀請兩岸學者、官員或資深代表參與會議。美前國防部長裴利在柯江會談後，積極為「第二軌道」推動加溫，恐將使臺北在兩岸談判作業上，遭遇更大的壓力。最後建議為第一、審慎評估企圖以加速兩岸對話為目的之「第二軌道」提議，並低調回應。因兩岸溝通管道已建立，「第二軌道」恐將使未來兩岸談判增添複雜因素，並將對國內政情產生負面影響。政府可將「第二軌道」定位為論壇性質，方能有效降低對臺灣的負面衝擊。第二、積極參與美方重要智庫舉辦之「第二軌道」會議。由於「第二軌道」仍有增進彼此互信、促進了解與平衡言論等功效，同時，為向美方展現臺灣積極尋求溝通與交流之誠意，對於美方重要智庫機構辦理有關兩岸關係之公開、半公開或閉門式會議，政府仍應遴派合適學者或具官方身分之代表出席。第三、加強與區域間「第二軌道」非政府組織或會議聯繫管道。為擺脫北京與華府合作對我政府的影響力度，加強與區域間非政府組織或會議聯繫管道，將是極其重要的一環。而爭取各非政府組織或會議負責人之支持，將是臺灣適時涉入區域間非政府組織的最佳媒介。¹²⁹使得美國建議的「第二軌道」在臺灣僅定位學術性質或論壇會議上，臺灣仍堅守「第一軌道」方式進行兩岸的接觸。

美國與中國兩國領導者的兩次「柯江會談」時，美國柯林頓總統皆曾敦促大陸，臺海兩岸應重啟對話。柯林頓總統曾於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中提及，「美國希

¹²⁹ 《中國時報》，王銘義，〈決策部門完成參與「第二軌道」的研究報告〉，民國 87 年 7 月 24，版 2。

望兩岸能重新展開建設性對話並擴大兩岸交流，最終兩岸問題仍須中國人自行和平地解決」、「美國愈鼓勵兩岸對話，愈有利於美、中關係」、「兩岸重啓對話為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最佳途徑」等語。¹³⁰時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謝淑麗(Susan L.Shirk)指出：「美國絕不對兩岸協商施壓，也不居間調停。美國不認為更深入的參與兩岸事務將有利於美國利益，因此在解決兩岸問題方面，美國不會扮演直接介入的角色。但這並不意味美國不積極，相對的，美國將持續敦促兩岸回到主動且直接的對話方式」。¹³¹

第二節 中共的外交政策

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五大）上所做的政治報告中表示，十五大後將全面展開「大國外交」政策，分別與世界主要國家簽訂或宣示建立各種不同名義的「夥伴關係」，謀以均勢（Balance of Power）戰略，提升其大國形象，進而抗衡美國的獨霸地位。中共之所以推動大國外交，一方面中共第三代集體領導核心江澤民在權力鞏固並定位於一尊後，於十五大的報告中指出，對於外交政策的執行要以「一個不變，三大目標」（一個不變是指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三個目標是指爭取國際和平環境、謀求早日實現統一大業、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作為中心。中共認為當前各國利益多元化，大國間已不再像冷戰時期一般形成固定的戰略同盟，而是根據自身利益，在不同的問題與不同的時間，與某個或某些大國進行協調，各國關係是既合作、又競爭。也就是說，當前大國間已建立起一種相互信賴、又相互促進的關係，形成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約的權力結構，而這種全方位友好、非敵非友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交往模式，即中共所謂的「新型國家關係」，係後冷戰時代國際權力平衡的特色，也是中共獨立自主外交原則的依據。¹³²

中共對外工作重點即在發展與週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基礎上，進一步保持和發展各大國關係，並且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積極參與多邊外交，進而解決臺灣問題，推進統一大業¹³³。當然，另一方面不免有向全世界宣示其已躋身「大國」之列的用意，希望中國大陸可以運用均勢戰略提高中共國際地位，採取現實主義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加入國際體系發展大陸經濟，同時利用各

¹³⁰ Joint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Clinton and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October 29,1997;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Clinton and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June 27,1998.

¹³¹ Susan L. Shir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May 20,1998.

¹³² 張玉良主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戰略謀劃》（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74。

¹³³ 《文匯報》，1997年10月27日，版5。

項夥伴關係在國際上孤立臺灣。¹³⁴1995、1996 年中共在臺灣海峽一連串的軍事演習，面對美國的圍堵與交往政策，中共更加彈性調整其全球戰略與對外政策，中共明白宣示，其所推動的各類型大國外交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係鎖定國際主要強權，並企圖要求美、日當局就「三不」表態。結果雖未能如中共所願，卻已反映中共在試圖爭取扮演世界大國角色之總體目標下，其基本政策方針是盡全力壓抑臺灣外交空間。¹³⁵

至於中共在推動大國外交作法與過程方面，除了積極尋求定位以建構長期穩定的關係架構之外，在與美、俄、日、歐盟等大國間建立內涵有所不同的關係中，既存在合作又有競爭，其特點：同意建立高層會晤磋商機制，以擱置爭議、異中求同為目標，推動經貿科技交流合作為重點。¹³⁶中共為了突破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的孤立局面，採取一連串如宣佈三年裁軍五十萬、簽署「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等措施，以塑造良好國際形象，其中最顯著的即是建立各種形式的「夥伴關係」。其間各大國關係調整的特點為：一是大國關係調整以雙邊為主，其中任何一對雙邊關係又會對第三國產生某種影響，形成複雜的三邊或多邊互相制約關係。¹³⁷二是大國之間元首外交頻繁，外交的形勢趨於多樣化，例如在歐洲，圍繞北約東擴，美、法、德、俄等大國國家元首之間會晤增加，外交關係除了各國元首間的正式訪問和多邊會議外，最顯著的就是各國元首間的非正式會晤的增加。三是各大國之間正在形成新的關係架構，夥伴關係的出現即為其代表。¹³⁸另外自 1997 年開始密集安排領導人出訪，先後與美、俄、歐盟和日本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中共從 1996 年底開始分與十國（地區）建立友好關係，¹³⁹中共運

¹³⁴ 楊志恒，〈中共外交的策略與原則〉，《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10 期（1999 年 10 月），頁 29。

¹³⁵ 中共大國外交及我國因應之道，外交部，立法院第三屆第六會期外交及僑政委員會報告，1998 年 12 月 28 日，頁 4。

¹³⁶ 《人民日報》，1997 年 12 月 8 日，版 6。

¹³⁷ 現代國際關係編輯部，〈大國關係與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1998 年 1 月，第 1 期，頁 42。

¹³⁸ 劉江永，〈國際關係夥伴化及其面臨的挑戰〉，《現代國際關係》，1999 年 4 月，第 4 期，頁 2-3。

¹³⁹ (一)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巴基斯坦議會中演講時與南亞建立「睦鄰互信友好」的「長期穩定睦鄰友好關係」；(二)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與俄羅斯發表「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與俄國建立「戰略夥伴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戰略夥伴」關係；(三)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與法國發表「中(共)法聯合公報」，與法國建立「全面合作」的「長期全面夥伴」關係；(四)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與美國發表「中(共)美聯合聲明」，與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戰略夥伴」關係；(五)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與加拿大發表「中(共)加聯合聲明」，與加國建立「全面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全面合作」關係；(六)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與墨西哥發表「中(共)墨聯合聲明」，與墨國建立「跨世紀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的「全面合作」關係；(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與東協發表「中(共)與東協國家元首會晤聯合聲明」，與東協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睦鄰互信友好」關係；(八)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與日本發表「中(共)日共同宣言」，與日本建立「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全面合作」關係；(九)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與歐盟發表「中(共)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與歐盟建立「全面夥伴關係」的「全面合作」關係；(十)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用權力平衡觀念並透過大國外交之互動關係，分別與俄、法、美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建立新型夥伴關係，同時運用均勢戰略聯合俄、法等國推動多極化，以牽制、防止美國一極獨霸之形成。¹⁴⁰中共有計畫地與各大國之間關係平衡發展的結果，使得中共在世界政壇上的地位上升，中國大陸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也使得北京與各主要大國發展關係的同時，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提升了它的國際地位。¹⁴¹

中共雖一再宣稱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外國勢力不得干涉，但是中共與各國的建交公報，必述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實際是利用大國架構來箝制臺灣。事實上中國將臺灣問題當做其於國際議題上合作與否的談判籌碼，迫使他國接受中共為中央政府的說辭；而兩岸情勢不佳或交流中斷，更將責任歸於臺灣，製造臺為「麻煩製造者」的不良印象。中共封殺我外交實例，不勝枚舉，例如中共重返非洲、拉丁美洲之舉，即為遏制臺灣務實外交的最佳明證，其目的就是要鞏固「一個中國」的防線，頓挫臺灣拓展外交空間的攻勢，封閉臺灣邁向聯合國的大門。¹⁴²中共以「搞好週邊以自重，借重多極以制衡」的大國外交，利用國際體系的劇變下強化中國綜合國力，並利用元首外交與高層外交，在國際場合大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使「一個中國」的原則定型化，對臺灣徹底執行「三光政策」¹⁴³，即將臺灣現有邦交國挖光、國際政治生路堵光、對等籌碼擠光。孤立臺灣的對外活動空間圍堵並孤立臺獨勢力，進而迫使臺灣進行政治談判。

第三節 辜汪會晤前的兩岸善意表現

美國促談促和的態度是兩岸能開協商、對話的主要關鍵，美國認為臺海地區之和平安定符合美國之國家利益。美方原先向臺灣建議的「第二軌道」對話，雖然遭臺灣內部質疑而作罷，但由於美國的積極，帶動國際輿論關切，在國際促談壓力之下，兩岸政府皆不願背負「麻煩製造者」的罵名。面對如此國際情勢，臺灣國內政治也隨之應和，產生聯結作用：一是朝野各政黨對兩岸問題的務實面對，

十三日與韓國發表「中(共)韓聯合聲明」，與韓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睦鄰互信友好」關係。資料來源：殷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1999年3月，第25卷，第3期，頁86。

¹⁴⁰ 楊志恒，〈中共外交的策略與原則〉，《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二卷，第十期(1999年10月)，頁30。

¹⁴¹ 凌峰(林保華)，〈中共和東加建交破壞兩岸和解氣氛〉，民主論壇，1998年11月12日。
<http://www.asiademo.org/1998/11/19981112c.htm>。

¹⁴² 王友辰，〈中共對九十年代國際形勢評估之探討〉，《中共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四期(1999年4月)，頁80。

¹⁴³ 劉紅，〈「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祖國統一的最佳模式〉，《臺灣研究》，1998年，第4期，頁1-7。

二是兩岸復談管道重新開啓。¹⁴⁴

一、臺灣民意的整合和持續釋放對中共善意

民進黨在 1997 年底縣市長選舉成果（十二席），成績幾乎與長久執政的國民黨相當，該黨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奏效，向執政之路再邁出一步，民進黨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已不容忽視，這也可從來臺訪問之美方人士積極與民進黨人士會晤，便可明瞭。而影響該黨是否能執政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對國際情勢的正確認知與兩岸政策的立場與走向。該黨在 1998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舉行「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討論議題著重在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兩岸經貿關係、雙邊互動的策略規劃及進入世貿組織等議題上，經民進黨內各派充分辯論所得共識為：以「強本西進」為兩岸互動的基調，堅持臺灣主權獨立但不可為談判標的，以迴避主權之談判，並主張未來須採全方位的談判策略。顯然該黨整合了黨內惡性鬥爭，以理性及系統的方式思索兩岸關係定位與政策擬定。¹⁴⁵同時，臺灣另一個新興政黨—新黨，提出「一中兩國」的理念，突破急統的刻板印象，並主張將其做為兩岸談判的基礎架構。

1997 年 12 月底以李登輝總統之名，在臺北召開了一場朝野各黨各派共與的「國家發展會議」（簡稱國發會），五天（12 月 24 日～28 日）的國發會落幕，總計針對憲政體制、經濟發展以及兩岸關係等三大議題，共達成一九二項共識，尤其在兩岸議題上得到三十六項兩岸互動的政略與原則共識：為整合國內各界對兩岸關係之意見，俾凝聚共識，政府未來關於兩岸之重大決策，應強化在野政黨及具代表性之各界人士充分參與之機制。自 1912 年起，中華民國即為一主權國家；自 1949 年中共政府建立後，兩岸即成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但由於兩岸關係錯綜複雜，且各黨對於其未來發展方向仍有不同意見，因此，必須以最大的耐心與智慧尋求共識。開展兩岸關係應以維護中華民國之生存與發展為基礎。處理兩岸關係應本理性、和平、對等、互惠、尊嚴之原則，建立穩定之關係架構。在臺灣優先的原則下，堅決維護台澎金馬地區二千三百餘萬同胞之安全與福祉。大陸政策必須以國家整體實力做後盾，尤須鞏固國防、加強心防。兩岸交流的過程中，應慎防走私、偷渡、販毒、滲透等危害國家安全之情事發生。大陸政策與對外政策應互為表裡、相輔相成。兩岸協商基本問題，1991 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充分表達了希望和平解決問題的誠意。處理兩岸間之爭議，一定要充分尊重既成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任何以非和平手段改變此一現實之企圖，將為兩岸人民帶來重大的災難。因此，兩岸可在適當的時機，就和平協定之簽署進行協商。現

¹⁴⁴ 《中國時報》，〈兩岸關係新思維〉，民國 87 年 3 月 8 日，版 2。

¹⁴⁵ 《聯合報》，民國 87 年 2 月 16 日，版 2

階段可由民間推動「兩岸論壇」，廣邀具代表性之兩岸各界人士，以私人身分，就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不預設立場，廣泛交換意見。爲了因應兩岸協商新局，臺灣應加強對中國大陸情勢及中共謀略之研究，並積極培養談判人才。兩岸協商應以內部共識爲基礎，並由主管機關授權，在國會監督下進行。積極推動恢復辜汪會談，以建構台港新關係及解決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相關問題，進而營造兩岸和平互動環境。促成兩岸領導人在適當時機互訪，以開創兩岸合作的新紀元等，¹⁴⁶臺灣內部對兩岸關係議題的共識完整建立，得以一致對外。

爲了塑造兩岸對話的良好氣氛，臺北主要是在外交、軍事、經濟等三個領域，表達善意。在外交上，副總統取消歐洲議會的訪問及行政院蕭院長也暫停出國訪問計畫，以免被誤解爲臺北口是心非意圖在製造破壞兩岸關係發展；在軍事上，參謀總長唐飛毫不避諱地指出，突然停止國軍例行性新一代兵力展示與實兵演練，即是爲了營造兩岸和緩氣氛，建立良善的互動模式。

事實上，1996年臺海危機發生時原預定的漢光演習因恐致兩岸衝突升高或使原本已惡化的關係雪上加霜，演習也斷然停止，臺北這種讓步、示好的紀錄是深具指標意義；¹⁴⁷行政院蕭萬長院長表示，如獲中共善意回應，政府不排除適時調整戒急用忍的經貿政策，例如，三通議題的回應。¹⁴⁸蕭萬長重申，兩岸協商「從那裡斷，就從那裡開始」，並應以循序漸進爲原則。要先恢復兩岸兩會事務性協商，待雙方往來正常後，不排除進行其他議題的可能性。¹⁴⁹

二、中共對促成「辜汪會晤」的善意態度

中共對臺政策原本就存有僵硬現象，堅持兩岸關係以「一個中國」爲起點，「一國兩制」爲終點，使得如何建立兩岸之間的迴旋空間，實屬不易，爲營造兩岸重啓交流之門，中共對「辜汪會晤」的預定安排就是相當善意的態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二方面：

（一）議題的不特定

中共暫時不再硬性地堅持臺灣必須以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爲前提，而可以回到工作性、事務性與功能性議題。雖然中共認爲兩岸應儘速政治談判，且在政治談判程序性商談開始後，隨之展開經濟性、事務性商談，但在此前雙方應擴大交流、增進瞭解、尋求共識，爲政治談判程序性商談預作準備。然而此次會晤中，

¹⁴⁶ 〈李總統在國家發展會議閉幕典禮致詞全文〉，《國家發展會議兩岸關係議題共同意見》，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

¹⁴⁷ 《民眾時報》，〈未會晤先休兵使民眾不解－中國政策高於國防與外交？〉，民國 87 年 10 月 5 日，版 2。

¹⁴⁸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6 日，版 5。

¹⁴⁹ 《兩岸大事記》，1998 年 1 月 1 日，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

中共提出不論是高層政治議題或是經濟性、事務性議題皆可談，議題的範圍與層次是過去所絕無僅有。¹⁵⁰

（二）高規格的接待模式

中共主動提出由江澤民與錢其琛分別會見辜振甫，江澤民以國家主席及中共中央總書記身分於事前即已磋商決定日期會見辜振甫，此在中共政治運作中是一項破例的禮遇。這不但是由江澤民親自出面以行動重新肯定海基會為兩岸溝通的正式管道，並把原先辜振甫的此行參訪性質由「辜汪會晤」升級至「辜錢會」與「辜江會」¹⁵¹。雖然在臺灣稍具代表性的政經人士曾有與江澤民會晤的機會，但不像此次預先列入參訪日程，顯示中共對此的重視與對會晤的周全準備。

雖然此次辜汪會晤定位在「一次沒有特定議題的會晤交流活動」，僅為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的暖身運動，但對臺灣而言，面對臺灣政經各層面都已至瓶頸之際，加以中國大陸的日益蓬勃發展，臺灣能面對險惡環境往前跨出一步，就是轉機。

¹⁵⁰ 《臺灣日報》，1998年10月7日，版4。

¹⁵¹ 《中國時報》，1998年10月12日，版15。

第四章 「辜汪會晤」的安排與會見 過程

1998年10月10日英國電視播出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接受象徵香港殖民時代結束的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第二電視網出的「東方與西方」節目專訪。李總統在訪談中闡明海峽兩岸未來的關係仍應基於政治考量，不能純以經濟為主。他指出，臺灣經驗可以成為中國大陸和平演進與發展民主的典範。李總統十分明確的在節目中歸結指出，他認為海峽兩岸未來關係的發展將基於前述的政治性考量，而非只是經濟，因為「前者更重要」。彭定康在節目中對中華民國的進步繁榮和政經成就，有極高評價，他認為臺灣是亞太地區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彭定康在節目中表示，距離中國大陸南岸只有一百英里的臺灣，無疑是北京政權的最大芒刺。基於臺灣與大陸的強烈對比，彭定康在節目中再三強調：「我們現在是在臺灣，她是中國的，卻也是自由的。」令人印象深刻。¹⁵²這也是英國全國性重要電子傳播媒體，近年來首度播出有關中華民國國家元首訪談。就臺灣為主權政體而言，當然不可能承認我們是屬於中國的，彭定康雖然長期在香港，但他所代表的英國政府，有英國政府兩岸的立場，然而這份訪談似可以表現出當時臺灣朝野對即將展開的「辜汪會晤」（10月14日—19日）的基本立場與對中國大陸的期望。

被辜董事長稱為「融冰之旅」的第二次「辜汪會晤」，在各方矚目下粉墨登場，雖然此次會晤定位在「一次沒有特定議題的會晤交流活動」，僅為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之暖身運動，但對這次的兩岸間建設性對話，國際社會莫不抱持肯定的態度。美國官方即認為此為積極、建設性的進展，對穩定臺海情勢極為重要，使兩岸兩會協商機制回歸到原有軌道。對兩岸而言，更重要的意義是兩岸進入「談判的時代」將成不可避免的趨勢。

¹⁵² 《中國時報》，民國87年10月11日，版2。

第一節「辜汪會晤」前雙方的聲明與協調過程

1998年10月6日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別發表了一篇《「辜汪會晤」與兩岸關係》的聲明。¹⁵³聲明中說明臺灣方面一直主動邀請大陸方面重新召開兩岸兩會協商，這是海內、外中國人高度關注及期盼的兩會高層互動，並期待「辜汪會晤」能增進兩岸良性互動，重建互信的一個重要起點。若經由雙方更坦誠的磋商與適當安排，可獲致豐碩的成果，為兩岸更廣泛、高層次的溝通與對話，創造契機；也可為建立民間交流秩序，保障人民權益，尋求根本改善的途徑。

對於臺灣所表現出的具體善意為由政府高層首長從1996年後提出一百一十四次的公開呼籲，希望大陸方面應儘早同意恢復溝通與協商；而海基會也主動四次去函海協會，提出恢復兩岸中介團體會務人員正常互動的具體建議，同時明確表達儘早恢復協商的期望。1998年2月，海協會回函表示願意協商安排兩會交流事宜，使兩岸協商管道重新運作；經過兩會屢次文書往來磋商，同年四月，海基會副秘書長赴大陸就交流、互訪相關事宜，相換意見。

臺灣執行大陸政策的兩套系統—陸委會與海基會，陸委會為行政院新興成立的政府部門，該會的委員會議為一跨部會會議，在行政院系統中，各部會的相關政策有關大陸政策部分，都必須先送陸委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再送行政院院會審議；而一開始的大陸政策的政策考量一向較為保守，或許與技術層面考量不同，各部會間的橫向聯繫不足，故時有齟齬。¹⁵⁴經過黨政系統及行政院、陸委會及各部會的持續溝通，且因此一系統的持續操作，行政系統的不同調狀況，逐漸消除。至於陸委會和海基會狀況，亦復如是。海陸兩會更因與中共談判過程中，常因前線談判人員的回報流程過長、後方指示速度過慢，加以中共的有心操作和嘲弄，造成海陸兩會人員，皆有委屈與怨言。不過兩會領導階層憑著對歷史負責的使命感，也參考大陸海協會與國臺辦間的「兩塊招牌，一套人馬」的作法，不斷地謀求如何能更簡化談判流程，1993年12月3日將時任陸委會副主委的焦仁和轉任為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陸續陸委會人員，如廖運源、劉克鑫、游瑞德等調任海基會處長級人員，而秘書級及行政人員等，亦從陸委會轉任；海基會謝福源亦兼任陸委會處長級人員，使海基會系統更接近行政系統。¹⁵⁵1998年兩岸協商重啟

¹⁵³ 《「辜汪會晤」與兩岸關係》，民國87年10月6日，陸委會網站。

¹⁵⁴ 王銘義，《不確定的海峽—當中華民國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11月。

¹⁵⁵ 王銘義，《兩岸和談：臺灣與中國的對話》，（臺北：財訊），1997年9月。

之際，2月7日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由原先已出任陸委會副主委、辭官參選再回海基會的許惠祐再次出任，¹⁵⁶焦仁和回行政部門，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同年3月19日，行政院與立法院與時任立委陳水扁委員共同修改「受託處理大事務財團法人監督條例」¹⁵⁷，讓政府人員得兼任海基會人員，而此次海協會回函同意海基會派員赴大陸協商，海基會4月所派者即為身兼海陸兩會職務的詹志宏（陸委會處長兼海基會副秘書長）率團，一則可在交流協商尺度上，精確的拿捏，再者可以避免以往海陸兩會因認知差距致使臺灣談判力量內耗。

大陸海協會在同年9月1日也作了人事調整，原任海協會秘書長的鄒哲開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新的副社長，若加上七月中旬抵港履新曾任「國台辦主任助理」兼「聯絡局局長」的該社「臺灣事務部部長」邢魁山，顯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涉台事務目前已被中共「台辦」系統全面接管；中共「中央台辦」與「國台辦」，也同時進行局級官員的人事調整。目前除秘書局長懸缺外，其他七個局局長均已確定。邢魁山調任香港後，「交流局」局長袁祖德調「聯絡局」局長；「秘書局」局長張啓勝調「交流局」局長；「秘書局」處長楊流昌升任該局副局長，與從「澳門新華分社」調升該局副局長的何建華，一起負責該局工作；「經濟局」局長劉震濤退休，局長一職由該局副局長何世忠升任。其他留任現職的各局局長為：綜合局張金成（兼「海協會」秘書長）；「研究局」孫亞夫；「新聞局」張銘清；「交往局」張懷君。局長人事調整後，「國台辦」仍由主任陳雲林領軍，三名副主任唐樹備（兼「海協會」常務副會長）、王永海（兼「國台辦」發言人）、李炳才，以及主任助理王富卿留任。¹⁵⁸

1998年4月、7月及9月間，經兩會副秘書長、副董事長二層級三次當面磋商，備受各界高度關注的「辜汪會晤」，終於由兩會商定，海基會辜董事長確定在同年10月14日至19日前往大陸訪問，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進行會晤。兩岸制度化協商在中斷三年多後，兩會最高領導人能夠再度見面，對未來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與開展自然也深具意義。雙方都同意這是一次建設性的「政治性對話」，對政治議題也不再迴避；¹⁵⁹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率團訪問大陸，是兩岸分離近五十年來，第一次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兩岸雙方進行高層級的直接接觸，雙方以授權代表方式進行「辜汪會晤」，跳過了事務性商談，進入政治對話的層面。¹⁶⁰

¹⁵⁶ 陳邦鈺，《中央日報》，民國87年2月7日，版3。

¹⁵⁷ 《立法院公報》，087卷012期，民國87年4月，頁83-110。

¹⁵⁸ 《聯合報》，1998年9月1日，版2。

¹⁵⁹ 邵宗海，《聯合報》，〈政治對話鋪「坦途」兩岸進入「談判的時代」〉1998年10月19日，版15。

¹⁶⁰ 《中國時報》，1998年9月25日，版2。

第二節 會晤行程安排

此次會晤得以順利展開，當然源自於雙方刻意塑造的對話氣氛，兩岸基本的政治歧異未取得任何共識。中共認為適當的政治氣氛主要是在四方面，而對我政府提出要求：一、雙方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進行政治談判；二、停止製造破壞兩岸關係的行動；三、將兩岸政治談判提到正式議程，儘早實現三通；四、停止在國際上製造分裂活動等等。至於我政府對於培養良好氣氛，則是希望中共：一、迅速恢復兩會的溝通管道及兩岸和平氣氛；二、暫時擱置一個中國認知問題或主權爭議；三、停止在國際社會打壓中華民國的行徑等等¹⁶¹。雙方雖然都提出了條件，且兩方所提條件皆有不同程度的砥觸，彼此也都在試探對方的忍受度，但一貫相同的是中共對臺灣所採「高姿態」的對待方式，未曾改變。

一、兩會副秘書長層級第一次預備性磋商

1998年3月26日海協會函覆歡迎海基會組團往訪，函中希望海基會提出具體交流項目，¹⁶²陸委會授權海基會於4月22日至24日，由詹志宏副秘書長率海基會幕僚人員，帶著多達數箱的資料和詳細的參訪人員建議、會晤談話參考、行程建議、甚至規劃媒體採訪場地等，前往北京與海協會進行辜汪會晤預備性磋商。4月23日上午，海基會副秘書長詹志宏與海協會副秘書長李亞飛再會商，雙方就擴大兩會會務聯繫、交流互訪及辜董事長訪問大陸相關事宜初步交換意見，但此次協商成果似乎沒有交集；¹⁶³當日下午，海基會一行照計劃前往海協會辦公大樓拜會，除代表海基會向海協會喬遷道喜外，重點在拜會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唐樹備表示辜汪會晤時「可以」就政治談判程序性安排非正式交換意見。而詹志宏則說明辜董事長訪問大陸應單純化，以參訪為宜，詹副秘書長正式邀請且於回臺後再以傳真函請¹⁶⁴海協會副秘書長率團來台，以進行後續磋商。

詹志宏回臺後，將大陸不友善態度及兩岸中斷協商的過程，以中英文兩種語言，用文字化《海峽兩岸的協商－誰片面中斷？誰積極努力重啓？（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八十七年四月）》與表格化《兩岸交流與協商大事紀（民國84.5-87.4）》的方式向大眾公布。臺灣方面的有意透明化兩岸兩會協商的過程，意對中共形成輿論壓

¹⁶¹ 〈論臺海兩岸的談判氣氛〉，《歐亞研究通訊》，第九期，1998年9月，頁2-3。

¹⁶² 〈兩岸交流與協商大事紀（民國84.5-87.4）〉，陸委會網站。

¹⁶³ 〈海基會詹副秘書長赴大陸（1998.4.22-24）雙方態度比較表〉，《兩岸協商紀要》，行政院陸會網站。

¹⁶⁴ 〈詹副秘書長87.5.12邀海協副秘書長來台交換意見〉，《兩岸兩會往來重要信函》，行政院陸會網站。

力。

二、兩會副秘書長層級第二次預備性磋商

經過多次函電往來協調聯繫，大陸海協會李亞飛副秘書長於 7 月 24 日以率「北京市中小學校外教育考察團」名義來臺參訪八天，團員中另有三名海協會人員（海協會聯絡部主任王小兵、研究部副主任馬曉光、徐尚定），就算是海協會來臺的協商代表。¹⁶⁵大陸希望造成看起來像「順便」來臺討論「辜汪會晤」第二次磋商事宜，沖淡政治性參訪的意涵，海協會代表並刻意以諸多動作，避免造成兩會會談形式。7 月 26 日上午，兩岸兩會臺北海基會內進行磋商，李亞飛副秘書長對海基會所提會務問題，均以非其所掌為由不正面回應；¹⁶⁶同時對於即將要召開的「辜汪會晤」，主張因非兩岸兩會的正式協商，不同意先設協商議題，雙方仍無法就辜董事長率團訪問大陸相關細節達成具體共識。7 月 26 日下午，許副董事長接見大陸參訪團全體團員，並說明李總統在國統會致詞要點；隨後辜董事長並接見海協會李亞飛副秘書長等四人。7 月 27 日，大陸參訪團南下參訪，於 31 日離臺。但該團員中，大陸另派有兩位在大陸屬高層級的記者隨團，新華社記者范麗菁、中新社記者黃少華，除了令外界產生不少聯想外，也顯示大陸方面事實上對這次帶有協商性質的訪問團的重視。¹⁶⁷

三、兩會負責人商定「辜汪會晤」行程磋商

鑒於前兩次的磋商成果皆極有限，海基會於 9 月 3 日函告海協會，建議由許副董事長率團赴北京商定相關事宜；並在經過連日商議，決策階層已經決定，海基會就 14 日、15 日對方兩封來函，明確表達在和平方式解決兩岸關係，及承認兩岸目前分治現實的前提下，臺灣不排斥政治對話的立場。¹⁶⁸海協會在復函海基會商定辜汪會晤的日程時，在電傳函件最後一段的最後一句寫著：「我會同意許惠祐先生於 10 月 8 日至 10 日或 9 月 21 日至 23 日先期來京」。「先期來京」這四個字語意不清且無下文，讓海基會與決策單位不明瞭意涵而傷透腦筋。這是 1998 年 2 月海基會高層人事改組，許惠祐接替焦仁和出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以來，首度獲大陸方面同意以海基會實際負責人的身分訪問北京。¹⁶⁹事實上，大陸方面

¹⁶⁵ 《中央日報》，民國 87 年 7 月 24 日，版 2。

¹⁶⁶ 《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編，臺北：2001 年 4 月，頁 67-68。

¹⁶⁷ 陳茹玲，李書良，《投資中國》，〈海協會副秘書長李亞飛訪台無具體成果—「政治協商？經濟、事務性協商？」〉，第 55 期（臺北，1998 年 9 月）。

¹⁶⁸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9 月 18 日，版 1。

¹⁶⁹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9 月 20 日，版 2。

極不喜歡許惠祐這個談判對手，甚至在許惠祐重回海基會之際，大陸方面對此人事異動案，認為是臺北故意推遲兩岸協商。陸委會發言人許柯生強調，兩岸協商已經制度化，兩會領導人會晤在既有的架構下進行，不會因為個人職務的調整，而影響兩岸協商的政策；許惠祐未來的角色與功能也與過去一樣，不會因人而異。¹⁷⁰而海協會在處理「許唐會晤」上，已不只是兩岸談判策略的相互對抗而已，其中確實蘊涵抵制特定談判代表的政治動機。儘管在兩岸談判過程，兩會談判代表針鋒相對、嚴詞爭論的場景，並不少見，但在兩岸兩會的聯繫函件中，對海基會負責人如此刻意漠視與壓抑者，許惠祐副董事長的遭遇應屬首例。¹⁷¹

經海基會副秘書長詹志宏與大陸海協副秘書長劉剛奇，9月19日經由電話溝通聯繫後，確定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於9月22日至24日率團前往北京商定辜汪會晤事宜。許惠祐率領的會務人員，希望與海協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會面，並直接商定辜汪會晤的具體行程。

9月22日，許副董事長率詹副秘書長等七人，飛抵北京。在機場貴賓室，許惠祐曾召開一次記者會，隨後前往下榻的貴賓樓。晚間由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釣魚台大酒店設宴接待，再一次主動提出「政治對話」；許惠祐明白表示，相關對話應由辜汪兩位先生進行；9月23日上午，許惠祐率詹志宏等人與海協會秘書長張金成等人在釣魚台大酒店進行磋商。由於雙方已商定辜振甫將於10月14日至19日率團訪問大陸，許惠祐此行的重點任務，就是希望讓辜汪會晤的活動「更具實質意義」，因此，將在初步商定的行程架構下，充實活動內涵，增加會晤頻率，減少遊覽觀光行程，並以有助於推動兩會會務，與改善兩岸關係的「功能性取向」為考量。¹⁷²

兩岸雙方就辜汪會晤行程進行討論，經磋商後，大體商定「辜汪會晤」行程原則如下：

- 第一，為表示對汪道涵先生之尊重，雙方同意辜董事長訪問大陸之行程由上海開始，後到北京。
- 第二，雙方同意安排辜汪二人會面四次，包括兩次交換意見(一次為正式會面，一次為京劇堂會)及兩次餐會。交換意見之時間每次將安排一至二小時。
- 第三，雙方同意安排前往香山碧雲寺弔祭孫中山先生衣冠塚、參訪北京大學、參觀上海證券交易所等地。
- 第四，海協會主動提議將安排江澤民先生、錢其琛先生與辜董事長等人會面，海基會基於「客隨主便」及營造氣氛之考量，同意尊重大陸方面之安排。

¹⁷⁰ 〈陸委會例行記者會紀錄(柯副主委主持)〉，民國87年2月6日，陸委會網站。

¹⁷¹ 《中國時報》，民國87年9月17日，版2。

¹⁷² 《中國時報》，民國87年9月20日，版2。

雙方經磋商後，同意於十月十八日安排會面。¹⁷³

海協會並正式建議將安排辜振甫一行在北京期間下榻「釣魚台國賓館」，上海則住宿「波特曼飯店」，海協認為這兩處地點在安全與接待規格上比較合適，至於隨行臺灣記者在北京則建議住宿國賓館附近的「釣魚台大酒店」。

「兩岸會談從那裡中斷，就應從那裡恢復！」這是臺北在最近三年來，歷經一百多次呼籲北京恢復制度化談判機制的政策基調，因此，決策部門堅定地認為，如果透過推動辜汪會晤的誘因，得以適時促使兩會實際負責人恢復溝通對話，對兩岸恢復常態性的會談活動，應有絕對的助益；兩岸談判從「焦唐」中斷，如能從「許唐」恢復，是有助兩會的持續運作。¹⁷⁴此次「許唐會」的成功，也使得許惠祐一掃先前「常敗將軍」的惡名，終於在兩會談判中，取得重大成果。此次「許唐會」事實上給臺灣在對中共的談判中得到相當多的寶貴經驗。此次許惠祐赴北京商談，可以提供臺灣相關人士思考的，絕不止是看到兩岸關係略為緩和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由中共處理許惠祐赴大陸的過程，應該看到北京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表現出來的既靈活又有原則性的兩手策略，也就是中共通常在對外政治談判時一貫採取的一手硬、一手軟的策略。若能理解此種中共慣用的談判策略，對於解析未來兩岸兩會的各種形式的商談，將極具參考意義。

中共在處理許惠祐邀訪案中，表現出來的策略有三：其一、貶地位。以口頭和函件，在形式上貶抑許惠祐的地位，讓外界確實了解海協會方面對許惠祐的不滿。例如，強調副秘書長層級會晤，而刻意排擠許惠祐做為兩會準備辜汪會晤的主談地位；其二、軟教訓。讓許惠祐陷入地位尷尬的處境，增加許惠祐的心理壓力，使許惠祐知所警惕。例如，在海協會發函同意許惠祐訪問北京時，卻完全不提許的北京行程安排，使許惠祐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其三、寄溫情。讓許惠祐在迷惘中得到渴望的關懷，形成許惠祐的感情壓力。例如，許惠祐在北京期間，雖然由海協會秘書長張金成¹⁷⁵接機，但隨後唐樹備卻沒有少見許惠祐，而且也表現出相當的熱情，讓許惠祐此行的商談任務順利達成，使許惠祐真正感同身受。務實檢視許惠祐此行的成果，這樣的進展只能說是兩岸關係再出發極小的一步，離兩會實質的對話仍有相當距離。因為，如果雙方只是「立場不變、說法改變」，未來發展仍將會再度陷入過去的循環。¹⁷⁶

¹⁷³ 《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編，臺北：民國 90 年 4 月，頁 70-72。

¹⁷⁴ 王銘義，〈兩會未交手心戰先登場〉，《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9 月 25 日，版 2。

¹⁷⁵ 張金成，男，1939 年 5 月生，河北省人。最高學歷：中國科技大學。經歷：駐日本大使館參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副局長，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局長。現職：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秘書長(1998-)，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1998-)。

¹⁷⁶ 俞兩霖，〈中共靈活運用談判策略〉，《中國時報》，1998 年 9 月 20 日，版 2。

四、「辜汪會晤」前的臺灣決策和行程正式確定

行程時間已訂，兩地人員都加緊安排商議參加會晤的人員名單，各項準備作業進入緊鑼密鼓階段，海基會正協調決策部門作最後階段的商定訪問團的成員名單。訪問團正式成員名單，原則上都是「大陸工作體系」人員，但不排除有政黨背景的人士參與，在獲得民進黨的諒解後，人員安排的彈性空間更為加大。海協會方面則派員分赴京滬兩地，聯繫安排接待辜振甫一行的相關事宜。大陸方面認為，雖然辜振甫率團訪問定位在參訪性質，但因辜先生此行也是「總書記的客人」，不僅接待規格要符合兩會的相關規定，大陸公安部與武警部隊的警衛局還將派遣特勤警衛人員，全程隨行保護辜先生與其他團員的安全，辜先生住宿的套房外並將安排全天候的警衛勤務。10月10日海基會成員正式確定訪問團團員名單，除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¹⁷⁷外，包括：許惠祐¹⁷⁸（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¹⁷⁹、康寧祥¹⁸⁰（國統會委員、監察委員）、張榮恭¹⁸¹（國統會研究委員、國民黨陸工會主任）、吳榮義¹⁸²（國統會研究委員、臺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包宗和¹⁸³（國統會研究委員、

¹⁷⁷ 辜振甫，男，1917年1月6日生，臺北市人。最高學歷：臺灣大學名譽法學博士。經歷：工商協進會理事長(1961-1974)，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1962-1964)，亞洲太平洋商工總會理事長(1968-1970)，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1981-1987)，行政院經濟改革委員會總召集人(1985)，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主席(1990-1992)，代表李總統出席三次 APEC 領袖會議(1995-1997)。現職：總統府資政(1991-)，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1990-)，臺灣水泥公司董事長(1973-)。

¹⁷⁸ 許惠祐，男，1952年11月2日生，臺灣南投人，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經歷：台南地方法院法官(1981-1984)，臺北地院士林分院法官(1984-1990)，臺北地方法院法官(1990-1991)，海基會法律服務處處長(1991-1993)，海基會副秘書長(1993-1996)，行政院大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6-1997)，國民黨中央秘書處主任(1997-1998)。現職：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暨秘書長(1998-)，淡江大學副教授(1996-)。

¹⁷⁹ ()內的說明為每位成員當時的身份，人名後的註解為至2003年各人的簡歷。

¹⁸⁰ 康寧祥，男，1938年11月16日生，臺北市人，最高學歷：國立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學士。經歷：臺北市議員(1969-1972)，立法委員(1972-1980)，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1984-1985)，首都早報發行人(1989-1990)，國是會議籌備委員及主席團主席(1990)，國民大會代表(1991-1993)，監察委員(1993-2002)，國防部副部長(2002-2003)。現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2003-)，國際文經協會副會長(1991-)，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1990-)。

¹⁸¹ 張榮恭，男，1950年1月1日生，臺北市人，最高學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碩士。經歷：中央社大陸新聞部編輯(1975-1985)，中央月刊副總編輯(1983-1985)，中央社大陸新聞部主任(1986-1998)，輔仁大學講師(1989-1991)，中央社副總編輯(1994-1998)，中國國民黨中央大陸研究工作會主任(1998-2000)。現職：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兼大陸事務部主任(2000-)，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員(1995-)。

¹⁸² 吳榮義，男，1939年12月15日生，臺灣高雄人。最高學歷：比利時魯汶大學經濟學博士(1971)。經歷：中興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75-1979)，中興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教授，所長(1979-1984)，臺灣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兼研究所所長(1985-1992)，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1991-1992)，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副秘書長(1991-1992)，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中華民國總會秘書長(1991-199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1992-1993)。現職：總統府國策顧問(2000-)，臺灣經濟研究院院長(1993-)，臺北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1984-)。

¹⁸³ 包宗和，男，1952年1月31日生，江蘇鎮江人。最高學歷：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治學

台大政治系主任)、蔡英文¹⁸⁴(陸委會諮詢委員、政大教授)、鮑正綱¹⁸⁵(陸委會主任秘書)、詹志宏¹⁸⁶(陸委會企劃處長兼海基會副秘書長)、劉德勳¹⁸⁷(陸委會法政處長)、謝福源¹⁸⁸(陸委會法政處副處長兼海基會法律服務處長)、何武良¹⁸⁹(海基會法律服務處科長)等十二人。隨行人員名單,包括辜家成員與私人醫護人員:辜嚴倬雲(辜夫人)、辜啓允(辜長子)、辜懷群(辜長女)、葛保羅(辜機要秘書)、謝炎堯(隨行醫師)、張念雪(隨行護士);隨團海陸兩會的會務人員,則有周繼祥(海基會主任秘書)、廖運源(海基會經貿服務處長)、徐建(海基會秘書處長)、方鵬程(海基會綜合服務處副處長)、張志宇(陸委會聯絡處科長)、周道君(陸委會法政處科員)、陳榮元(海基會經貿服務處專員)、梁玉珍(海基會綜合服務處專員)、盧正愷(海基會綜合服務處專員)、王正磊(海基會秘書處專員)、張峰青(海基會法律服務處組員)、陳祖愉(海基會秘書處組員)、彭雯漪(海基會秘書處組員)、焦德新(海基會秘書處辦事員)等二十人,全團成員總計高達三十二人。對於海基會參訪團成員的層級參差不齊,有政務官、有基層科長,甚至出現隨行工作人員層級比團員層級還高等現象,陸委會發言人許柯生副主委強調:「這

博士。經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客座副教授(1986-1989),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1989-1990),臺灣大學聯誼會理事長(1991-1992),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1993-1995),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兼政治研究所所長(1996-1999)。現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2000-),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1995-),行政院新聞局兼任顧問(1993-),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1990-)。

¹⁸⁴ 蔡英文,女,1956年8月31日,臺北市人。最高學歷: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經歷:政治大學法律系法研所副教授,教授(1984-1991),東吳大學法研所教授(1991-1993),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1994-2000),「港澳條例」起草研究小組計劃主持人(1994-1995),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1995-1998)。現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2000-),政治大學國貿系教授(1993-)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委員(1993-),經濟部「國際經貿組織專案小組」顧問(1993-)。

¹⁸⁵ 鮑正綱,男,1956年3月8日生。最高學歷:國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經歷:銓敘部副司長(1989-1990),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處長(1990-199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秘書(1993-199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參事(1994-1996)。現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秘書(1996-)。

¹⁸⁶ 詹志宏,男,1956年5月11日生,臺北市人。最高學歷: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經歷: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員(1982-1985),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員(1985-1989),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1989-1990),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處長(1991-1993)。現職:海峽交流基金會兼任副秘書長(1998-),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企劃處處長(1993-)。

¹⁸⁷ 劉德勳,男,1952年9月1日,臺灣苗栗人。最高學歷:政治大學法律系畢。經歷:行政院法規會專門委員(1988),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第三組副組長(1989-1990),行政院第一組秘書兼副組長(1990-199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法政處處長(1993-2002)現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2-)。

¹⁸⁸ 謝福源,男,1960年7月2日生,高雄市人。最高學歷: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銀行法碩士、美國富蘭克林皮爾司法學院智慧財產權法碩士。經歷:臺灣台中等地方法院檢察官,檢察官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辦理法政處副處長業務兼海基會法律服務處長,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法律服務處處長。現職: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內部律師。

¹⁸⁹ 何武良,男,1962年9月15日生,南投縣人,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畢。經歷:律師、法院公證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法律服務處一等專員。現職: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法律服務處副處長。

是海基會建議的名單，陸委會同意的，名單不會再更改。沒有任何人代表任何政黨的考量。」¹⁹⁰

11日陸委會主委張京育授權此次大陸之行可「自由交談」，所謂「建設性對話」不止包含大陸方面的「政治性對話」，「三通」、「戒急用忍」、甚至兩岸軍事演習通報制度、領導人互訪，都可以成議題¹⁹¹。這樣的授權，使得辜振甫一行更出訪的輕鬆自在。

五、「辜汪會晤」正式行程

1998年10月14日－19日，辜董事長率團訪問大陸，在上海和海協會汪道涵¹⁹²會長舉行兩次會晤，獲致四項共識；在北京會見了江澤民¹⁹³、錢其琛¹⁹⁴、陳雲

¹⁹⁰ 《中國時報》，民國87年10月10日，版1。

¹⁹¹ 《聯合報》，民國87年10月11日，版1。

¹⁹² 汪道涵，男，1915年3月27日生，安徽嘉山人。最高學歷：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美國塔夫茨大學公共管理學榮譽博士。經歷：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新四軍四支隊戰地服務團團長、縣長、行署副主任、專員、地委委員等職(抗日戰爭時期)，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副主任(1945)，蘇皖邊區政府財政廳、建設廳副廳長、華中軍區、山東軍區軍工部長、政委、省財辦主任、財政廳長(1946-1949)，浙江省政府財政廳廳長(1949)，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1949)，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59)、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中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53-1980)，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56-1969)，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8-1988)，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副市長、市長(1980-1986)，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82-1987)，上海市政府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1986)，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7)，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1990)，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1991)，第九屆上海市工商聯名譽會長(1993)，上海交通大學董事會聘為名譽董事長(1994)。現職：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1990-)，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1991-)，上海市人民政府高級顧問，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顧問，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金會顧問，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高級顧問，上海市政府世貿組織事務諮詢中心顧問。

¹⁹³ 江澤民，男，1926年8月17日生，江蘇省揚州人。最高學歷：交通大學機電系(1947)。經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43)，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上海市益民良品一廠第一副廠長(1949)，上海市制皂廠第一副廠長(1950)，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市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科長(1953)，赴蘇聯莫斯科史達林汽車廠實習(1955)，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副處長、副總動力師、動力分廠廠長(1956)，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1959)，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市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1959)，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代理黨委書記(1959)，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1973)，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局長(1973)，國務院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國務院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秘書長(1980)，國務院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1982)，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82-198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3-1988)，國務院電子工業部黨組書記(1983)，國務院電子工業部部長(1983)，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1985)，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1985)，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1987)，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87-199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8-199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89)，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9-)，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92-199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93-199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1993-2003)。現職：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林¹⁹⁵等人，並進行建設性對話。

10月12日，海基會詹志宏率領先遣小組飛抵上海，展開先遣作業，就會晤場地、參訪地點、人員住宿、記者會之佈置等預作安排。

10月14日上午，辜董事長率訪問團出發，在香港轉機停留時，中共新華社臺灣事務部部長邢魁山、香港特首特別助理葉國華等人在機場接待；該團下午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海協會由常務副會長唐樹備¹⁹⁶前來迎接，訪問團一行經國賓門禮遇通關，辜振甫在機場發表簡短談話後，隨即前往下榻之波特曼大酒店，並在該酒店召開記者會。記者會中，辜董事長以「融冰之旅」定位此行。14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訪問團抵和平飯店舉行第一次辜汪會晤，海基會全體團員參加，海協會方面由汪道涵會長夫婦、唐樹備夫婦、李亞飛¹⁹⁷等人與會。雙方各自宣示立場，

(1989-)。

¹⁹⁴ 錢其琛，男，1928年1月5日生，上海嘉定人。最高學歷：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歷：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國務院高等教育部留學生司處長，駐幾內亞比紹大使館大使，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楊浦區委員會書記(1949)，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徐匯區委員會委員(1949)，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長寧區委員會委員(1949)，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辦公廳研究員(1953)，駐蘇聯大使館二等秘書(1955)，國務院高等教育部對外司副司長(1963)，駐蘇聯大使館參贊(1972)，駐幾內亞大使館大使(1974)，國務院外交部新聞司司長(1977)，國務院外交部副部長(1982)，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85-1992)，國務院外交部部長(1988)，國務院國務委員(1991)，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92-1997)，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92-199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93-1998)，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會主任委員(1993)，國務院副總理(1993-)，中共中央政治局(1997-)，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97-)。現職：國務院副總理(1993-)，中共中央政治局(1997-)，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97-)。

¹⁹⁵ 陳雲林，男，1941年12月8日生，遼寧黑山人。最高學歷：北京農業大學土壤化學系(1967)。經歷：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黑龍江省黨組書記，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榆龍屯化工廠委員會副書記(1967)，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榆龍屯化工廠(1968-1971)，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榆龍屯化工廠副廠長(1978)，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榆龍屯化工廠廠長(-1981)，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市委副書記(1981-1983)，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省委候補委(1983)，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市長(1983-1985)，黑龍江省委副書記並兼任多職(1985-1988)，黑龍江省常務副省長(1987-1994)，中共十三大代表(1987)，中共十四大中央候補委員(1992)，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兼發言人(1994-1996)、主任(1996-)。現職：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1996-)，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97-)。

¹⁹⁶ 唐樹備，男，1931年1月29日生，上海市人。最高學歷：華東新聞學院。經歷：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福建日報社編輯(1949-1955)，福建日報社記者站負責人(1949-1955)，中國新聞社秘書、副組長、組長(1957-1969)，國務院外交部領事司副處長(1971-1978)，駐日本大使館一等秘書(1978-1982)，國務院外交部領事司處長(1982-1983)，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總領事(1983-1986)，駐美國大使館公使(1986-1988)，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副主任(199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93-1998)。現職：全國政協(2002-)，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2000-)，海協會兩岸關係雜誌社社長。

¹⁹⁷ 李亞飛，男，1955年生，河北省人。最高學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所中共黨史碩士。經歷：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綜合局副處長，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研究組副處級研究員，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助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綜合部主任(1991-1994)，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研究部主任(1994)，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秘書長(1994-2000)。現職：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秘書長(2000-)，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綜合局局長(2000-)。

辜振甫在會中提及「波茨坦宣言」後，並進行所謂建設性對話；會後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和平飯店設宴款待訪問團一行。

10月15日上午為參訪活動，下午五點許進行第二次「辜汪會晤」。訪問團一行前往浦東新區，參訪上海證券交易所，並遊覽東方明珠電視塔；辜董事長夫人則代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前往蔣夫人父母位於上海虹橋宋氏墓園獻花致意；中午訪問團出席台商在湯臣大酒店舉辦之歡迎餐會。當日下午訪問團參觀上海博物館；下午四時十五分，由辜董事長夫婦、許惠祐、吳榮義、包宗和、蔡英文、詹志宏等七人，在新錦江飯店進行第二次辜汪會晤，海協會方面則有汪會長夫婦、唐樹備夫婦、李亞飛、馬曉光及上海市台辦副主任郭戈等七人與會。進行討論後，獲致雙方同意加強對話，以促成制度化協商的恢復等四項共識。晚間，辜董事長於波特曼大酒店設宴，邀請汪會長夫婦、唐樹備夫婦、上海市周慕堯副市長等人士參加。席間雙方咸認此次會晤極富意義，整體氣氛良好。答宴後，訪問團一行在汪會長夫婦等陪同下前往蘭心大戲院觀賞京劇堂會。

10月16日上午，訪問團一行參觀豫園、城隍廟，由上海市周副市長陪同；當日下午一時，搭機赴北京，於二時五十分抵達首都機場，訪問團由國賓門通關後，即驅車前往香格里拉大飯店舉行記者會，辜振甫在記者會中以「融冰之旅」形容此行；他說，融冰之旅比破冰之旅更恰當，他相信，「冬天到了，必定是熬過冰霜之苦」。他說「無論如何總是來到北京」。會後下榻於釣魚台國賓館。晚間，海協會在釣魚台大酒店舉行歡迎酒會，邀請全體人員參加。

10月17日上午，訪問團前往香山碧雲寺，向孫中山先生紀念堂獻花致敬，辜振甫發表談話，希望與大陸分享實踐中山先生民主思想的經驗。隨後轉赴北京大學參訪，向嚴復先生銅像獻花致意，參觀嚴先生紀念堂。下午訪問團一行參觀北京故宮博物院，五時卅分全團赴人民大會堂，出席陳雲林晚宴，雙方致詞時仍各自表達立場，席間並就各項話題交換意見。宴會後，全體團員前往長安大戲院觀賞京劇晚會。

10月18日上午九時，辜振甫率訪問團十一位團員，前往釣魚台國賓館二號樓會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雙方就一中問題等表達各自立場與看法，氣氛尚稱平和，雙方均同意兩岸應多交流、多對話、多接觸，以繼續坦率交換意見；其中錢其琛對辜振甫所提「一個中國，內外有別」的提問，錢其琛則以多年對臺及主持中共外交系統的立場，明確否認了所謂「內外有別」的可能性。¹⁹⁸「辜錢會」會後，許惠祐率張榮恭、包宗和、蔡英文等人至釣魚台大酒店，向記者說明會見經過。中午，訪問團接受台資企業協會宴請。下午三時五分，辜董事長夫婦率許惠祐、張榮恭、詹志宏等五人赴釣魚台國賓館十八號樓四季廳與江澤民先生會面，原先海基會所安排的康寧祥一直未得到大陸方面的同意參加與江澤

¹⁹⁸ 《中時晚報》，1998年10月19日，版2。

民會面，這顯示大陸方面對於臺灣要向大陸介紹臺灣民主化經驗的企圖敬謝不敏，應不是刻意要矮化康寧祥。¹⁹⁹在會晤時，江先生首先肯定「辜汪會晤」四項共識之結果，並請辜董事長發言。辜振甫依臺灣立場提出說明，江先生隨後也有所回應；最後雙方都認為，今後應多進行面對面會談，以促進彼此瞭解。

10月19日上午，辜董事長率團離開北京，在日本東京成田機場過境時，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後藤利雄、我駐日代表莊銘耀先生在機場接待並晤談。海基會代表團一行於晚間九時二十分返抵國門，即前往陸委會報告行程經過。

10月20日，李登輝總統接見辜振甫等全體團員，並高度肯定此行成就。²⁰⁰

第三節 兩岸立場的陳述

參訪團成員之一康寧祥表示，「辜汪會晤」的整個過程，一切都在臺灣沙盤推演當中，並無太過意外的演出，整體表現應屬允當。²⁰¹辜振甫的大陸之行，臺北坦率而清楚的傳達北京一個訊息，要臺北回到「一個中國」，北京得先承認中華民國。換言之，臺北也在北京所設定的談判前提裡，再設置了一個「承認中華民國」的前提。前提之上又有前提，真是「棋逢對手一般平」。²⁰²整體而言，辜振甫以幾近乎以總統特使的規格赴大陸訪問，在事務層面上，等於給了中共片面中斷兩岸協商的一個下台階，對於海基、海協兩會今後例行會務的推動、人員的互訪，確實有暖身的作用；在政治層面上，此次辜振甫來訪，北京當局強烈感受到臺北要求釐清彼此政治定位的訴求，以及用外交空間等觀察指標，做為判定中共誠意的立場。當然兩岸雙方在此次對話中，皆肯定協商交流的必要性，但兩岸政治敏感的針峰相對，也隨著「辜汪會晤」行程而漸次直接面對，這樣的發展也可能是中共方面始料未及的。這次「融冰」之旅，是兩岸「政治對話」的開端，也是歷來兩岸政治人物傳達彼此政治訊息最清晰的一次，對兩岸關係的互動及影響，至深且遠（有關辜汪會、辜錢會及辜江會的共識與分歧一覽表，詳見附錄二）。

一、與大陸相關人士的對話內容

此行會晤的大陸相關人士，依序為汪道涵先生、陳雲林先生、錢其琛先生及江澤民先生等人，四人大致談話重點及順序整理如下：

（一）汪道涵

¹⁹⁹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8 日，版 3。

²⁰⁰ 《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頁 76-82。

²⁰¹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21 日，版 2。

²⁰² 呂庭華、唐湘龍、郭淑敏，〈辜振甫大陸行三道伏筆〉，《中時晚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版 2。

第一次在十四日下午，第一次「辜汪會晤」雙方全體會見，辜汪兩人大體依定稿各自宣示立場。汪道涵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²⁰³。汪道涵提及的「一個中國」、「政治談判」等問題，辜振甫特別引據歷史事實，加以回應，促請大陸方面正視兩岸互不隸屬之事實；強調兩岸協商應重誠信，如新加坡簽署之協議都不能遵守，則無法累積互信，大陸方面期盼之「政治談判的預備性磋商」，也無法討論。

15日，雙方各指派七位代表繼續進行第二次「辜汪會晤」，會後達成四項具體共識²⁰⁴如下：

- 第一，兩岸的歧見仍存，希望未來加強對話，以促成恢復制度化協商，由兩會負責人具體協商作出安排。
- 第二，促進兩岸兩會不同層級的交流。
- 第三，有關因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兩岸同胞人身與財產安全問題，在未獲致通案解決前，兩岸將針對個案予以積極協助處理。
- 第四，辜振甫當面正式邀請汪道涵在適當時機到臺灣訪問。

（二）陳雲林

陳雲林提出「此次辜先生率團來訪，是兩岸關係新形勢下海協與海基會努力擴大交流與接觸的具體成果，對於促進兩會的接觸與對話及改善兩岸關係氣氛上，具有重要的、積極的意義」，「希望兩會繼續努力，求同存異，擴大共識，為及早進行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並隨之重開兩會經濟性、事務性商談創造條件」²⁰⁵、「縮短和平統一進程」。希望兩岸進行政治對話，早日從事政治談判的程序性磋商等說法，並提及「江八點」。辜董事長致辭時，除請大陸方面應重視遵守協議的誠信問題及優先協商攸關人民權益之議題，並請對方正視「李六條」所提六項具體建議，呼籲兩岸應「情緒散盡，交流協商」，促其尊重兩岸對等分治、「需較長時間的增進了解，拉近距離」²⁰⁶的現實。

（三）錢其琛

²⁰³ 《汪辜上海對話－汪道涵會見辜振甫談話提綱》，〈兩岸對話與商談〉，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網站。http://big5.gwytb.gov.cn:82/lasht/lasht0.asp?last_m_id=236。

²⁰⁴ 《中央日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6 日，版 1。（因四項共識係口頭提出，雙方並未再以文字確認，故各版本文字皆有出入，本文以中央日報版本為主。）

²⁰⁵ 《汪辜上海對話－汪道涵會見辜振甫談話提綱》，〈兩岸對話與商談〉，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網站。http://big5.gwytb.gov.cn:82/lasht/lasht0.asp?last_m_id=242。

²⁰⁶ 《聯合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8 日，版 2。

辜振甫先就兩岸分治現實、臺灣國際生存空間及兩岸合作等主題說明後，錢其琛提出對「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活動空間及民主化三項話題之看法；辜振甫立即回應，表達臺灣立場，雙方的針峰相對，是兩岸高層罕見的政治對話。

第一，「一個中國」原則

錢其琛強調「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方面常說臺灣的『國際空間』受到打壓，實際上這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現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達到一百六十二個，同臺灣保持關係的國家很少了，只有二十多個。一個中國並非內外有別，這只是國際趨勢，這種趨勢還會發展」²⁰⁷。大陸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的領土與主權不容分割」。辜振甫立即回應指出，對於「一個中國」雙方原均各有立場，且曾獲致「口頭上各自表述」之共識，如果大陸欲強作片面解釋，並藉以打壓臺灣國際空間，將造成兩岸關係負面影響。

第二，國際活動空間

錢其琛表示，大陸方面並未打壓臺灣國際空間，我邦交國之減少，乃國際之歷史趨勢使然。辜振甫即加以反駁，強調中華民國雖然被迫離開聯合國，但依國際法只要能享受權利，履行義務，國家就是存在；大陸在國際上一再排擠臺灣，已引起臺灣地區民眾反感。辜董事長並順勢提議，兩岸可在國際間共同合作，例如：共同參與東亞金融風暴問題之解決，並參與「朝鮮半島能源發展組織」(KEDO)，以維繫區域之安定繁榮。對此建議，錢其琛僅表示，大陸未參與²⁰⁸。

第三，民主化

錢其琛針對性的表示，民主化不是統一的決定因素，要將臺灣式的民主推廣到大陸，不可行也不切實際。辜振甫指出，民主化乃世界潮流，統一不是單純土地的合併，而是制度與生活方式的選擇，所以大陸民主化還是未來兩岸和平統一的關鍵。

(四) 江澤民先生

在會面時，辜董事長指出，辜汪會晤已達成四項共識，希有助於促成恢復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辜董事長同時指出，臺灣願與大陸交流，分享民主化經驗；願促進兩岸農業合作；並希望兩岸最高領導人在 APEC 見面。

江澤民先生首先肯定辜汪會晤四項共識，隨即針對民主化問題表示，江澤民以國情論來回應，江澤民認為，「民主不是抽象、絕對的，而是具體相對的，每個地區、每個國家都有不同國情，也有不同的民主化歷程，如英、日兩國還有女王、天皇；美、法、德的總統權力大小都不相同」。事實上，大陸也在追求民主化。民主因地區、國情而有不同發展。大陸因人口眾多，且教育不普及，不可能進行全

²⁰⁷ 《中央日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版 2。

²⁰⁸ 《中央日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版 4。

民直選，但民主化工作已在大陸農村試行中；對於兩岸領導人會面一事，江先生表示已注意到臺灣循序漸進的說法，目前宜先創造氣氛，而汪道涵先生已同意訪台，可以先推動；對臺灣建議雙方可在農業方面尋求合作，江先生頗感興趣。

對於江澤民有關民主化議題，辜振甫提議，大陸可先從加強民主教育著手，並可逐步發展民主政黨政治。此次談話江澤民天馬行空說了一個多小時，對許多問題都沒有直接正面的反應，而辜振甫也改變表達方式，以婉轉迂迴的語氣，陳述臺灣的立場。彼此都有表明立場的坦率，也有收場的技巧和智慧，逐步以自然的氣氛，營造逐級提高對話層級的空間。²⁰⁹

二、臺灣方面的談話綜合整理

「辜汪會晤」行程中，除辜振甫的發言和與中共相關人員見面的即席互動演說外，當然各項記者會中的許惠祐發言，也受到相當重視。基本上，許的發言都是為演繹辜振甫的說法，辜振甫的相關談話全文將以附件方式於文末（詳見附錄三），故以下不再細分兩者發言，而綜合整理此次會晤的談話重點：

（一）對於「一個中國」的立場

「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定義，糾葛兩岸多年，兩岸一直各本立場而僵持不下，以致構成兩岸交往的根本障礙，是阻撓兩岸交往的主要癥結，臺北方面一直在傳遞的訊息為是「一個分治的中國」，認為北京方面不可「假設中華民國不存在」。對於「一個中國」的問題，參訪團不斷地從不同角度說明立場。如，許惠祐 14 日在上海所說：「關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在國統綱領中已經寫的很清楚。」；19 日，許惠祐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又稱，「一個中國」不可有排他性及侵略性；「一個中國」原則不因打壓臺灣國際空間；臺北方面詢問所謂「三光政策」等，事實上是臺北當局想總結兩岸關係多年來的糾結，向北京當局「打開天窗說亮話」。希望透過辜振甫赴大陸參訪的機會，既讓國際人士看清兩岸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拋出歷來橫亘兩岸的問題，向北京當局直接要答案。從臺北的規劃看來，辜汪會晤的談話內容的敏感度是由上海往北京推移，隨著會見中共官員層級的升高，「一齣要比一齣精彩」。「辜汪會晤」後的結果檢驗，在會見唐樹備、汪道涵、陳雲林、到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及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過程中，辜振甫陸續拋出了「一個中國」、「臺灣外交空間」、「李江會」、「政治民主化」等問題，也真如臺北所設計，話題越來越直接而切中兩岸癥結。²¹⁰

²⁰⁹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版 2。

²¹⁰ 呂庭華、唐湘龍、郭淑敏，〈辜振甫大陸行三道伏筆〉，《中時晚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版 2。

（二）國際空間

臺灣實際上在此次「辜汪會晤」是利用中共之助向國際社會發音。兩岸國際地位懸殊，平時臺灣的立場與政策考量，比較不容易受到國際社會注意。但中共的「一個中國」的論調，卻已經被國際所接受；而辜振甫在北京，在國際輿論的矚目中，當面對江澤民表達我們的立場，也藉此爭取到更多國際輿論的傾聽。另辜振甫在與錢其琛見面時特別提到「大陸方面在擴大與外界接觸後，允宜以更開闊的胸襟與前瞻的視野來面對兩岸在國際上的互動」，並直接試探中共可否不要阻礙臺灣參與 KEDO(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顯然臺灣希望在外交的開拓能夠有所突破。²¹¹

（三）臺灣民主化成就

臺北方面特別強調民主，謂「只要大陸施行民主，什麼問題都可以談」。臺灣方面認識到和大陸打交道是無可避免的，討論政治性議題也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策略上朝野都主張打出民主牌。所以辜振甫行前，蕭院長即已強調兩岸基層人民交流、安全，團員有民主見證人稱謂的康寧祥參團、乃至於希望江澤民接見康寧祥等，推動全中國的民主，成為臺灣抗拒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利器，和臺灣的現實利益聯繫起來。²¹²

第四節 會晤達成的議題

客觀而論，海基會代表團此行的表現可稱十分優異，在 1998 年的當時，中共的積極向國際示好而刻意打壓我外交空間，而臺灣內部因代表的產生各黨均有意見下，這樣的內外情勢中，很難想像會有更好的結果。雖然此行的兩大目標—營造良好氣氛與恢復制度性協商，似皆未能達成，但至少兩方都把話說的十分明白，已就是很大的成就。接下來，就要看兩岸如何因應會後的情勢。

北京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辛旗認為，隨著在上海和北京兩地舉行的「辜汪會晤」、「辜錢會見」和江澤民對辜振甫禮節性的會見，兩岸緊張的氣氛漸趨緩解。兩岸高層的直接政治對話宣告開始，兩岸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是兩岸共同努力尋求解決問題誠意的體現，也是是化解兩岸關係難題的一次新的嘗試。²¹³

整體來看此次的「辜汪會晤」的四項共識是成功地讓國際及兩岸人民看到，兩岸對話甚至談判的真實面貌，也可以由四項共識來看此次會晤：第一，形式重

²¹¹ 張慧英，〈辜汪會中的「國際牌」〉，《聯合報》，民國 87 年 10 月 20 日，版 2。

²¹² 吳玉山，〈臺灣守住了陣線 大陸堅定了打壓〉，《聯合報》，1998 年 10 月 19 日，版 13。

²¹³ 辛旗，〈辜汪「四項共識」有助兩岸關係發展〉，《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1998 年 10 月 22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19002.htm>。

於內容。「四項共識」的第一點是兩岸承認存在分歧，希望加強對話，以促成恢復制度化協商。兩岸政治分歧由來已久，對話的形式本身就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指標，如果這種對話的形式得以持續進行，不致中斷，相信兩岸高層的對話會在「體面的形式」下，逐漸觸及到更實質、更敏感內容。第二，氣氛蓋過分歧。四項共識中的二、三、四點，是促進海協會和海基會不同層級的交流，以個案方式解決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兩岸同胞人身與財產安全問題，以及辜振甫當面邀請汪道涵在「適當時機」訪問臺灣。這些內容表明雙方在有意營造兩岸關係良好的氣氛，讓政治分歧以對話的方式處理，事務性問題的解決同時並進，互不偏廢。這對兩岸同胞求和、求安、求利、求發展、求交流，無疑是利多的舉措。第三，直接強於間接。此次辜汪在上海實現了第二次會見，與第一次「辜汪會談」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新加坡時雙方意見及立場的分歧，屢屢成爲無法全面落實事務性商談達成協議的重要障礙，兩會的作用仍然停留在間接（官方白手套）的層面。也源由於雙方在外交上的角力，在國際領域稍有風吹草動，兩岸立即面臨崩裂的局面。這次會晤雖然超出了原先兩會事務性商談的模式，對話的主題直接深入到雙方的政治分歧，不再是以前的「隔海喊話」或是通過仲介人事傳話，是直接對話，這樣的機制對兩岸關係是積極正面的。「建設性對話」也好，「政治對話」也罷，終將是政治性議題商談的前奏，是走向政治談判的必由之路。

此一會晤除氣氛熱烈，融洽的相互酬酢和琳琅滿目的參訪之外，「辜錢會」與「辜江會」雙方觸及到兩岸政治的原則性分歧，比如對一個中國的解釋，對臺灣「外交空間」、「政治定位」、民主問題，臺灣民眾的歷史情感和在中國近代史的特殊性問題等，能將這些複雜且敏感的問題直接面對面的交談，坦誠地將分歧擺上臺面，主動存異求同。這也正是江澤民對辜汪兩岸長者達成「四項共識」持讚賞態度，並對表示高度肯定的根本原因。

第五章 「辜汪會晤」評析

兩岸兩會的領導人經過多年的波折，終於在上海會面了。儘管雙方都將此次的見面定位在「參訪、會晤」。辜振甫抵滬首日，在波特曼飯店的記者會中說：「兩岸最缺乏的是互信，我來就是要找回互信」。互信或許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雙方將原來模糊化處理的問題完全被挑明了出來，臺灣與大陸在策略上各打「民主」及「民族」牌，兩方針鋒相對底牌盡現的結果，對於未來臺灣在擊劃大陸政策發展方向時更加清楚明白中共的意圖而有所因應；而兩岸高層的坦然溝通，從兩岸關係的發展來說，此次「辜汪會晤」應該可以視為中華民國政府繼「終止動戡」、1993年新加坡「辜汪會談」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辜振甫是兩岸分治以來，第一位經由政府正式、公開授權後，赴大陸與中共當局就兩岸關係議題，進行直接對話的會晤代表。會晤的氣氛、方式、對話的內容和會晤的結果，間接或直接影響到兩岸關係短期的互動和長期的發展。²¹⁴「辜汪會晤」至少具有幾項重要的意義：

第一，兩會領導人的會面，已成為舉世注目的焦點。自從1995年6月，中共以杯葛兩會協商作為施壓工具以來，各界對於重啟兩岸正常互動具有相當的期待，也造成辜汪會晤成為數百名國際媒體記者競相追逐、採訪的焦點。

第二，辜汪會晤證實了兩岸縱然存在著高度的政治爭議，還是可以實現兩岸高層人士當面對話。正如同江澤民與錢其琛在結束會面時，異口同聲向辜振甫表示，儘管立場不同，但兩岸有必要多對話、多溝通。

第三，辜汪會晤展現出兩岸在互不否定對方的態度上，雙方關係就可以產生進一步發展的契機。互不否定對方是相互尊重的起點，辜振甫在與大陸各領導人會面時，雙方就是在這種態度上進行對話，結果是具體的，是應受到雙方共同珍惜的。臺北留下了汪道涵來訪、亞太經合會、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等議題，靜待中共方面的回覆。

第一節 臺灣內部民意的反應

根據聯合報1998年10月11~12日的民意查顯示臺灣地區的近六成民眾認為這次辜振甫訪問大陸，不可能會有解決兩岸問題的實質結果，但是在10月19日的調查中，仍有四成六的民眾認為此次的「辜汪會晤」，是有助於改善兩岸關係的。²¹⁵「辜汪會晤」中辜振甫所代表臺灣人民意見的表達上，都有民意為基礎。例如，在第一天會晤汪道涵時便強調，「兩岸隔海對等分治、互不隸屬已近五十年，『一

²¹⁴ 《中國時報》，民國87年10月16日，版2。

²¹⁵ 〈民國八十七年民眾對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的看法綜合分析〉，1999年2月，陸委會網站。

個分治的中國』既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新興民族基金會在同年七月公佈的民調中指出，近七成的受訪者認為「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六成五的受訪者認為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只包括臺澎金馬。

民進黨在辜汪會晤前特別發表立場表示：「臺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辜汪會晤時，許惠祐也特別強調臺灣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兩岸主權分立，就是臺灣普遍的主流認知與價值。其次，臺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臺灣的前途應該由臺灣兩千一百萬人民決定，臺灣樂於與中國分享臺灣民主化的經驗，臺灣也樂於協商如何保護大陸同胞在臺的人權保障。歐亞學會在辜汪會晤前夕所做的民調指出，高達八四的受訪者認為「臺灣前途應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而非中國」。從陸委會整理一九九八年二十餘次的民調指出，有將近八成人民希望臺灣維持現狀，如果再加上支持立即獨立的人，約有九成人民反對臺灣在可見的未來與中國統一。

辜振甫會見汪道涵及陳雲林時，一再強調，臺灣願意將所累積的民主化及經濟轉型發展的經驗與大陸分享；在會見江澤民時強調，「從長期來看，只有民主化才能維持社會穩定、經濟體制健康……只有中國大陸達成民主，臺海兩岸才可能統一」²¹⁶。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決策高層方面認知到和大陸官方打交道是無可避免的，討論政治性議題也是大勢所趨，朝野必須對此一議題加以深入研究，同時更應思索和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接觸之道，只是在口頭上支持大陸民主，是策略性的運用而已，用以迴避被中共統一的手段，是缺乏真心誠意的溝通與交流²¹⁷。

另外對於辜振甫在上海提出的「波茨坦宣言」的合宜性，立法院第三屆第六會期內政及邊政、外交及僑政、經濟、交通四委員會第一次會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京育率同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副董事長許惠祐列席〔「辜汪會晤」及兩岸問題〕報告，並備質詢時，立法院多位委員質疑辜振甫企圖引據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等歷史法律文件來強化「兩岸分裂分治」的論點，一方面無助於改變中共態度，且對臺灣不利；²¹⁸更何況臺海兩岸分裂分治，是歷史的產物，目前兩岸存在的歧異，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²¹⁹辜振甫表示，在上海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晤時提到《波茨坦宣言》，強調兩岸分治的事實，不只是講給中共聽的，另一目的是講給日本人聽的，「封日本的嘴」。辜振甫在 1998 年 11 月江澤民訪日，將會要求日本重申「新三不政策」，辜希望提醒日本，不要介入臺灣主權地位歸屬之爭，不要承認中共對臺灣地位的主張，不要作出對

²¹⁶ 童振源，〈從辜汪會晤看兩岸協商的策略〉，《太平時報》，民國 87 年 11 月 12 日。

²¹⁷ 吳玉山，〈臺灣守住了陣線，大陸堅定了打壓〉，《聯合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版 13。

²¹⁸ 《立法院公報》，087 卷 044 期，民國 87 年 10 月，頁 387-442。

²¹⁹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6 日，版 3。

臺灣不利的舉動。²²⁰民進黨立法委員林濁水表示雖然此次「辜汪會晤」民進黨沒有真正參與決策系統和參訪團表達不滿，但兩岸兩會所達成的「四項共識」，不離民進黨都曾提及建議；而建國黨及新國家連線律師蔡明華亦表示，共識實質內涵雖然「高來高去，不痛不癢」，但從現階段與中共交往的侷限性以及中共在政治上的「強迫性格」看，四點共識能壓低政治性，表現已屬得體。²²¹由以上觀之，臺灣朝野對此次「辜汪會晤」海基會參訪團的表現和實質決策的制定，多抱肯定的態度。對於臺北來說，臺灣內部對未來的方向整合必須持續；另一方面是認真省思，包括「一個中國」界定為「一個歷史、地理、民族與文化上的中國，一個政治上處於分治狀態的中國」²²²、「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等原則何以從「國家政策」變成「政治禁忌」，政策的重新定位與思考，或許能夠再找尋一個重新出發的有力起點。²²³

第二節 「辜汪會晤」與「辜汪會談」之比較

1993年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和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完成歷史性的會談，並且達成四項具體協議。兩岸執政當局都給予高度的肯定，認為這是兩岸關係史上的協商的起點，代表兩岸的互動，進入制度化的軌道。新加坡的「辜汪會談」順利召開的理由，可歸納為：

第一，會前雙方接觸頻繁，有非常周密的事前規劃與作業。

第二，雙方都能本「求同存異」的精神採取務實的立場，以解決眼前的問題為優先考慮。

第三，辜振甫和汪道涵兩位先生，都屬國之大老，在兩岸都受到相當的尊崇。作為兩岸兩會的領導人，辜汪二老均能知所進退，堅守本身立場，而又不失妥協的精神。更難能可貴的是，這兩位可敬的對手，在中國文化的熏陶下，都是知書達禮，都能在笑談中過招。當然，他們與各自層峰的關係，獲得充分的授權與信任，也是他們能揮灑自如的重要原因。

第四，擔任地主國，新加坡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新加坡領導階層，都和兩岸執政當局維持良好的關係，新加坡雖為種族多元社會，但當地仍以

²²⁰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27 日，版 2。

²²¹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17 日，版 2。

²²² 《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大陸政策與民意〉，民國 83 年 7 月 4 日，陸委會網站。

²²³ 《聯合報》，〈春去秋來：解讀兩岸亮出的底牌（社論）〉，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版 2。

華人居多，深諳中國文化的禮俗習尚。這一特色，在安排兩岸對話時，發揮了居間潤滑的作用，能照顧到兩岸談判者的尊嚴與對等地位。²²⁴

而 1998 年的「辜汪會晤」是兩岸關係重建階段的重要指標，也有同樣有「四項共識」，其重大意義及影響，亦可分為五方面綜論：²²⁵

第一、「辜汪會晤」係兩岸兩會協商中斷三年後的融冰之旅，重新啓動臺海兩岸的溝通，並進行建設性對話，已達到預期的效果，並營造兩岸和緩氣氛。所達成的四項共識，如能進一步落實，對兩岸關係發展具有正面意義。

第二、「辜汪會晤」使兩岸相關人士面對面完整表達各自立場與主張，除確實瞭解彼此之間的歧見外，亦同意今後持續對話。

第三、「辜汪會晤」中臺灣代表團不斷主動強調對等、民主，促請大陸正視兩岸政治現實，並堅持大陸應面對臺灣存在之立場。

第四、在「辜汪會晤」訪問期間，臺灣方面提出之合作話題，如農業合作、共同解決東南亞金融問題、參與「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交換民主化經驗等，顯現台北的善意。

第五、「辜汪會晤」期間，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並派員採訪。主要國家官員及學者，對臺灣主動促成「辜汪會晤」，皆表肯定，也對兩岸下一步如何進行互動，表示關切。一般認為，兩岸兩會如能持續維持對話，將有助於維繫兩岸局勢的穩定。

此次的會晤，象徵兩會互動的恢復，也是兩岸關係重新啓動的起點，雙方關係可望進入嶄新的境界。雙方相關人士的對話涉及高度政治層面問題，也凸顯了兩岸間分歧之大，雙方需以高度耐心，繼續進行建設性對話，才可能逐步化解歧見，增進共識，建立互信，進而維繫臺海長期的和平與穩定。

另外一個現象也是值得注意的，此次海基會參訪團赴大陸訪問，突破了兩岸間長久以來的一項禁忌，那就是代表團在公開與私下場合不再迴避「中華民國」的國號。在言辭對話中，代表團成員不避諱地提到中華民國，在國際媒體前也直接地用到中華民國這個稱號。事實上，這就是強調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現實必須受到尊重。參訪團成員之一的包宗和表示，「辜先生在旅途中即曾對代表團成員表示，兩岸對話，身份定位還是要弄清楚的。中共如果不承認我們的身份，那他們是和誰在對話呢」。這也顯示，此次「辜汪會晤」應更讓國際及大陸認知，北京當局既然希望兩岸從事是政治對話，則臺北不可能以一種模糊不清的身份和對方對談。²²⁶

²²⁴ 趙春山，〈兩岸復談新思維創造新條件〉，《聯合報》，民國 91 年 4 月 29 日。

²²⁵ 《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頁 90。

²²⁶ 包宗和，〈辜汪會晤與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問題〉，《理論與政策》，卷 13，1 期，（台北，1999 年 3

1998 年的辜汪會晤比較 1993 年的辜汪會談，就實質上沒有太大的進步成績，但在政治對話上，是比較符合雙方的心態的。就如何打開雙方僵局上，辜汪會晤模式比較值得未來作參考的，關鍵就在雙方都同意這些均為「政治談判」，而勿需再用「事務性協商」名詞來掩飾雙方政治性的接觸。綜觀兩次辜汪兩老相見，皆關係到兩岸是否可在和平互動的基礎上，逐漸溝通與往來，以真正幫助兩岸人民相互的認知與了解。事實上，兩岸關係起起伏伏，要維持和諧穩定，仍有賴不斷之溝通與協商，而「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皆為這些歷史過程，貢獻心力，並寫下了註腳。

第三節 「辜汪會晤」後中共對臺策略

中共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有一定的急迫感，因此在此次的「辜汪會晤」著重把問題放在為實現「統一」之前的政治對話議題上。中共原本有意利用此次辜振甫訪大陸及辜汪對話，為兩岸政治性對話作準備；中共預期能利用此次辜汪高層對話促成兩岸展開政治對話，接續為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鋪路，最後再達成政治談判的目的。所以在中共官方發表的看法都表達認定是兩岸重啟談判的開始，而且已經進行政治對話，即使是在徒有形式而無實質內涵，且分歧沒有解決的狀況下。

一、中共對「辜汪會晤」的總結報告

對中共來說，一條鞭法的政策宣傳是其一貫手段，因此在辜汪會後中共首先就此次會晤內容傳達內部看法與精神，以統一口徑建立共識。在中共完成「辜汪會晤」的總結報告中，中共中央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傳達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談話內容，主要有以下四點：第一，大陸實施適合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兩岸統一不是制度問題，而是統一與臺獨之爭；因此與臺灣所稱的民主後統一中國不相適用；第二，中共將以「和平統一」解決臺灣問題，但仍舊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是必須堅持的；第三，兩岸統一後，臺灣實施的是「一國兩制」。大陸不派軍隊到臺灣，但臺灣可派人到北京中央任職。不過國家主席當然不能給臺灣人做；第四，兩岸領導人會面是中國內部的事，不需在國際場合見面。²²⁷總結報告中表示，「辜汪會晤」是恢復兩岸兩會的接觸，達成對話共識，這是好的結果，但對於辜振甫轉達臺灣當局三點堅持：第一、大陸先民主化，兩岸才談統一問題；第二、兩岸政治談判基礎在一個分治的中國；第

月)，頁 1。

²²⁷ 《聯合報》，民國 87 年 11 月 8 日，版 1。

三、臺灣要求國際空間等，避而不談，僅強調江澤民的有關講話，包括大陸現在已開始實施符合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並開始地方基層選舉。報告另外強調兩岸問題也不能與南北韓問題相提並論，兩岸是內政問題，是國共戰爭留下的歷史問題，不是「分治的中國」。報告總結仍是中共一貫的主張：解決臺灣問題，就是實行「一國兩制」²²⁸。

二、中共的宣傳策略

大陸記者是公務人員，他們配合一向配合中共國家政策，「統一口徑」不遺餘力，對於大陸內部而言，媒體報導亦屬兩岸關係中的一環，是對臺策略的一部分，也所以早已定調：全國媒體不可熱炒，地方媒體不可冷場，因為辜汪會晤主要是做給國際看的，²²⁹對於這次「辜汪會晤」的態度是只作片面報導，對臺灣的訴求幾乎不予報導，甚或在臺灣參訪團召開記者會時，代替中共官方繼續追問有關「三通」等問題。當辜振甫結束北京訪問後，中共立刻發動宣傳攻勢、報章、電視一再向國際強調江澤民、錢其琛談話要求兩岸進行政治談判，在國際上一方面彰顯北京是和平對話者角色，另一方面繼續批評臺灣的推拖避談，將「麻煩製造者」的罪名繼續推給臺灣，也可以因應國際如美國等主要大國要求兩岸和平與對話的壓力。中共宣傳向是內外有別，訴諸外界的是兩岸情勢已和緩，且進入談判時代；對內則說兩岸沒有什麼妥協的空間，兩岸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中國人有能力依靠自己的聰明和智慧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只有兩岸中國人自己坐下來通過直接對話和協商解決，借助外力無濟於事。²³⁰

三、中共仍以「一個中國」原則為未來對臺政治談判基調

在這次辜汪會晤時，儘管中共讓臺灣明確表達了「一個分治的中國」立場，但在辜振甫離開北京後，10月22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即在北京記者會上仍表現出中共對臺政策的僵硬，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任何製造臺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當堅決反對，主張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等是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應該堅決反對。過去兩岸波折重重，兩會事務性商談無功而返，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因素。²³¹中共仍然希望臺灣在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不可分割的大前提

²²⁸ 〈辜汪會晤後中共對臺策略之解讀〉，《中共研究》，32卷12期，台北：1998年12月，頁1-3。

²²⁹ 〈新聞媒體看「辜汪會晤」座談會〉，《復興之音》，（臺北，民國88年5月），頁50-51。

²³⁰ 《海峽之聲播電台》，1998年11月6日播。

²³¹ 《新華社》，1998年10月22日電。

下，討論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等一類政治問題；臺灣方面如果有意願，也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討論臺灣方面的對外活動、統一後臺灣政治地位等關心的問題。²³²

第四節 「辜汪會晤」後的兩岸外交情勢

辜振甫在出席立法院內政、外交、經濟及交通四個委員會的聯席會議時透露，早在海基會組團赴大陸訪問前，臺灣即獲知東加王國與我國的邦交可能生變的訊息。在這種情況之下海基會仍毅然前往大陸訪問，主要是讓大陸「師出無名」。中共不遺餘力打擊我「務實外交」，並聲稱外交與兩岸關係兩者之間是沒有平衡點。自1997年11月31日與南非建交、1998年1月29日與中非建交，緊接著剛果宣布與臺斷交，可看出端倪。是以當辜振甫在北京與錢其琛會面時質問錢氏，中共何以在國際間對我進行外交打壓一事時，錢氏強硬表示，此係國際潮流趨勢，且會繼續發展。果然，「辜汪會晤」後，南太平洋島國東加即承認中共。²³³對於臺灣所提參加「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建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重申中共副總理錢其琛表示臺灣國際生存空間還會減少的同時，還進一步指出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不是主權國家，沒有資格參加「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²³⁴，事實證明，中共對臺灣的外交空間打壓一直是持續進行的。

一、兩岸的外交競爭

中共在推進對臺政策與對外政策的重大政策執行時，經常連線操作，相互配合，雙管齊下；中共對臺外交版圖的全面封殺，或對臺參與國際組織的全面圍堵，並沒有因兩岸談判的緩和局面，而稍容鬆懈。例如，1979年元旦，中共與美國建立正式邦交，完成兩國關係正常化，中共同日即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展開新時期對臺統戰；1992年8月間，中共正式提出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的建議，當我國作出明確善意的回應之際，中共卻宣佈與南韓建立邦交；1998年4月間，當海基海協副秘書長李亞飛確認「今秋促成辜汪會晤」共識，詹志宏才剛剛離開北京之際，中共即宣佈與幾內亞比索建交。1998年10月間，當辜振甫準備啓程赴大陸訪問之際，中共正與東加王國展開建交談判，辜汪會晤剛落幕，中共即宣佈與東加建交。

從中共的外交操作策略來看，對臺談判與外交鬥爭，雖是兩條不同層面的「戰線」，但同時進行，而且是挖我外交牆腳。在這種外交氛圍下，推動兩岸政治談判

²³² 《新華社》，1998年11月6日電。

²³³ 《人民日報》，1998年11月3日，版1。

²³⁴ 《中央日報》，民國87年11月17日，版2。

更形遙遠。積極發展大國外交是現階段中共外交工作重點對大陸來說，美國態度尤其在兩岸關係發展中其有決定性因素，而臺灣問題也是與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及最大的障礙。²³⁵目前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集中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這也是臺海兩岸邦交共防戰的重鎮，而非洲則是臺海兩岸邦交關係更替最頻仍的地區。

二、全球化下兩岸加入世界貿組織的機遇和挑戰

九〇年代中共在鄧小平「韜光養晦，沈著應變」指示下發展大國關係，夥伴關係及睦鄰友好關係改善了中共的安全，使中共能有一個自 1949 年以來最和平安定的發展環境，也因此促進了中共經濟的迅速增長，基本上，此也增強了中共與國際交往的信心。而西方國家和東亞國家也不容易改變包括中共軍事力量必隨著其經濟迅速成長而增強的中共軍事威脅，以及中共經濟成長過速而可能導致國際經濟危機的中國經濟威脅論。²³⁶在國際相互依賴深化環境下，中共在這些方面反而可能面對更大的滲透與壓力。

十六大後多邊外交在中共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就明確指出「我們將繼續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及區域組織中發揮作用」²³⁷。中共認為多邊外交更能使中共有效實踐相互依賴深化環境下的利益。許多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更依賴多邊外交的協定和結果，美國和西方世界也更重視多邊合作和多邊外交，這種趨勢使得中共必須更積極參與多邊外交，以利爭取國際利益。美國九一一事件後，中共認知也必須依賴多邊外交來達成反恐、防核武及大規模武器擴散，以及亞太經濟合作。中共一直是十分重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中共希望依賴 WTO 下的多邊運作和談判來確保其經濟利益，或是解決紛爭。江澤民在「十六大」的報告中強調「我們主張順應世界潮流，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²³⁸。臺北時間 2001 年 11 月 13 日凌晨，由時任經濟部長林信義代表臺灣正式簽定議定書，中華民國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名義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採認，2002 年 1 月 1 日零時，臺灣繼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國正式加入 WTO 後加入。在世貿入會問題上，儘管臺灣入會進度遠超前大陸，但由於中共不願見到臺灣先入會，導致臺灣正式入會期程延宕。但兩岸現今皆同屬於 WTO 成員。

²³⁵ 《中共「海峽之聲播電台」》，1998 年 11 月 8 日播。

²³⁶ 孟祥青，〈論中國的國際角色轉換與對外安全的基本定位〉，《世界政治與經濟》，（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2002 年第七期，頁 12-13。

²³⁷ 江澤民，〈全球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月報》，（北京），2002 年第十二期，頁 24。

²³⁸ 同上註，頁 23。

江澤民執政十年，雖然在經濟發展和外交上政績顯著，但在臺灣問題上仍未有突破；兩岸在經濟層面的相互依賴日益深化，但在政治層面上卻日益疏遠。兩岸加入 WTO 後，臺灣海峽兩岸經濟政策將面臨重大調整，首當其衝就是兩岸的「三通」問題。²³⁹從 WTO 運行機制而言，兩岸雙方經貿合作以及貿易關係的諸多問題，以同為 WTO 成員身份在 WTO 規範與制度範圍內協商和對話勢在必行。WTO 揭櫫的政府中立、司法獨立等基本精神將隨之長驅直入，使得台商及外商在中國大陸享有更安全及透明的投資環境。

儘管這種機制理論上是純粹的經濟議題，但就目前兩岸關係的歷史與現狀而言就是敏感的政治問題。²⁴⁰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在訪問美國智庫之一的「傳統基金會」表示，WTO 可以作為兩岸展開對相關經貿議題討論的場所，尤其重要的是，也可作為過渡到 WTO 以外管道討論更廣泛的議題，惟此一可能性尚需視中共領導人的意願而定。蔡認為，加入 WTO 使兩岸互動，能以更具結構及制度化方式進行，此有助於穩定雙方關係，使兩岸可致力於各自內部的改革。²⁴¹素有經貿聯合國之稱的 WTO，成員涵蓋全球大多數之國家，這樣的場合將可能為兩岸關係製造出新的互動型態或者提供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新方向。中共認為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建制可以影響其規則制定和爭取主導權，但基本上大部分國際組織和建制原本就是由強勢的西方國家所制定和主導，中共是後來參與者，加上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共綜合國力仍無法趕上西方國家，這就使得中共在既存國際組織和建制中的規則主導權爭奪方面將持續居於劣勢，也將使得中共國際行為，以及在國際建制中的行動上持續受到強勢國家的制約和壓力。²⁴²中共雖然可以利用國際一再強調「一個中國」政策；國際社會同樣也在利用中共參與國際組織的情況下，干預兩岸事務，防止中共以武力處理臺灣問題。

²³⁹ 《聯合報》，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版 1。

²⁴⁰ 《中國時報》，民國 89 年 6 月 26 日，版 5。

²⁴¹ 《中國時報》，民國 90 年 12 月 14 日，版 3。

²⁴² 劉兵勇、趙景文，〈相互依存條件下的經濟開放與國家保護〉，《青海師專學報》，2002 年第 3 期，頁 45。

第六章 結論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破壞世貿大樓及五角大廈事件，這是美國建國二百年以來本土首次遭到突發攻擊，如何因應美國本土安全，成爲布希政府安全戰略的主軸。²⁴³美國爲了打擊恐怖主義勢力，必須仰賴反恐怖的盟友，因而使得中共的地位亦從原本的潛在威脅來源，成爲美國極欲拉攏的合作夥伴，使得未來美國對臺政策亦產生微妙影響；而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局勢已走向「全球化」(globalization)，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上皆會有四種影響：第一，高度競爭的經濟(hyper-competition economy)；第二，導致社會上的不平等；第三，助長非國家行爲者(non-state actors)的興起；第四，侵蝕國家的主權。這四種主要的影響並進一步對國家的主權、權力正統、領土與功能，構成限制與挑戰²⁴⁴。

臺灣與大陸一樣，亦多由經濟全球化的角度理解全球化，並提出包括兩岸關係、國家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政府效率、金融實力、基礎建設、企業管理、科技實力、人力與生活素質、社會安寧等作爲提升臺灣全球競爭力的要素。²⁴⁵現今全球化已是一個不因主觀因素而轉變的客觀事實，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兩岸關係處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中，全球化的腳步不會因爲雙方任何一方的選擇而有所停滯，任何國家的行動與決定都已經不可能對國際沒有影響，相反的也不可能不受國際條件的制約。²⁴⁶因此國際局勢的變化，對臺海兩岸關係有絕對的影響力。北京對臺政策的主流就是「防獨促統」，而臺北的政策思維就是「實獨虛統」。²⁴⁷這種情勢其實也正好顯示出兩岸關係的複雜特性。擔心兩岸政治會談，會被解讀成兩岸問題內政化；商談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也恐影響對外軍事採購。然而，如不進行政治會談，如何面對國際壓力，如不商談結束敵對狀態，又豈不是要繼續進行軍備競賽。同樣的，持續這種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的局勢，則外交休兵也將淪爲空談。²⁴⁸

²⁴³ “New Blueprint for Military Shifts Priority to U.S. Soil, Revising 2-war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Oct.2,2001;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Sep.30,2001.

²⁴⁴ 江啓臣，〈全球化與國家在政治經濟上之角色：舊劇本與新爭論〉，全球治理與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主辦，2001年6月2日。

²⁴⁵ Michael Porter, 國家競爭優勢，李明軒、邱如美譯（台北：天下，1996年），頁1-5。

²⁴⁶ 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152。

²⁴⁷ 王銘義，〈「辜汪會晤後兩岸關係發展」研討會〉，遠景交流基金會，台北，民國87年10月29日。<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activity/mt871029.htm>。

²⁴⁸ 〈「辜汪會晤」後的兩岸關係〉，《交流》，（台北，民國87年12月），頁13-21。

一、兩岸皆需重新思考「一個中國」原則

臺灣的大陸政策對「一個中國」立場，隨著時間不同，一直在變化。由「只有一個中國」轉為「一個兩府（1990年）」、「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1991年2月）」、「過渡性的兩個中國（1993年11月）」、「兩個國際對等法律實體並存（1994年）」、不提「一個中國」的「兩個對等政治實體（1994年之後）」、「兩國」論（1999年7月），以及「一邊一國（2002年8月）」。²⁴⁹臺灣自2000年的總統大選後，歷經所謂的「政權和平轉移」，長期主政的中國國民黨，由於選舉而將執政權轉交民主進步黨執政。出任中華民國首次反對黨的總統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表示，「中共不動武，不宣佈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進行統獨公投及不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²⁴⁹民進黨執政後仍不斷呼籲兩會恢復談判，其中目的之一是希望在2004年選舉時，能贏得臺灣中間派選票，民進黨期待利用兩岸兩會間的任何公開接觸，以期對2004年選情有所助益。²⁵⁰

國民黨失去執政權的事實對中國大陸所產生的影響，不亞於十年前蘇共下台給中國造成的衝擊，中共對臺的原先「黨對黨」的策略運用，也必須作大幅度調整。作為中國人的社會，臺灣實行了現代選舉制度，對中國大陸社會的示範效應不能低估，臺灣已為中國大陸實質地提供了參考經驗。臺灣成功地實踐選舉制度，東亞其他國家或經濟體也實行了類似的制度，這說明政黨輪換的選舉制度在東亞是可行的。大陸不能否認臺灣民主選擇所造成的事實，同時大陸不得不要重新認識臺灣。2000年臺灣選舉中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執政黨不能固步自封，忽視民眾要求改革的呼聲。

就北京方面言：中共反對臺獨，但必須思考「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否等同於「臺獨」？如果中共像對待「臺獨」一樣地對待「中華民國」，則就臺灣人民的政治選擇而言，建立臺灣共和國與維持中華民國有何不同？又何必維持中華民國？許多人都認為，數十年來，「中華民國」維繫了臺海兩岸的主要「默契」；因為，中華民國的憲法是主張「一個中國」的。在這樣的默契下，中國雖未能統一，但臺灣亦未宣告獨立。然而，中共明知「中華民國」是維繫兩岸關係的重要憑藉，卻未能妥善對待「中華民國」，亦即未能對於維繫兩岸的此一重要憑藉知所尊重。如今，中共顯然發覺情勢已告急遽變化，甚至「中華民國」亦有名存實亡之虞；乃有「防獨先於促統」的警覺，遂開始重新考慮對於「中華民國」的政策。汪道涵曾經提及的「現行進行式的一個中國」概念（「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

²⁴⁹ 陳水扁，〈臺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就職演說，民國89年5月20日。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docset/showspeak.php4>。

²⁵⁰ 喬盛，〈臺灣選舉與未來中國〉，《聯合早報》，2000年4月7日。
http://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vote2000/20000407.htm。

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未來統一的中國」)²⁵¹，應是認為，臺灣倘能回歸到「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必可有裨於兩岸情勢。然則，倘若臺灣方面真正回歸到「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中共方面亦必須有正面的回應，不可再將「中華民國」與「臺獨」一般看待，亦不可再將中華民國與香港一般看待。²⁵²外交競爭使臺海兩岸關係的脆弱本質凸顯無疑，雖然臺灣方面期望臺海兩岸能夠外交休兵，但是這種想法已被錢其琛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會見辜振甫的談話所粉碎，錢其琛表示臺灣之外交孤立是歷史的趨勢，而且強調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下去，中共還以實際行動支持此一說法，即在該年十一月初與東加建交，顯示中共沒有意願與臺灣在國際上外交休兵。在目前臺海兩岸關係停滯情況下，中共拒絕與臺灣恢復對話，拒絕與臺灣新政府打交道，對臺灣的外交打擊當然不會鬆手，因此臺灣必須警惕未來來自中共的外交攻勢。²⁵³

不可諱言，臺獨主張是兩岸關係不穩定因子，臺灣民眾是否有勇氣如東帝汶國家歷經三十年的血腥抗爭誓死獨立，也更是民眾需深思的課題。但是就談判策略而言，臺獨亦是臺灣與大陸討價還價的有利籌碼。如可利用臺獨運動對抗北京的孤立政策，警示中共若以外交封鎖臺灣，臺獨運動將更加活躍；對內而言，臺獨運動刺激了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政治自由化與多元主義將使臺灣的談判籌碼倍增，所以臺獨運動增加了臺灣的談判籌碼，而非壓縮。但是臺灣利用臺獨牌時，亦須兼顧負面的成本。換言之，臺灣若採取急獨路線，並冀望美、日等強權的庇護，亦將喪失與該等國家在政經方面的談判籌碼，不但受制於該國，並成為其戰略考量下的一顆棋子。

二、加入 WTO 後的兩岸新興互動方式

兩岸目前仍停滯在相互溝通、了解、增加互信的階段，未來兩岸是否統一及如何整合、用何種方式統一，都有待兩岸繼續協商討論。大陸提及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區」、「一國兩法」、「一國四席」（指在 WTO 組織下），臺灣方面希望以對等政治實體地位商談兩岸的未來的立場，雙方都互不認同，也都需待兩岸能有更多互信基礎時，再來檢視與規畫兩岸可能的共同發展。但是兩岸似可以依 APEC 和 WTO 同為經濟體加入國際組織的模式，以經濟為優先合作的方式，創造兩岸合作互信基礎，再談及其他。未來臺灣的領導人應該更加學習中國領導階層經常說的「寄望於臺灣同胞」的寄望於大陸同胞，爭取大陸同胞的認同和好感，或許兩

²⁵¹ 《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10 月 30 日，版 3。

²⁵² 《聯合報》，〈上海新思維？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兩岸關的戰略思維〉，民國 87 年 5 月 10 日，版 2。

²⁵³ 林文程，〈外交競爭與臺海兩岸關係〉，《和平論壇》。
<http://www.dsis.org.tw/peaceforum/symposium/2001-05/APE0105003.htm>.

岸會和平地邁向分治且共存共榮，讓華人在世界舞台中佔更多更重要的地位。

臺海兩岸目前交流面臨的問題：政治議題長期干擾民間的交流；北京政府對中華民國的敵視心態，阻絕了交流品質的提升；中華民國政府的防衛態度，導致採步調較緩的循序漸進政策取向；兩岸政府的經費使用項目事實上未注入更多看經費來經營兩岸互動的缺憾；資訊流通的各種障礙依舊存在；利用兩岸關係營私利者仍多。而「辜汪會晤」的歷史定位，應是使兩岸已從過去的拒絕政治談判轉為「不限議題」的對話協商。走出這一步，已向國際社會證明，臺灣不是兩岸關係的「麻煩製造者」。而臺灣政治民主進步，可使國際社會可以督促中共師法仿效。但中共為鞏固執政力量，主導兩岸互動情勢，對臺攻勢作為也絕不會改變。中共下一階段所要面對的將是「新臺灣人」追求和平、族群融合與維持兩岸現狀發展的新局勢，中共領導階層如未能認真思考，兩岸政治將曠日持久，難有交集。²⁵⁴綜觀兩岸現狀，只要兩岸領導階層，不要誤判對方情勢，臺灣繼續能推動民主觀念及於大陸，掌握國際局勢脈動，從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來看，兩岸交流時間愈久，互動關係愈密切，臺灣愈具有相對的優勢，也但願中共能揚棄以大欺小霸權心態，繼續以交流、對話的和平方式，共謀兩岸關係良性的發展。

「辜汪會晤」後，原依計劃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在 1999 年秋天訪問臺灣，以符合兩岸兩會的互訪。但因李登輝總統在 1999 年七月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俗稱「兩國論」）²⁵⁵而又告中斷；2000 年的臺灣總統大選，臺灣政局的重大改變，更使得大陸不敢輕易重啟協商。加上兩岸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不斷角力，海基、海協兩會的領導人以兩會領導人相見之日，變得模糊而不確定。辜、汪兩位老人家皆近九十高齡，為了兩岸和平，仍不遺餘力地努力喊話與奔走。兩老的第一次見面，促成了兩岸的事務性協商機制啟動；第二次見面開啓了兩岸政治議題的對話，兩岸似乎越加地相互認知彼此的差異，無論兩岸未來用何種政治哲學及方式統一或是否統一，兩位耆老的努力都值得兩岸人民尊敬和記憶。

²⁵⁴ 張佑之譯，〈辜汪會談十年兩岸歧見待解〉《新加坡海峽時報評論》，2003 年 4 月 27 日。

²⁵⁵ 〈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全文〉，<http://www.future-china.org/fcn-tw/199907/1999071101.htm>

附錄

附錄一 海基會與大陸方面歷次會談一覽表

編號	會談名稱	時間	地點	主 題	主談人	成 果	備 註
一	兩岸共同防制海上犯罪程序性問題會談	80 年 11 月 4 日至 7 日	北京	商談兩岸共同防制海上犯罪程序性問題相關事宜	陳長文 唐樹備	就共同合作之項目、實質商談時地等廣泛交換意見，並無具體成果。	海協會未成立，唐樹備為「國台辦」副主任
二	兩岸「文書驗證」及「掛號函件」第一次會談	81 年 3 月 22 日至 27 日	北京	商談兩岸「文書驗證」及「掛號函件」事宜	許惠祐 李亞飛	首度交換意見，無具體成果。	
三	兩岸「文書驗證」及「掛號函件」第二次會談	81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香港	商談兩岸「文書驗證」及「掛號函件」事宜	許惠祐 周寧	因雙方對「一個中國」認知不同，且大陸要求將其觀點載入協議，故無結果。	
四	兩岸「文書驗證」及「掛號函件」第三次會談	82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	北京	商談兩岸「文書驗證」及「掛號函件」事宜	許惠祐 李亞飛	由於大陸不再堅持將其對「一個中國」之觀點載入協議，雙方就此二項議題達成共識。	

五	邱唐會談 (辜汪會談第一階段預備性磋商)	82年 4月 7日 至 11 日	北京	1. 草簽「文書驗證」及「掛號函件」二項協議 2. 安排辜汪會談相關事宜	邱進益 唐樹備	1. 草簽二項協議。 2. 就辜汪會談預備磋商達成數項共識。	
六	辜汪會談第二次階段預備性磋商	82年 4月 23日 至 26 日	新加坡	安排辜汪會談相關事宜	邱進益 唐樹備	就「兩會建立制度化聯繫與會談方式」、「經濟交流」、「文教、科技交流」及辜汪會談共同文件交換意見。	
七	辜汪會談	82年 4月 27日 至 29 日	新加坡	商談並確定兩會即將簽署之四項協議	辜振甫 汪道涵	簽署「 <u>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u> 」、「 <u>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u> 」、「 <u>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u> 」及「 <u>辜汪會談共同協議</u> 」四項協議。	
八	辜汪會談後續第一次事務性協商	82年 8月 28日 至 9 日	北京	就「辜汪會談共同協議」所列之年度	許惠祐 孫亞夫	因大陸方面要求加入經濟議題且「只聽不談」致無成	

		月 3 日		優先議題 商談		果。	
九	辜汪會談 後續第二 次事務性 協商	82 年 11 月 2 日 至 7 日	廈門	商談「非 法 入 境」、「劫 機犯」、 「漁事糾 紛」及「兩 會人員入 出境往來 便 利 辦 法」	許惠祐 孫亞夫	就上述議題首 度實質協商	
十	辜汪會談 後續第三 次事務性 協商	82 年 12 月 18 日 至 22 日	台北	1. 商 談 「非法入 境」、「劫 機犯」、 「漁事糾 紛」及「兩 會人員入 出境往來 便 利 辦 法」 2. 就「共 同打擊犯 罪」、「司 法 協 助」、「智 慧 財 產 權」及「台 商保障」 等議題交 換意見	許惠祐 孫亞夫	由於大陸方面 迴避我方法律 管轄權，致無 結果。	

十一	第一次焦唐會談	83年 1月 31日 2月 5日	北京	就如何落實「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及後續事務性協商問題進行會談	焦仁和 唐樹備	1.發表「焦仁和先生與唐樹備先生會談共同新聞稿」。 2.確定「兩會商定會務人員入出境往來便辦法」。
十二	辜汪會談後續第四次事務性協商	83年 3月 24日 至 31日	北京	就「非法入境」、「劫機犯」及「漁事糾紛」等議題續行協商	許惠祐 孫亞夫	由於雙方對「焦仁和先生與唐樹備先生會談共同新聞稿」認知不一，致未達成協議。
十三	辜汪會談後續第五次事務性協商	83年 7月 30日 至 8月 3日	台北	商談「非法入境」、「劫機犯」、「漁事糾紛」等議題	許惠祐 孫亞夫	雙方充分交換意見
十四	第二次焦唐會談	83年 8月 4日 至 8月 7日	台北	就兩會會務及事務性協商等議題進行會談	焦仁和 唐樹備	發表「海基會與海協台北會談共同新聞稿」。
十五	辜汪會談後續第六次事務性	83年 11月 21日	南京	商談「非法入境」、「劫	許惠祐 孫亞夫	擴大寄送稅務、病歷、經歷及專業證明

	協商	至 28 日		機犯」、「漁事糾紛」、「擴大寄送公證書副本種類」及「快捷郵件」		等四項公證書副本。	
十六	辜汪會談後續第七次事務性協迴	84 年 1 月 23 日 至 25 日	北京	商談「非法入境」、「劫機犯」、「漁事糾紛」及「快捷郵件」等議題	許惠祐 孫亞夫	雙方充分交換意見	
十七	第三次焦唐會談	84 年 1 月 21 日 至 28 日	台北	就兩會會務、事務性協商議題及兩岸交流事項進行會談	焦仁和 唐樹備	雙方充分交換意見	
十八	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預備性磋商	84 年 5 月 27 日 至 29 日	台北	商談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之程序問題	焦仁和 唐樹備	發表「第二次辜汪會談第一次預備性磋商共識」。	
十九	第一次台港航運會談	86 年 5 月 2 日	香港	陸委會授權海基會與海協會委託之香港船東會	張良任 趙世光	雙方充分交換意見	

				協商七月一日以後之台港航運問題			
廿	第二次台港航運會談	86 年 5 月 24 日	台北	陸委會授權海基會與海協會委託之香港船東會協商七月一日以後之台港航運問題	張良任 趙世光	簽署「 <u>台港海運商談紀要</u> 」。	
廿一	辜汪會晤程序性安排	87 年 4 月 22 日	北京	陸委會授權海基會與海協會就如何推動兩會交流事進行商談	詹志宏 李亞飛	達成年內促成辜董事長赴大陸訪問之共識。	

資料來源：<http://www.sef.org.tw/www/html/discuss1.htm>。

附錄二 辜汪會、辜錢會與辜江會的共識與分歧

	共 識	分 歧	見
一 次 辜 汪 會	雙方都認為應該進行「對話」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一個分治的中國」是客觀現實(辜)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汪) 2. 當務之急是解決人民切身關心的事務性協商(辜) 在兩岸開始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後，兩會再重開事務性商談(汪) 	
第 二 次 辜 汪 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兩岸加強對話，以促成恢復制度化協商 2. 促進兩岸不同層級的互訪與交流 3. 兩岸交流衍生諸多問題，涉及兩岸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雙方同意針對個案相互積極協助處理 4. 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同意於適當時機訪問臺灣 		
辜 錢 會	<p>兩岸間的國際合作有很多模式，例如亞太經合會、亞洲開發銀行和奧運會，這些形式都可以討論</p> <p>兩岸應該多交流、多接觸</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一個分治的中國」是不容否認的客觀現實(辜)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的主權領土不容分割(錢) 2. 兩岸各自有國際空間，共同參與國際事務(辜) 臺灣國際空間被打壓是客觀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錢) 3. 臺灣是中國人在中國人土地上實現民主的地方，證明中國人也可以接受民主(辜) 以「臺灣式民主」統一的先決條件不切實際，統一是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問題，而不是制度之爭(錢) 	
辜 江 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建設性對話」的重要性及提高層級對話的必要性 2. 江澤民對「辜汪會晤」達成的四項共識予以肯定 3. 兩岸元首「李江」會有待營造條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辜振甫向江澤民介紹臺灣政治民主經驗，並表示願意與臺灣同胞共同分享民主化經驗，相互切磋(辜) 民主化不是全世界唯一的政治體系，各個地區情形不同，因此，也有不同的民主(江) 	

資料來源：王羿儒製表，聯合報，1998年10月20日，版3。

附錄三 辜董事長於「辜汪會晤」期間相關 談話

一、辜董事長在中正機場對記者談話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願意代表訪問團，向中正機場及有關方面所提供的方便與協助，表達由衷的謝意。同時，也對各位新聞界朋友的熱誠與敬業表示敬意。

第一次「辜汪會談」結束後，本人已有五年多未與汪道涵先生見面，兩岸的協商也中斷了三年有餘，此次率團前往大陸訪問，是爲了推動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會務往來，恢復制度化的協商，進而改善兩岸關係。回顧近年來，本會屢次呼籲大陸方面儘早重新啓開兩岸兩會的溝通管道，終於有了初步成果，十分難得。據了解，各方對於即將進行的「辜汪會晤」有所寄望。本人相信雙方只要能夠面對現實，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並回到制度化的溝通管道，針對雙方關心的任何問題交換意見，必然有助於追求兩岸和平、民主、共榮。

二、辜董事長抵達上海談話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時隔五十三年，今天能夠舊地重遊，感觸至再。回顧兩岸隔離四十多年之後，到了一九八七年才開始有了民間的接觸。五年前本人與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在新加坡舉行會談，簽訂了四項協議，爲兩會的會務往來與制度化協商奠了紮實的基礎。樂見上海市今天的榮景以及兩岸經貿現在的旺盛。

本人相信，兩岸兩會的正常化與制度化的往來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本人期盼這次與汪會長的會晤，有助於兩會會務的推展，進而有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上海是大陸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帶，與台商的商務交往十分頻繁，因而衍生的有關人民權益有待解決的問題，與日俱增，兩岸的有關方面，應該由急民之所急著手，致力於解決與民眾權益攸關的事項，爲兩岸關係的總體發展，踏出具建設性的一步。

這次到上海來訪問，本人與汪先生將有數度晤談的機會，至爲難得，相信在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的努力中，營造相互信任、與人爲善的基礎。本人希望兩岸

都能嘗試更寬廣的角度看問題，在建設性的對話中，找尋開展兩岸關係的正確作法。

謝謝各位的關心，也問候上海地區的朋友。

三、辜董事長會見汪道涵先生談話要點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這次本人能來大陸訪問，和汪會長見面，覺得格外高興。從去年十一月海基會發函建議由本人率團前來訪問以來，經過雙方人員不斷地磋商，得以成行，可說十分難得。今天見到汪會長，本人不禁想起五年前在新加坡會談的情景，當時氣氛良好，成果豐碩，簽訂了「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等四項協議，奠定了制度化協商管道，的確是兩岸關係發展歷程中突破性的一步。

本人此行到上海、北京兩地進行參訪，並和汪會長等有關人士見面，希望能透過坦誠溝通和自由交換意見，增進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誤會，為推動兩會會務營造良好的氣氛，更為中斷三年多的制度化協商管道帶來重新啟動的契機，進一步促成兩會領導人第二次會談的儘早召開。同時，希望經由建設性對話，就雙方所關心的重要問題交換意見，以建立兩岸之間的互信，尋求良性互動的共識，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與長期穩定創造有利的條件。

貴會近年來主張捨棄事務性協商而就政治談判進程序性磋商，本人認為事務性協商攸關人民的權益，不可偏廢。最近十年以來，隨著兩岸人員往來頻繁、貿易及投資快速增長，民間交流成為兩岸關係非常重要的部分，因而衍生的問題，例如：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的人身安全；臺商在大陸地區的投資保障以及有關稅務、關務等事宜；漁事糾紛處理；偷渡、犯遣返、共同打擊犯罪；兩岸司法互助等事項，以及貴我兩會會務往來所發生的問題，因貴會片面中斷制度化協商，以致迄今仍無法得到解決，也造成兩岸關係的倒退。貴我兩會既然是兩岸政府正式授權處理兩岸事務的民間團體，當務之急應是遵守新加坡協議，以示誠信，儘快恢復制度化協商，致力解決這些較不具政治爭議的人民切身關心的問題。進言之，在進行事務性協商中可以理出政治性障礙，在未來協商時逐一加以理性排除，這才是建立兩岸所欠缺的「互信」的正確途徑。

兩岸隔海對等分治、互不隸屬已近五十年，「一個分治的中國」，既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臺灣已經於一九九一年宣布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放棄以武力手段解決兩岸問題，並透過擴大交流和積極協商，為促進兩岸和平作出具體貢獻。遺憾的是，大陸方面不肯尊重現實也不肯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而且在國際上設法阻斷臺灣的活動空間。這種以假設中華民國(明顯為當前世界重要政經實體之一)在國際上已經不存在的作法，只有加激臺灣人民的反感，完全無助於兩岸關係的

改善，也是臺灣所無法認同的。重要的是，唯有彼此對等定位、相互尊重，才會使所謂政治性對話具備實質內涵。希望雙方在尊重分治的現實基礎上，展開建設性對話，逐步尋求全體中國人長遠的福祉、全中國未來的民主統一。

此外，我們已注意到，汪會長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定義有較具彈性的看法，這種說法在大陸內部也引起關注；同時，錢其琛先生近期也提出所謂「一個中國，內外有別」的見解，我們對於何者為實際運作的基準有所質疑，在此必須明確指出，一項政策用不同標準詮釋，並不符合現代化國家的做法；而更重要的是，兩岸既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就不宜區別對待。因此針對所謂「一個中國，內外有別」，希望能得到明確的訊息，以避免發生誤判。

本人在此強調，追求國家的民主化與現代化是當今世界不可抵擋的潮流，也是兩岸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的正確方向，大陸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便是國家統一進程的決定要素，企盼大陸方面充份了解臺灣半世紀來的民主化重大演變。我們樂意將所累積的民主化及經濟轉型發展的經驗與大陸分享，以開創互惠互信的雙贏局面，不僅成為東亞區域安全繁榮的穩定力量，並能符合國際社會的期望，而為世界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四、辜董事長香山碧雲寺孫中山先生衣冠塚弔祭後發表談話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今天，我來到北京香山碧雲寺，瞻仰了中華民國的締造者 國父孫中山先生衣冠塚，內心十分感慨。

兩岸的中國人都景仰孫先生，他不但是偉大的愛國者，也是中國民主化、現代化之父。孫先生為了救中國，倡導了三民主義，也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為中國的發展指引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廿世紀，中國人為了建設自己的國家，提出了各種主張，也實驗過不少方法，我們在臺灣經過實施三民主義近五十年，如今事實可以證明，孫先生主張的方略與精神不但已產生了具體的成果，未來應進一步發揚光大。

兩岸中國人現都在追求全面現代化，當務之急在於以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為基礎，完善民主制度，發展經濟，以達成民主、均富的目標。臺灣已進行總統直選，以維護私人所有權為基礎、推動經濟自由化，逐步落實藏富在民。我們願與大陸分享實踐中山先生思想的經驗，為兩岸良性互動，構築深厚的基礎。

五、辜董事長參加陳雲林先生邀宴致詞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

陳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非常感謝陳先生今天晚上的宴請。在兩岸中斷制度化協商三年多後，本人有機會，在陸委會的授權下，到大陸訪問，深深覺得這是兩岸重新互動的一個良好起點。因為藉著這次的訪問，可以與大陸方面有關人士，就兩岸關係的過去及未來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廣泛交換意見，充分溝通觀念，相信可以為增進兩岸良性互動，建立互信，奠定重要的基礎。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雖然因為制度化協商管道的中斷，使兩岸關係發展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但是「擴大交流」與「務實協商」，始終是臺灣推展兩岸關係的基本立場；即使在兩岸關係最低迷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從這個立場退縮。因為我們始終相信，只有和平寬容，才能化解對立；只有互動交流，才能增進了解；只有對話協商，才能建立共識。兩岸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辜汪會談」，不但為兩岸建立了制度化協商管道，也為兩岸樹立了理性溝通的模式，這是雙方應共同珍惜的成果與經驗。因此，我們希望兩岸能早日回到海基會與海協會已經建立的制度化協商管道，以既有的協議與共識為基礎，循序漸進地進行交流與協商，使未來兩岸關係能平順、正面的發展。

我們已經注意到大陸方面一再主張兩岸要進行所謂「政治談判」的訴求。對於這一點，蕭萬長院長在今年二月二十日向立法院所提的施政報告中，已經明確回應。蕭院長指出：“我們主張以第二次辜汪會談做為起點，只要有助於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及國家民主統一的議題，均可以一步步提出來展開溝通和對話。但是民眾更關心的是自身權益與福祉的保障，因此，蕭院長也強調：「尤其是針對影響人民權益至鉅，因交流衍生的問題，雙方早已同意納入協商議程，應該優先進行。」如此，才更符合民眾的期望。

李登輝先生對兩岸關係向來很關心，他也曾提到所謂「李六條」，他的方向非常明確。我們都知道，凡是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有助於兩岸民主統一，今後透過雙方的對話，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雙方共同發展的正確方向才對。

兩岸分治近五十年，彼此間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差距甚大，需要較長時間增進了解，拉近距離。因此，我們一向秉持誠懇、善意的態度，並以最大的耐心與實際行動，為營造兩岸和諧的互動環境而努力。我們期望大陸方面也能勇於面對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並以實際行動改善兩岸關係，以便為未來雙方關係的進一步開展，做出更為具體、合理的安排。

六、辜董事長會見錢其琛先生談話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八日)

謝謝錢先生撥冗和我們一行見面。明天我們就要啓程返臺。這一路行程，承

蒙 貴方的細心安排，使睽違五十年之久的我，能有舊地重遊並就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求教的機會，在此表達由衷的感謝之意。

昨天上午我們到北京大學和故宮博物院參觀訪問，心裡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兩岸既有血緣又有共同的文化，對於謀求全體中國人的福祉，應也有相同的期許與方向。

交流十年來，兩岸關係尤其民間的接觸已有明顯的進展，但是仍存在著若干困難與障礙。爲什麼？歸根究底，導因於大陸當局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甲午戰爭失利，清廷割臺，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臺灣於二次大戰後依據波茨坦宣言回歸，一九四九年兩岸隔海分治，任何一方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對方，「一個分治的中國」是不容否認的客觀現實。我們早於一九九一年即面對這個現實，對兩岸關係給予新的定位，並作出一系列的善意作爲，包括：宣布結束動員戡亂，不再以武力來處理兩岸問題；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也作了務實調整，以適應兩岸新情勢；並擴大交流和積極協商，爲促進兩岸和平做出具體貢獻。但是我們的這些努力，大陸方面並未正面回應，反而不接受兩岸「分治」的歷史事實，否定世界上重要成員之一中華民國的存在，不僅在國際間想盡方法對我打壓，而且到臺灣來訪問的人士也不尊重臺灣的既有體制，這些加激臺灣人民的反感，都成爲雙方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後冷戰時期，國際潮流是以交往促進瞭解，以協商化解歧見。大陸方面在擴大與外界接觸後，允宜以更開闊的胸襟與前瞻的視野來面對兩岸在國際上的互動。臺灣民眾這四十多年來胼手胝足，勵精圖治，已創造一個自由、民主、富裕的社會，在國際間也積極參與而貢獻我們的力量，這些成就自然會受到世人對我們的尊重和友誼。因此，我們堅定地認爲雙方在民主統一之前，該有各自的國際空間，彼此合作。如果大陸方面刻意而片面地假設中華民國不存在，非但事理甚明地無從進行政治性的對話，只會激起臺灣民眾的反感，而動搖雙方建立互信的基礎，不利兩岸關係的發展，實際上也阻隔了兩岸由分治狀態往前越走越近的道路。

我們認爲兩岸中國人在國際間有很多的合作機會，雙方可以互相扶持，學習合作，這並不會損害到國家未來的民主統一，反而可以擴大兩岸中國人在國際社會的力量。我們希望兩岸能爲世界和平而共同參與國際事務，並以結束零和對抗，作爲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第一步。

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兩岸應相互尊重，彼此諒解，透過交流、合作、協商，逐步改善關係，從而爲未來的民主統一，創造有利條件。

七、辜董事長會晤江澤民先生後「中外記者會」談話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十八日)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本人要對各位新聞界朋友連日來的辛勞與關懷，表示感謝與敬佩之意。

本人剛才與江澤民先生做了一次相當坦誠的意見交換。除了海協會的汪會長外，過去這幾天還分別會晤了錢其琛先生、陳雲林先生等人士，並且參訪了北京、上海不少地方。作為一個政府授權的團體，海基會非常感謝大陸海協會及相關單位所做的安排，以及這幾天來給我們的細心接待。對於此行與汪道涵先生會晤，得到加強對話，以促成制度化協商恢復的共識，汪先生也將在適當的時候訪問臺灣，本人感到欣慰，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兩岸隔海分治長達半個世紀，雙方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有不少歧見。我們這次踏上大陸的土地，是抱著善意而來。我們認為，兩岸人民現在所過的生活，比起各自的過去，要好的多。雙方應該珍惜這樣的成果。

更重要的，我們要開始設想如何開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所以本人這次特別向江先生介紹了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經驗及經濟發展成就。臺灣民主化經驗不是沒有缺點，但畢竟是華人社區的第一個民主化經驗。我們願意與大陸同胞共同分享，相互切磋。

我們認為，大陸經濟取得今天的成就並不容易;但在未來，如想進一步發展，恐怕必須勇敢地大步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因為長期來看，只有民主化才會維持社會的穩定與經濟體質的健康。至於中國再統一問題的關鍵，也是大陸民主化。只有大陸先民主化，才有可能談到兩岸再統一的問題，而且亞太地區的鄰國才不會恐懼中國的統一。

這次與江先生等領導人會晤，可惜限於時間，雙方未能達成充分的了解。由於兩岸相隔如此之久，彼此的來往的確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旅程。經由這一次「辜汪會晤」，大家都更加體認到「建設性對話」的重要性，也認為有提高層次，繼續對話的必要性，就此意義而言，雙方可以說已經踏出了極有意義的第一步。

謝謝大家。

附錄四 參考文獻及相關書目

一、中文

(一) 書籍

- 卞成章、陳鋒主編，中國的國際環境與世界若干國家的跨世紀發展戰略。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 年。
- 王俊彥，《大外交家周恩來上、下冊》。北京：經濟日報，1998 年。
-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年。
- 王家英、孫同文，《兩岸關係的矛盾與出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1996 年。
- 王家英、鄭赤琰編，第二次辜汪會晤後的兩岸關係，第一版。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 年 6 月。
-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 王銘義，《不確定的海峽：當中華民國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臺北：時報文化，1996 年。
- 王銘義，《兩岸和談：台灣與中共的對話》。臺北：財訊雜誌社，1997 年。
- 丘宏達、任孝琦，《中共談判策略研究》。臺北：聯合報出版社，1987 年。
- 包宗和，《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 1950—1989》。臺北：三民出版社，1993 年。
- 包宗和，《後冷戰時期國家發展的見證與評析》。臺北：翰蘆出版社，2000 年。
- 石之瑜，《兩岸關係概論》。臺北：揚智出版社，1998 年。
- 石之瑜、李念祖，《實踐兩岸關係》。臺北：正中出版社，1994 年。
- 尼克森 (Richard Nixon)，《新世界》，丁連財譯，臺北：時報文化，1992 年。
- 吳安家，《台海兩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永業出版社，1996 年。
- 吳新興，《海峽兩岸交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 宋鎮照，《台海兩岸與東南亞—三角政經關係之解析》。臺北：五南出版社，1999 年。
- 李健，《兩岸謀和足跡追蹤》。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 年。
- 李明、劉強，《周恩來的外交藝術》。臺北：新新聞文化公司，1993 年。
- 李欽勇，《社會政策分析》。臺北：巨流出版社，1994 年。
- 李潔明、唐思，《台海危機美中台關係揭密—台灣有沒有明天》。臺北：先覺出版社，1999 年。

- 汪徐和、任向群，《二十世紀十大談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 阮銘，《兩岸統一—百年大計》，臺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
- 阮銘，《透視江澤民-江澤民文選導讀》。臺北：財訊雜誌社，1998年。
-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1998年5月。
-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1984年9月。
- 明居正，《雙贏？雙輸？》。臺北：致良出版社，1996年。
- 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臺北：台灣學生出版社，1999年。
- 林文程，《中共談判的理論與實務—兼論台海兩岸談判》。高雄：麗文出版社，2000年。
-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臺北：五南出版社，1997年。
-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臺北：五南出版社，1998年。
- 芮正泉，《中華民國務實外交的回顧與展望》。載於行政院新聞局編《寧靜革命》，臺北：新聞局，1994年。
- 洪丁福，《國際政治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啓明出版社，1996年。
- 胡祖慶譯，Kenneth N. Waltz 著，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初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1月初版。
- 胡祖慶譯，Allen S. Whiting 原著，當代各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
- 唐國英，《中共「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載於楊逢泰等著《民族主義論文集》，臺北：黎明文化，1993年。
- 徐京利，《另起爐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 徐焰、李元平著，《台海大戰：海峽風暴，金門對決》。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2年。
- 祖治國，《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臺北：致良出版社，1998年。
- 馬起華，《兩岸關係研究》。臺北：中華會，1998年。
- 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臺北：生智文化，1998年。
- 張亞中，《德國問題：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臺北：揚智文化，1999年。
- 張亞中，《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臺北：揚智文化，1999年。
-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臺北：生智文化，2001年。
- 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臺北：聯經，2003年。

- 張亞中、李英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臺北：生智文化，2001年。
-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文化，2000年。
- 張玉良主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戰略謀劃》，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74。
- 張保民，《台灣的迷網-理想與現實》。臺北：台灣商務，1996年。
- 張建邦，《跨世紀國家安全戰略》。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 張蘊嶺主編，轉變中的中、美、日關係。北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
- 許家屯，《評家屯回憶錄》。香港：聯合報，1993年。
- 郭立民，《中共對台政策資料選輯（1949-1991）上冊》。臺北：永業書局，1992年。
-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臺北：天下，1998年4月，初版。
- 陳一諮，《中國前途與兩岸關係》。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 陳光中，〈臺灣結與中國結的再試析〉，載於趙少康、謝長廷等著《臺灣與中國前途》，臺北：聯經，1987。
- 康依倫，《第二軌道可以滴水穿石嗎？》，臺北：新新聞周報591期，1998年6月，頁37。
- 程建人，《媒體與兩岸談判》。臺北：臺北論壇基金會，1994年。
- 麥克波特（Michael Porter），《國家競爭優勢》，李明軒、邱如美譯，臺北：天下，1996年，頁1-5。
- 彭懷恩，《認識台灣-台灣政治變遷五十年》，臺北：風雲，1997年10月，初版。
- 楊逢泰，《西方民族主義的演進和精進》。載於楊逢泰等著《民族主義論文集》。臺北：黎明文化，1993年。
- 楊開煌，《縱論兩岸尋雙贏》。臺北：歷史智庫，1996年。
- 楊中美，《錢其琛：中共外交教父》，臺北：時報，1999年6月。
- 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臺北：永業書局，1994年。
-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臺北：月旦，1999年5月，初版。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劉必榮，《談判》。臺北：時報文化，1989年。
- 劉必榮，《談判Q&A》。臺北：商周出版社，1992年。
- 蔡國裕，《中共民族主義的策略性-中共對民族主義的解釋與運用》，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6年，初版。
- 蔡錦榮，《台灣的政治選擇》，臺北：大隆，1999年8月，初版。
- 蔡正文、林嘉誠，《臺海兩岸政治關係》，臺北：業強，1994年。

-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臺北：月旦，民國 88 年 5 月，初版。
-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民國 85 年，初版。
- 潘錫堂，《中共外交與兩岸關係》。臺北：五南出版社，1994 年。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戴照煜，《談判》。臺北：成長出版社，1993 年。
-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
- 謝復生等著，《公民投票(創制複決)制度比較研究》，臺北：行政院研考會，1997 年 1 月，初版。
- 謝慶奎等著，《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臺北：五南，1999 年 2 月，初版。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事務手冊》。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2 年。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參考資料》。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0 年。
- 行政院新聞局，《對中共所謂「不排除使用武力犯台」之研析》。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5 年。
- 耶魯兩岸學會，《邁向 21 世紀的兩岸關係》。臺北：時報文化，1995 年月。
- 國防部，《中華民國八十二～八十三年國防報告書》。臺北：黎明文化，1994 年。
- 民主進步黨，《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臺北：民進黨中國事務部，2001 年。
- 《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會編，臺北：海基會，2001 年 4 月。

(二) 期刊論文

- 丁永康，〈小國外交理論與紐西蘭外交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1995 年 12 月，第 34 卷第 12 期，頁 61-73。
- 丁志剛，〈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利益的辯證與維護〉，《國際政治》，1998 年 9 月，第 9 期，頁 26-29。
- 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44 卷 8 期，2001 年 8 月，頁 9。
- 尹慶耀，〈台海兩岸關係中的若干問題〉。《共黨問題研究》，1998 年 10 月，頁 7-19。
- 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996 年 7 月，第 1 期，頁 129-209。
- 王甫昌，〈臺灣民主政治與族群政治的衝突〉，載於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北：月旦，1997 年，初版，頁 133-156。
-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國家政策雙週刊》，1992 年 4 月，第 32 期，頁 3-4。
- 王友辰，〈中共對九十年代國際形勢評估之探討〉，《中共研究》，第三十三卷，第

- 四期(1999年4月),頁80。
- 王崑義,〈中共的國際戰略與台灣的外交選擇〉。《國家政策雙週刊》,1997年1月,頁31-32。
- 王順合,〈兩岸民間交流時期中共對台談判模式之結構分析〉,《海軍軍官學校學報》,1997年12月,第7期,頁243-265。
- 包宗和,「戰後國際政治體系之變遷」,美國月刊,第5卷,第9期(民國80年1月),頁8。
- 包宗和,〈影響柯林頓對華政策的正負因素〉,《美國月刊》,8卷1期(1993年1月),頁27-30。
- 石之瑜,〈從中共對美、英談論中共外交的原則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1994年10月,頁39-59。
- 江澤民,〈全球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月報》,(北京),2002年第12期,頁24。
- 江啓臣,〈全球化與國家在政治經濟上之角色:舊劇本與新爭論〉,全球治理與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主辦,2001年6月2日。
- 宋國誠,〈一九九三年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的評估〉,《中國大陸研究》,37卷2期(1994年2月),頁48。
- 宋國誠,〈我方對兩岸政治談判應有的立場〉。《政策月刊》,1998年3月,頁7-9。
- 宋學文,〈「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的模糊策略之理論面初探與其對中國安全之衝擊〉,〈北京大學編:中共十五大後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2月,頁1-16。
- 宋學文,〈利用民間的國際參與破除外交困境的迷思〉,《政策月刊》,1998年8月,頁24-25。
- 宋學文,〈為什麼兩岸必須先進行事務性議題的協商〉,《交流》,1998年10月,頁20-26。
- 宋鎮照,〈解析中共對台談判策略和台灣因應之道〉,《共黨問題研究》,1998年7月,頁4-15。
- 吳安家,〈未來中共可能的談判策略、組織及人員之模擬分析〉。《東亞季刊》,1991年10月,頁12-19。
- 吳新興,〈臺北務實外交對於兩岸關係的意思〉。《中國大陸研究》,1994年10月,頁25-38。
- 吳新興,〈務實外交的精神與可行方案探討〉。《政策月刊》,1997年8月,頁4-5。

- 吳玲君，「從美國「三不」分析臺北對華府的外交策略」，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1999 年），頁 3、8。
-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臺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臺北），第 74 期，1993 年，頁 33-61。
-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臺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國家政策雙週刊》，1992 年 4 月，第 32 期，頁 1-3。
- 李福鐘，〈民族主義與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的重新檢討〉，《中國大陸研究》，1996 年 6 月，頁 36-49。
- 李俊榮，〈中共對台策略演變的影響因素〉，《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 9 期（2000 年 9 月），頁 87。
- 李非，〈從濟板塊看兩岸經貿關係〉，《投資中國》，第 26 期，1996 年 4 月，頁 8。
- 李孟洲，〈經濟規律終將戰勝一切〉，《投資中國》第 95 期，（2002 年 1 月），頁 9。
- 沈建中，〈檢視中共「海協會」對台談判功能—從「海協會」談判隊伍分析〉，《共黨問題研究》，1998 年 3 月，頁 4-15。
- 阮銘，〈走出兩岸關係的迷思〉，《新世紀智庫論壇》，1999 年 3 月，頁 80-83。
- 邵宗海，〈兩岸重塑事務協商與初探政治談判（上）〉，《中共研究》，1998 年 3 月，頁 88-103。
- 邵宗海，〈兩岸重塑事務協商與初探政治談判（下）〉，《中共研究》，1998 年 4 月，頁 86-98。
- 周煦，〈台灣關係法的回顧與檢討〉，《理論與政策》，1998 年 12 月，頁 11-27。
- 吳榮鎮，〈美國學界對兩岸談判的看法〉，《共黨問題研究》，27 卷 5 期（2001 年 5 月），頁 10-18。
- 明居正，〈論兩岸高層互訪〉，《交流》，1996 年 9 月，頁 4-6。
- 林文程，〈我國對過渡性協議的看法與對策〉，《國策專刊》，1999 年 7 月，頁 7-9。
- 林正義，〈邁向兩岸雙贏之局〉，《交流》，1996 年 7 月，頁 25-40。
- 林正義，〈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無法並重〉，《政策月刊》，1996 年 12 月，頁 4-6。
- 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1996 年 12 月，頁 1-18。
- 林碧炤，〈論談判〉，《問題與研究》，1992 年 10 月，頁 1-23。
- 林碧炤，〈務實外交的理論與實際〉，《理論與政策》，1996 年 3 月，頁 84-95。
- 林若雱，〈台海兩岸與亞太區域安全-由美日安保體系談起〉，淡江大學編，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研討會論文集，1999 年。
- 邱坤玄，〈二十一世紀中共的外交策略〉，《國家政策雙週刊》，1997 年 4 月，頁 14-15。
- 邱坤玄，〈美日防衛合作與兩岸關係〉，《政策月刊》，1998 年 3 月，頁 10-12。
- 周濟，〈金融風暴對亞洲及臺灣經濟的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臺北，經濟

- 部，第三卷第二期，1998年2月，頁2-5。
- 孟祥青，〈論中國的國際角色轉換與對外安全的基本定位〉，《世界政治與經濟》，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2002年第七期，頁12-13。
- 柳金財，〈中共對辜汪會晤的策略、意圖與我方因應之道〉，《共黨問題研究》，1998年12月，頁6-16。
- 柳金財，〈中共對臺和、戰兩手策略之發展運用與分析〉，《中華戰略學刊》，2001年7月，頁173-224。
- 袁易，〈多邊主義與安全困境下之合作：國際關係理論與美「中」關係〉，《問題與研究》，1996年6月，頁1-17。
- 高朗，〈台灣重返政府間國際組織策略的檢討〉，《理論與政策》，1994年12月，頁28-37。
- 高朗，〈分析中共對務實外交之批評與杯葛〉，《國際關係學報》，1997年10月，頁135-153。
- 席來旺，〈美國對日安全戰略的重大調整〉，《現代國際關係》，1996年，第6期，頁7-9。
- 張亞中，〈兩岸未來：有關簽署《兩岸基礎協定》〉，《問題與研究》，1999年9月，頁1-29。
- 張亞中，〈兩岸未來之認同與統合一歐盟模式的思考〉，《問題與研究》，1999年10月，頁1-25。
- 張亞中，〈兩岸統合之理論與實踐：歐盟經驗的啓示〉，《美歐季刊》，2000年春季，頁35-81。
- 張亞中，〈全球化下全球治理〉，全球治理與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主辦，2001年6月2日。
- 張亞中，〈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2001年7月，頁1-24。
- 張五岳，評「辜汪會談」政治性準備工作，國家政策雙週刊，第56期，1993年3月，頁14-15。
- 張雅君，〈九〇年代中共的亞太戰略〉，《中國大陸研究》，35卷11期，1992年11月，頁17。
- 張黎宏，〈兩岸政治分歧與未來兩岸政治關係〉，《臺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4期，頁59-66。
- 張茂桂，〈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國家政策雙週刊》，1992年4月，第32期，頁8-9。
- 張茂桂，〈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載於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北：月旦，1995年5月，頁92-116。
- 張曉剛，〈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國際政治》，1996年10月，第10期，頁19-24。

- 張鳳山，〈論臺獨勢力的住民自決〉，《臺灣研究》，1999年2月，第2期，頁14-21。
- 張諱雯，〈「一個兩制」與「香港模式」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1995年4月，第21卷第4期，頁51。
-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要素研究—一邊倒政策的論證與評估〉，《東亞季刊》，1996年1月，頁14-28。
- 殷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1999年3月，第25卷，第3期，頁86。
- 郭正亮，〈政黨定位與統獨內涵的變遷〉，輯於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編〈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5月，頁1-9。
- 郭榮光，〈中共利用民族主義大搞統戰〉，《共黨問題研究》，1997年8月，第23卷，第8期，頁121-123。
- 陳雲根，〈中國近代史的兩個缺陷—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民主中國》，1995年，第25期，頁59-61。
- 陳毓鈞，〈江澤民講話對兩岸關係的意涵〉，《問題與研究》，1995年4月，頁58-68。
- 陳毓鈞，〈中共的「中國統一」政策與民族主義〉，《中國大陸研究教學參考文摘》，1985年3月，第17期，頁19-25。
- 陳駿德，〈遊戲理論和兩岸關係〉，《共黨問題研究》，1998年10月，頁20-33。
- 陳茹玲，李書良，《投資中國》，〈海協會副秘書長李亞飛訪台無具體成果—「政治協商？經濟、事務性協商？」〉，第55期，臺北，1998年9月。
-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9期，1998年6月，頁275-304。
- 楊志恒，〈中共外交的策略與原則〉，《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10期，1999年10月，頁29-30。
- 楊渡，〈兩岸近年來有關事務性接觸與談判之檢討和反省〉，《東亞季刊》，第23卷第2期，1991年10月，頁68-79。
- 楊開煌，〈中共外交政策中「台灣因素」之探討〉，《東吳政治學報》，1995年1月，頁217-239。
- 裘兆琳，〈柯林頓政府新「對台政策」的制定〉，《國家政策雙週刊》，1995年3月，第108期，頁11-13。
- 裘兆琳，〈中共國際談判策略分析〉，兩岸政治談判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主辦，1998年3月21日。
- 趙建民，〈兩岸恢復會商的契機與癥結〉，《政策月刊》，1998年3月，頁14-17。
- 趙春山，〈建構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正視一個分治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大陸研究》，1999年9月，頁41-50。
- 趙春山，〈辜汪會談七週年與兩岸協商之展望〉，《交流》，2000年6月，頁26-29。
- 鄭又平，〈臺灣的族群認同與政黨政治的互動關係〉，《理論與政策》，1985年春季號，頁53-64。

- 劉紅，〈「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祖國統一的最佳模式〉，《台灣研究》，1998年，第4期，頁1-7。
- 劉必榮，〈不對稱結構下的談判行為分析〉，《東吳政治學報》，1993年3月，頁219-267。
- 劉必榮，〈世紀之交的外交新思維〉，《政策月刊》，1999年9月，頁10-12。
- 劉江永，〈國際關係夥伴化及其面臨的挑戰〉，《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4月，第4期，頁2-3。
- 劉兵勇、趙景文，〈相互依存條件下的經濟開放與國家保護〉，《青海師專學報》，2002年第3期，頁45。
- 劉國琛，〈試論百年來臺灣認同的轉化問題〉，《臺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3-4期，頁95-102。
- 潘錫堂，〈兩岸三通相關問題的探討—從中共策略性轉變與入會的關聯到小三通的奠基〉，《政策月刊》，2000年8月，頁20-24。
- 蔡政文，〈務實外交的理念、實踐與評估〉，《政治科學論叢》，1995年5月，頁279-306。
- 蔡瑋，〈第三台海危機：美國、臺灣、中共的三角互動〉，《東亞季刊》，第27卷第6期，1996年10月，頁30-47。
- 蔡宏明，《金融風暴後南向政策之探討》，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臺北，經濟部，第三卷第二期，1998年2月，頁43-50。
- 蔡正文、林嘉誠，《臺海兩岸政治關係》，臺北：業強，1994年，頁14-24。
- 蕭行易，〈大陸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人力發展》，1997年2月，頁46-51。
- 蕭懷湘，〈中共對台談判策略中之謀略運用〉，《共黨問題研究》，1993年2月，頁49-58。
- 賴榮偉，〈中共對台談判策略分析〉，《共黨問題研究》，1999年1月，頁19-30。
- 謝敏捷，〈兩岸關係與未來談判〉，《政策月刊》，1996年4月，頁20-21。
- 謝敏捷、邱正仁，〈唯一選項或民主選擇：臺北、北京、華府關於兩岸關係前景的爭議〉，《中國大陸研究》，44卷9期，2001年9月，頁32。
- 衛嘉定，〈柯林頓對華政策的回顧與展望〉，《美國月刊》，8卷2期，1993年2月，頁8。
- 歐亞研究通訊編輯部，〈論臺海兩岸的談判氣氛〉，《歐亞研究通訊》，第九期，1998年9月，頁2-3。
- 現代國際關係編輯部，〈大國關係與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1998年1月，第1期，頁42。
- 海基會編輯部，〈「辜汪會晤」後的兩岸關係〉，《交流》，臺北，1998年12月，頁13-21。

中共研究編輯部，〈辜汪會晤後中共對臺策略之解讀〉，《中共研究》，32 卷 12 期，臺北：1998 年 12 月，頁 1-3。

（三）碩、博士畢業論文

- 李岳牧，〈中共對台談判模型之研究—「辜汪會談」後續事務性商談案例分析（1993 年—1994 年）〉，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組，碩士論文，1995 年。
- 杜政隆，〈從兩岸事務性談判論中共策略運用與主權爭議〉，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經貿組碩士論文，1996 年。
- 杜聖聰，〈「辜汪會談」後續事務性商談案例分析〉，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 林森鴻，〈兩岸報紙互動關係之研究〉，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 馬西屏，〈新聞媒體在岸會談中之角色研究—以臺灣媒體對首次臺北會談的影響為例〉，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 陳俊男，〈中共談判策略—兩岸事務性談判個案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 陳健民，〈台海兩岸談判議題結構之研究—以『辜汪會談』1993 年為案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組碩士論文，1995 年。
- 孫敬先，〈台海兩岸談判策略之研究—以辜汪會談為案例〉，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 曹永坤，〈兩岸協商談判之研究—從兩階段談判與第三方介入角色探討〉，國立中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 黃慶靈，〈中共談判策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 黎寶文，〈民進黨大陸政策之研究（1986—2001）：一個雙層賽局（two level game）的觀點〉，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 劉正慶，〈中共大國外交政策形成與實踐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 鄭世熙，〈第一次辜汪會談兩岸談判行為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 薛寶樹，〈中共談判策略—香港領土歸還問題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四）講詞、官書（公報、官方資料）

立法院公報，臺北。

國防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0年。

行政院陸委會，《大陸事務手冊 81 年版》，臺北：陸委會，1992年。

行政院陸委會，《大陸工作參考資料 84 年版》，臺北：陸委會，1995年。

行政院陸委會，《大陸工作參考資料 85 年版》，臺北：陸委會，1996年。

行政院陸委會，《國家發展會議兩岸關係議題共同意見》，臺北：陸委會，1997年。

行政院陸委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報刊縮影資料查詢系統」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大陸版)一版，中共對台政策資料選輯，頁412-41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跨越歷史的鴻溝——兩岸交流十年的回顧與前瞻》。臺北：陸委會，1997年。

行政院陸委會，《「辜汪會晤」與兩岸係》，1998年10月6日，陸委會網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大陸工作參考資料，第一、二冊》，臺北：陸委會，1998年。

胡志強，〈柯江會談與中美關係—兼論「三不」之影響及「第二軌道」〉，此為外交部長胡志強於1998年8月4日至監察院外交及僑政委員會之報告內容。請參閱：<http://www.mofa.gov.tw/contro870804.htm>(Oct 23,1998)。

胡志強，〈靠近一點看台灣〉，此為外交部長胡志強於民國88年6月29日應「北加州世界事務協會」與「舊金山聯邦俱樂部」的邀請至美國聖法蘭西大飯店所發表之演講詞。<http://www.can.com.tw/cgi-bin/readeynx.pl?which=xa2/xa2003> (Sept 12,1999)。

《江澤民同志八項主張》，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jiang8d/jiang8d0.asp>。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全文：<http://www.chinatimes.com.tw/report/meeting/01-9.htm>(June28,1998)。

台灣關係法全文請參閱：<http://ait.org.tw/tra-c.html>(Dec 13, 1998)。

(五) 中文報紙與雜誌

《中央日報》(臺北)

《中國時報》(臺北)

《聯合報》(臺北)

《自由時報》(臺北)

《自立晚報》(臺北)

《太平洋時報》(臺北)

《新新聞週報》(臺北)

《投資中國》(臺北)

《明報》(香港)

《信報》(香港)

《觀察》（香港）
《爭鳴》（香港）
《探索》（香港）
《瞭望周刊》（香港）
《人民日報》（北京）
《解放軍報》（北京）
《文匯報》（北京）
《中共新華社》（北京）
《中共「海峽之聲播電台」》（北京）
《新加坡海峽時報評論》（新加坡）

二、英文部分

（一）書籍

- Anderson, James. Public Policy-Ma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 Bazerman, Max, and Margaret, Neale. Negotiating Ration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 Breuilly, John,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2n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ohen, Raymond. Negotiating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revised edit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 Fairbank, John F.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Fisher, Ronald. Intera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Goodman, David S.G. and Segal, Gerald: China Without Deng. New York :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1995.
- Habeeb, William Mark. Power and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 How Weak
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 Hsu, Francis L. K. Americans and Chinese : Passage to Differenc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 Keohane, Robert.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 Econom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ebow, Richard. The Art of Bargaining.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Leng, Tse-Kang. The Taiwan-China Connectio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oulder, Colorado: West view Press, 1996.
- Nixon, Richard. The Memoir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 Patten, Christopher, East and West :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 New York: Times Book, 1998.
- Robinson, Thomas W.,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 Spanier, John.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Dilemmas.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1982.
- Swaine, Michael.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sian Securit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1998.
- Thomas Risse-Kappen,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二) 期刊及研討會論文

- Arend Lijphart, "Coope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December 1971) :691-693 .
- Bau, Tzong-Ho. "Peking's Diplomatic Strategies in a Changing World, 1989-92." *Issues & Studies* 29 (March 1993): 35-51.
- Burstein, Daniel. and Arne Keijzer. "The Chinese Threat is Overblow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9 (July/August 1998): 44-48.
- Chanda, Nayan. and Karl Huus. "The New National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November 1995): 20-26.
- Cheng, Tun-Jen. "On Taiwan-Mainland' Dyad." *Issues and Studies* 29 (February 1993):36-55.
- Chiu, Hungdah. "The Koo-Wang and the Protect of Building Constructive and Stabl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ssues & Studies* 29 (August 1993):1-36 .
- Chou, Yu-Sun.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n China." *Issues & Studies* 32 (November 1996): 67-86.
- Christopher Coker "Brita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90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1992), 409.

Christopher, Warren. "Force, Diplomacy, and the Resources We Need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7 (October 1996): 533-535.

David Shambaugh, "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Survival* (London), 34(Summer 1992): 88-106.

Deng, Yong. "The Asianization of East As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le."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6 (Autumn 1998): 87-110.

Friedman, Edward. "Chinese Nationalism, Taiwan Autonomy and the Prospects of a Larger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1997): 5-32.

Dennis Van Vranken Kickey, *Taiwan's Secu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ynne: Reinner Publisher inc., 1997), 184.

Glennon, Michael.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The Search for a Just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 Affairs* 7 (May/June 1999): 2-6.

Gourevitch, Peter. "The Second Image Revi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Autumn 1978): 881-911.

Grant, Richard L. "China and Its Asian Neighbors : Looking Towards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7 (Winter 1994): 59-89.

Haas, Peter.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Winter 1992): 1-35.

Hart, Jeffrey.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0 (Spring 1976): 289-305.

Hickey, Dennis Van Vranken. "Reaching Out in the Darknes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sian Affairs* 32 (Autumn 1995): 159-171.

Hu.Weixing. "China's Taiwan Policy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1 (1997): 374-391.

Jan C.Berris, Michel Oksenberg, "The American View of Chin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repar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1999), 64.

Jervis, Robert. "Security Reg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 (Spring 1982): 357-378.

Kahler, Miles.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Summer 1992): 681-708.

Keohane, Robert.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Foreign Policy* 2 (Spring 1971): 161-182.

Kurt M. Cambell, "The Cusp of Strategic Change in Asia," *Orbits* (summer 2001): 371-385.

Layne, Christopher. "A House of Cards: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China." *World*

- Policy Journal 14 (Autumn 1997): 77-95.
- Lehman, Howard P., and Jennifer L. McCoy. "The Dynamics of the Two-Level Bargaining Game." *World Politics* 44 (July 1992): 600-644 .
- Li, Chien-pin. "Trad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ian Survey* 8 (August 1994): 692-705.
- Lida, Keisuke. "When and How Do Domestic Constraints Matt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7 (September 1993): 403-426.
- Lieberthal, Kenneth. "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74 (November/December 1995): 35-49.
- Lin, Cheng- yi. "Taiwan's Security Strateg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ssues & Studies* 31 (April 1995): 78-97.
- Lindblom, Charles.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 (Spring 1959): 79-88.
- Metzger, Thomas, and Ramon Myer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cy." *Orbits* 42 (Winter 1998): 21-36.
- 232 Murry, John. "Understanding Competing Theories of Negotiation." *Negotiation Journal* 2 (April 1986): 179-186.
- Myers, Ramon. "A New Chinese Civilization : The Evol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148 (December 1996): 1072-1090.
- Nye, Joseph.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39 (Winter 1997/1998): 65-79.
- Oksenberg, Michael. "China's Confident Na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65 (1987): 501-523.
- Rigger, Shelley.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Taiwan's identity: The Irresolvable Conflic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5 (1997): 307-317.
- Ross, Robert S.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49 (Autumn 1997): 42-51.
- Ruggie, John.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9 (1975): 557-583.
- Shambaugh, Dav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A New Cold War." *Current History* 94 (September 1995): 241-247.
- Sheldon, Simon. "Alternative Visions of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Pacific Affairs* 69 (Autumn 1996): 381-397.
- Su, Ch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1990s." *Issues &*

- Studies 29 (September 1993): 1-21.
- Tucker, Nancy Berkopf. "War or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9 (Winter 1996): 171-187.
- Walt, Steph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110 (Spring 1998): 29-46.
- Whiting, Alie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June 1995): 295-316.
- Wong, Ka-ying. "The Impact of State Development in Taiwan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21 (Spring-Summer 1997): 171-212.
- Zhao, Quanshe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World Affairs 159 (Winter 1997): 114-129.

(三) 英文報紙

Los Angeles Times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Times

三、網路資源

聯合國 <http://www.un.org>
美國白宮 <http://www.whitehouse.gov>
美國國務院 <http://www.state.gov>
史汀生中心 <http://www.stimson.org>
蘭德公司 <http://www.rand.org>
東南亞國協網站 <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ramm33.htm>
日本防衛廳 <http://www.jda.go.jp/policy/>
英國 B B C N E W S 中文網站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default2.stm>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立法院 <http://www.ly.gov.tw/>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http://www.mac.gov.tw>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http://www.sef.org.tw>
遠景基金會 <http://www.future-china.org>
台灣安全研究 <http://www.taiwansecurity.org>
二次辜汪會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china/04-1.htm>

辜汪會專頁 http://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koo2/koo_spcl.htm
中時電子報〈1998年柯江會談〉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meeting/main.htm>
兩岸關係的戰略思維 http://udn.com/SPECIAL_ISSUE/FOCUSNEWS/STRETAGE/main.html
政治大學圖書館光碟資料庫 <http://140.119.115.30/>
台灣政治學會 <http://www.sinicaedu.tw>
民進黨全球資訊網 <http://www.dpp.org.tw>
和平論壇 <http://www.dsis.org.tw/peace.htm>
大陸台商經貿網 <http://www.chinabiz.org.tw/index.asp>
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公室網站 <http://www.gwytb.gov.cn>
中國官方對台政策文件彙集 <http://mainland.twbbs.org/top4/chinapolicy/China/>
中國網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index.htm>
世界經濟網 <http://www.world-economy.net/jyjj2.htm>
大紀元時報 <http://www.dajiyuan.com>
議報 <http://www.chinaeweekly.com/ChinaEweekly/big5/>